

炎黄春秋

第 **1** 期
2009年

宪政：中华民族复兴的要求

一二·九运动到底是谁发动的

普世价值：时代性的重大课题

杜润生二三事

霍查家族沉浮录

目 录

卷首语	
1 新年致读者	本刊编辑部
一家言	
2 宪政：中华民族复兴的要求	陈弘毅
4 普世价值：一个时代性的重大课题	杜光
求实篇	
8 “一二·九”运动到底是谁发动的	冯兰瑞
19 李炳泉在北平和谈中的真实身份	诸有琼 遗稿
21 外国人怎样研究中国	陆亨俊 遗稿
亲历记	
25 “内人党”冤案亲历记	哈斯格尔勒
31 调查“五·一六”	袁光强
34 夜半抄家记	牛辉林
往事录	
40 贵州麻山事件始末	伍小涛
44 我知道的李庆霖上书毛主席的一些情况	张玉钟
人物志	
50 蔡元培和鲁迅	张家康
55 周扬与文化建设	周巍峙
60 杜润生二三事	张木生
63 蒋百里：是真名士自风流	王贵胜
随想录	
68 公民与公仆	吴若增
69 范长江晚年对新闻工作的思考	于友
71 有感于孙中山不让喊“万岁”	戴煌
73 “红色文学史”五十年祭	黄修己
海外事	
77 霍查家族沉浮录	王洪起
82 国际共运史上的印尼惨案	彭苏
编读窗	
87 读者来信摘登	甘彦洽 周天表 等

顾 问：
杜润生 李 昌 于光远 李 锐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俊义 方 实 冯 征 冯 健
冯其庸 曲润海 朱厚泽 李 普
李一鑫 李冰封 李维民 杨继绳
杨天石 吴 象 宋木文 苏双碧
张岂之 张文彬 张荣华 何 方
杜导正(召集人) 范敬宜 金冲及
钟沛璋 徐 孔(副召集人) 袁 鹰
凌 云 萧蔚彬 曾彦修 彭 迪
韩 钢 雷 颐 魏久明

社 长 (法定代表人)：杜导正
副 社 长：徐 孔 杨继绳
常务社长、总编辑：吴 思
执 行 主 编：李 晨 徐庆全
社长助理兼办公室主任：胡竞成
网 络 总 监：张晓鸥
理 事 长：杜导正
副 理 事 长：莊其環 李 琼
理 事 长：白建钢
秘 书 长：徐 孔
副 秘 书 长：杜明明
主管、主办单位：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本刊常年法律顾问：

张思之(昊栾赵阁律师事务所 010-68083211)
步凌云(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 010-85869163)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ISSN1003—1170

国外发行代号：1274M

国内总发行：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订购处：全国各地邮局(所)

印刷：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编：100045

本 刊 网 址：<http://www.yhcqw.com>

本刊电子信箱：yanhcq@sina.com

发行部 邮箱：yhcqfb01@126.com

电话：发行部：010—68532048

编辑室：010—68534879 68523512

办公室：010—68522852

传 真：010—68532569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0296号

出版日期 每月4日

定价：6.90元

本期： 终审 徐 孔

执行主编 杨继绳

校对 沈晓雪

新年致读者

● 本刊编辑部

在新年将至的时候,许多作者和读者来电来信,询问杂志社的情况和今年的编辑方针,借此机会,我们向大家汇报一下我们的情况和想法。

今年是《炎黄春秋》创刊18周年。17年来,我们始终坚守一条原则:实事求是。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我们有很多缺点和不足,但自信守住了这条底线。

我们走过了17年,虽然经历了许多风雨,但读者在增加,作者在增加,页码也在增加,社会影响越来越大。这要感谢读者对我们所坚守的原则的支持,也要感谢各方面的善意、理解和宽容。在新的一年里,我们的编辑方针将一如既往,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努力推动民主和法制的进步。

现在,社会各界都在谈论改革开放30周年的经验。新的一年,我们还要探讨建国60周年的经验教训。对经验教训的探讨深度,不仅表现了探讨者的眼光、意图和利益,还会影响中国未来的选择和走向。

在我们看来,改革开放30年的成功经验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扩大公民权利。套用八十年代常说的四个字,就是“放权让利”。大包干来自放权让利,解决了中国的吃饭问题。民营企业崛起来自放权让利,在不平等竞争的条件下超越国营企业,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将近70%。

这条成功经验背后的规律是:有一分权利,有一分自由,就有一分发展。所谓自由,就是在自己应享权利的范围内自主选择并承担其后果,多付多得,少付少得。不受外人限制,也不被他人剥夺。如此,才能在不侵犯他人利益的条件下,充分调动每个人生产和创造的积极性。

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证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领导集体,汲取了从大跃进到文革的惨痛教训,改弦更张,尊重公民权利,放权让利。现在的领导集体强调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建立和谐社会,这个“人”应理解为中国公民,理解为公民所

享有的各项权利;这种主张拥有60年经验教训的深厚依据,坚持下去,必将大有成就。

按照“有一分权利,有一分自由,就有一分发展”的规律,我们认为,中国今后的前进方向,仍然是扩展公民权利。以扩展公民权利为核心的发展,便是科学的发展。如此不仅可以解决经济问题,还可以解决政治问题甚至道德问题。

去年爆发的金融危机有可能演变为全面经济危机。目前提出的基本对策是扩大内需。扩大内需,就应该提高劳动者的收入,调整工人、农民、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利益关系。在这个领域,工会、农会和商会都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有助于保护各自成员的权益,实现社会公正。在税收领域,是更多地藏富于民,还是更多地替民做主,也应该经过公众讨论,更加尊重民众的选择。在财政领域,公共工程、社会保障体系和其他投入项目孰轻孰重,通过广泛而公开的讨论,把选择权更多地交给民众,可以避免重大失误。

如果把市场看做经济领域的激励机制,那么,民主就是政治领域的激励机制——激励政府官员尽心尽力地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自己和为上级服务。这两个领域的改革是无法相互替代的。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如果把成功的经验推广到政治体制改革领域,必将取得同样伟大的成就。

从长时段看来,中国历史上不乏经济繁荣和太平盛世,但治乱交替却成了我们民族的宿命,形成了所谓的周期率。我们现在超越自身了吗?1945年,毛泽东主席说:“我们已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主席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深度堪为今人楷模。现在,不故步自封于经济建设的成就,勇敢地踏上新路,这是比战胜经济危机更加重大的历史使命。

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就是扩展公民权利、保障公民权利,即扩大民主、完善宪政。这方面的进步,也是我们重建价值观的基础。这方面的进展,将健康而持久地推动中华民族在道德及整体精神文明领域的进步。

总之,我们的编辑方针,我们的坚持和追求,就源自我们认识到的历史逻辑。

宪政：中华民族复兴的要求

● 陈弘毅

三十年前，我是香港大学法学院二年级的学生，当时我和我的同学对于中国的法制一无所知，法学院没有任何关于中国法的课，所有老师都是外国人。对于我们的祖国来说，过去三十年是翻天覆地的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中华民族自从19世纪鸦片战争饱受欺凌、对自己失去信心，而重新崛起、恢复自信心的关键的三十年。对于我个人来说，这三十年是寻找自己作为中国人的身份的三十年，是学习关心和认识祖国及她的法制发展状况的三十年。

有幸的是，身在香港的我不单是这三十年来中国法治进程的旁观者，更有机会成为参与者。我在1984年2月开始任教于香港大学法学院。1984年9月，中英两国发表《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1985年《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起草工作展开，作为一位年轻的讲师，我开始参与研究有关的法律问题。1997年，香港终于回归祖国，作为一位法学教授和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的成员，我有缘参与了一些关于“一国两制”的实施的有关法律问题的讨论和处理。参与这项具有历史使命感的工作，我为之欣慰。我感觉到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制定和实施在我国现代宪政史上是有一席之地的。这部《基本法》既涉及中央政府和特别行政区政府的权力关系，又涉及特别行政区的人权保障、司法独立、法治、分权制衡、民主化等问题。我认为“一国两制”的成功实施，本身就是一场成功的宪政试验，对我国的宪政建设有重大的积极意义。

在过去三十年，我国的宪政和法治建设的成就，正如经济发展的成就，有目共睹。但是，从宏观的“大历史”的角度来看，三十年是很短的时间。有名的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在1993年发表《中国大历史》一书，回顾了我国几千年的历史，也特别分析了我国现代史的结构和发展逻辑，我特别留意他的这一段话：“我们想见今后几十年是从事中国

法制生活人士的黄金时代。他们有极多机会接受挑战，尽量创造。”如果这个宏观历史视野是对的，那么过去三十年不过是我国现代史上法治和宪政建设的黄金时代的开端，这些建设和这个时代还要持续几十年。

这种对于法治建设的宏观思考，和我国政府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思考不谋而合。胡锦涛先生在去年中共十七大的报告中指出，要在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他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还需要继续奋斗十几年，基本实现现代化还需要继续奋斗几十年。”这个在几十年内实现现代化的时间表是否也适用于我国的法治和宪政发展呢？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现代化”这个概念有一个基本假设，就是现代的东西比古代的或者现代以前的东西更加先进、更加美好，因此，现代化便是一种进步。在科技的领域，现代化的概念是最明显适用的。在经济领域，现代化表现为物质文明的进步，所以在当代世界，有所谓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分，这个区分基于各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也就是经济发展的水平。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之一（我国自身不仅承认并也一再强调我们是发展中国家），它的发展或者经济现代化的水平仍然远远落后于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我认为值得深思的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区分是否也适用于法治和宪政的领域，也就是说，我们是否可以对不同国家的法治和宪政发展的水平做出评估，从而得出结论说，某些国家的法治和宪政发展的水平比其他国家更高。

我个人认为，不同国家的法治和宪政发展的水平的确有所不同，所以正如在科技和经济领域一样，在法治和宪政这些制度文明的重要元素方面，也存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区分。我这个论点的前提是，法治和宪政是普世价值，是对全人类有普遍意义的制度文明元素。

匈牙利宪法学家 Sajo 教授曾经说,“宪政主义的宪法的出现,不是为了追求一个幻想或者乌托邦,这种宪法所反映的,是对于先前的(非宪政)政治制度的恐惧,这种宪法的理想,就是脱离以前的因为没有宪政而造成的苦难。”日本宪法学家杉原泰雄说,“宪法是对充满苦难的生活经验的批判和总结。从宪法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人类为了摆脱苦难而产生的智慧。我们学习宪法,就是为了学到这些智慧,为了我们的未来而未雨绸缪。”虽然这两位学者一个是东欧人,一个是日本人,但他们写出的这两段文字完全适用于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回顾“文革”时代,举国之内无法无天,法治和宪政被践踏在地,国家和人民经历史无前例的浩劫,所以邓小平等领导人在文革后,基于对文革时代国人的苦难的反省,才决定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并制定了1982年的宪法,为我国宪政建设奠定了一个稳固的基础。1982年以后,每次修宪都有明显的进步意义,有助于逐步提高我国的法治和宪政的水平,例如规定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保障人权和财产权等。

西方政治学家 Karl Loewenstein 在1957年的一本著作里对三种宪法做出区分:就是名义上的宪法,文字上的宪法和规范性的宪法。规范性的宪法的特点,是由宪法控制政治权力的行使,而不是反过来由政治权力的行使来控制宪法。当代西方宪法学家 Vicki Jackson 和 Mark Tushnet 在2006年出版《比较宪法学》一书,其中一章的标题是《有宪法而无宪政》,就是说,在一些国家,宪法的制定虽然受到重视,但它只是一个象征、一个理想的表述、一份政治宣言,而不实际发挥限制和规范政治权力运作的作用。我个人认为,宪政所要求的宪法,就是 Loewenstein 所说的规范性的宪法,也就是限制和规范政治权力的宪法。

为什么需要限制和规范政治权力的行使?西方近代政治和法律思想史所提供的答案是,政治权力是可能被滥用的,绝对的权力可能导致绝对的腐化,所以需要限制和规范政治权力的行使,以防止权力的滥用,以保障人权不受侵犯,以保证政府向人民负责。关于如何通过各种制度性和技术性的设计,去达到这个目标,西方近代宪政史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在当代中国,法治和宪政的水平相

对于西方仍然比较落后,所以学习和借鉴西方在这方面的经验,将仍是国人在可见的将来的重要工作。

我近年来在学习20世纪新儒家思想家的学说,我越来越觉得,在法治和宪政方面学习西方的经验、制度和技术,实现宪政,不但与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和我们的民族自尊完全没有矛盾,而且更是中华文明全面复兴的伟大事业的要求。在1958年,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和张君勱四位儒学大师发表一份《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在宣言中他们一方面主张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另一方面,他们同时主张接受西方文化中的科学、民主和宪政思想,认为这样可以“使中国人之人格有更高的完成,中国民族之客观的精神生命有更高的发展”。他们甚至说,在中国发展民主、建立宪政,是中华文化传统的内在要求。牟宗三先生说,法治、宪政、人权和民主虽然“先发于西方,但是只要它一旦出现,它就没有地方性,只要它是个真理,它就有普遍性,只要有普遍性,任何一个民族都该承认它。”徐复观先生说:凡是真正了解中国文化、尊重中国文化的人,都会明白在今天为宪政、为民主而努力,是中国文化自身所必须的发展。在一篇题为《为生民立命》的文章里,徐复观先生对宋代儒家张载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所做的现代诠释是,在当代为生民立命,不单包括促进他们的道德人格的修养和成长,也应包括促进他们的人权、自由与平等。他说,“从教化上立人格的命,同时从政治上立人权的命,生民的命才算真正站立起来了。”他又说,“假使孔孟复生于今日,亦必奔走呼号,以求能先从政治上为生民立命。……论中国文化而接不上这一关,便不算了解中国文化自身的甘苦。欲融通中西文化,首先必须从中国文化已经内蕴而未能发出的处所将其迎接出来,以与西方文化相融通。”我谨以徐复观先生以上这句话,与大家共勉。

作者简介:陈弘毅,1957年生于香港,1980年获香港大学法学学士学位,1982年获哈佛大学法学硕士学位,1984年取得香港律师资格,随即任教于香港大学法律系至今。1997年获任命为全国人大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至今。

(责任编辑 吴思)

普世价值： 一个时代性的重大课题

● 杜光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政治、文化、社会诸领域，却仍然坚持着计划经济时代的意识形态，严重地阻碍了改革的全面而深入的发展。为什么会这样？最根本的原因是没有找对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没有找准改革开放的前进方向。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没有

（一）改革开放就是实践普世价值，是中国民主革命的继续

我在近几年来有一个看法：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是一百多年前由洋务运动肇始的民主革命的继续。民主革命就它的民主主义性质来说，它的任务就是彻底推翻专制制度，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制度。这是人类社会在发展进程中必然要经历的、不可超越的历史阶段。在专制制度没有彻底推翻、民主自由的社会制度没有全面建立以前，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历史任务，只能是继续推进民主革命。回顾一百多年的民主革命的历史，由于存在着两千多年的专制皇权的深厚传统，我国民主革命的进展显得十分曲折、十分艰难。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和解放战争这三次以暴力斗争为主要形式的民主革命，在取得革命胜利以后，都出现了专制势力的复辟。这里面的教训是很值得总结的。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表示要为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这个崇高的理念和壮丽的前景，吸引了无数知识分子和普通老百姓。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下，民主革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制定的《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当时，在经济上五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在政治上，中央政府的构成里，非共产党员的民主人士占了将近一半的位置。这样的政治经济格局，是比较符合于当时的社会现实和民主主义发展前景的。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发展民主主义，就有可能彻底消除专制主义，完成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但是，1953年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打断了民主革命的继续发展。在经济上，通过“三大改造”，剥夺了农民、手工业者和工商业者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建立起全面垄断的经济体制；政治上把大批非共产党员排挤出政府权力机关；文化上通过思想改造、批判《武训传》、批胡适、反胡风等一系列政治运动，树立一元化的意识形态。于是，经过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经济上垄断生产资料所有权，政治上垄断国家权力，文化上垄断真理裁判权，社会领域则垄断公民权利。中国人民刚取得民主主义的胜利，就又一次地被推回专制主义的泥坑。

改革开放就是要摆脱专制主义的羁绊，回到民主革命的道路上来。袁伟时教授2002年9月25日在南京大学历史系做报告时，曾经说过一句非常幽默、非常极端，又非常深刻的话：“我们在九十年代做的工作，大体上是继续做光绪皇帝、宣统皇帝的未竟事业。”什么是光绪皇帝和宣统皇帝的未竟事业呢？就是宪政民主，是由上而下的、和平非暴力的民主革命。在整整一百年前的1908年，清政府颁布《宪法大纲》，而且拟订了实施这个大纲的逐年筹备事宜的清单，列出君主立宪的九年规划，但这个进程被辛亥革命打断了。袁伟时这句

话的意思,我想无非是说我们现在的改革开放,不过是要实现清朝皇帝没有实现的宪政民主,继续民主革命的未竟事业。改革开放所要达到的目标,就是民主革命所要达到的目标,那就是:取代国家政权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垄断,实现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自由化、社会平等化。民主、自由、平等,都是普世价值所要求的。否定普世价值,拒绝民主自由,实质上就是否定改革的民主主义性质,否定民主革命。

(二)普世价值的基础是人类共同的人性

我们承认普世价值,是因为人类除了各自的个性和特定群体的共性外,还存在着超越于一切差别的共同性,就是通常说的“人性”,也可以说是人的天性,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性,例如趋利避害、珍惜生命、恻隐之心、对真善美的追求等等,正是这些共同的本性,产生了对社会生活的共同追求:自由、民主、平等。

改革开放以前,主流意识形态否定人性,大批人性论。抹杀人性的结果,是兽性大发扬。马克思曾经指出:“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4页)历次政治运动中那些挖空心思地罗织罪状、陷人于罪的积极分子,文化大革命时群殴无辜、屠杀生灵的种种罪行,都反映了专制制度的发扬兽性的本质。

为什么人性和兽性会共存于同一个主体之中呢?斯宾诺莎曾指出:“人们都有一种欲望,要追求对自己有利的东西。”(《论理学》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424页)马克思也认为:“致富的欲望是所有人的欲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73页)斯宾诺莎说的“追求对自己有利的东西”,马克思说的“致富的欲望”,都是人类共有的本性。但是这种本性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趋向:一种趋向是,人们在追求对自己有利的东西的时候,如果不顾社会或他人的利益,甚至采取有害于社会或他人利益的办法来谋求自己的利益,那么,发展到极端,就会使人性蜕化为兽性;相反,如果能够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时,关心社会和他人的利益,有利于社会 and 他人,至少无害于社会 and 他人,那就意味

着保持了或发扬了人性。在社会生活中,甚至在同一个人的身上,也会表现出人性和兽性的对立和转换。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兽性的发展往往带来社会的混乱,甚至导致社会崩溃,赖有人性的发扬才得以维持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在苦苦寻求发扬人性抑制兽性的良药,以保持整个社会的不断发展和人类自身的和谐生活。古代社会的习惯法、自然法和近代的法律体系,历代思想家、政治家的著书立说,都表现了这个共同的追求。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等,是人类社会直到几百年前的近代才终于发现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共同价值。

随着文明的进步,出现在了观念上的、在一个地区一个民族范围内的普适价值。如中国古代的仁爱、诚信、忠恕、和为贵等等。基督教在“人人都有‘原罪’”和“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前提下建立起平等的价值观。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民主革命的思想家培根、卢梭、潘恩等人通过自然秩序论,申述以自然法则为基础的天赋权利,对经济、政治、宗教、社会及伦理道德诸方面的专制统治,提出了严正的抗议,于是有了自由、民主、平等、个性、人权等等观念形态的普世价值。由于当时亚非两大陆的文明还十分落后,普世价值只有在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三大革命洗礼的欧洲和后来的北美新大陆,才有可能由观念的普世价值发展为实然的普世价值。

普世价值真正具有普世性是与全球化分不开的。一方面,全球化使小小寰球上的一切国家和民族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剧变都可能在全世界引起反响。另一方面,作为观念形态的普世价值,由落后国家的知识分子引进本国本民族,并力图在本国本地区加以实践。这才使由欧洲发端的普世价值真正具有普世性,并且出现了普世价值这个用语。

我在前几天读到一篇题为《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的征求意见稿,作者把价值划分为四个层次:个人价值、群体价值、社会价值、全人类价值。他认为普世价值“应该是指普天下的人共同追求的价值”。我认为这样划分是有道理的。否定普世价值的人承认有个人价值、群体价值、社会价值,但不承认有普世价值。这个见解的一个重要出发点是他们浸染很深的阶级斗争观念。在他们的眼

里,人只有阶级性,没有共同的人性,人类没有共同的爱好、利益和追求,所以也没有共同的价值和价值观。在理论上指出价值的层次性,承认不同的阶级具有不同的价值观,同时也标明存在着超出阶级范围的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共同需要、共同追求,就可以避免阶级论者的片面性。温家宝总理不久前说:“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这是对普世价值的很好的说明。

(三) 马克思的普世价值观

马克思主义是否包括普世价值观?我认为答复应该是肯定的,这可以从马克思恩格斯对自由的大量论述里看出来。马克思继承古典自由主义的宝贵遗产,肯定自由是人的本质特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0页)，“是全部精神存在的类的本质”(同上第1卷第67页)。他认为人的自由“合乎理性的本质”，“使人们成为理性的存在物”(同上第101页、第105页)。他把自由列为他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核心内容,认为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社会将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同上第23卷第649页),在这个联合体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3页)。恩格斯也谈到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570页),使他们“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同上第19卷第247页)。在他晚年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里,他以赞许的口气引用摩尔根的话说:“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形式上的复活。”(同上第21卷第203页)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所追求的未来的人类社会,正是实现了普世价值的社会,只是当时还没有“普世价值”这个词罢了。

对于民主问题,马克思在早期著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里,曾有过较多的论述,如他认为民主制是“人民的自我规定”,“在君主制中是国家制度的人民,在民主制中则是人民的国家制度”,“国家制度在这里表现出它的本来面目,即人的自由产

物”;“人民是否有权来为自己建立新的国家制度呢?这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是绝对肯定的”(同上第1卷第281页、第316页)。马克思在这里是把民主制作为专制制度的对立物来充分肯定的。

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19世纪,对民主制度抱有这样的认识是可以理解的。欧洲的资产阶级高举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引领广大民众,开展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民主革命,但在革命胜利后,他们号称要建立的“理性的王国”,却不过是有产阶级的王国,无产者依然没有自由民主的权利,这就不能不使一切追求公平正义的思想家感到失望。恩格斯在1884年给伯恩斯坦的信中,认为“民主共和国毕竟是资产阶级统治的最后形式,资产阶级统治将在这种形式下走向灭亡”。这个观点来源于马克思,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里谈到民主共和国时,指出它是“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最后国家形式”(同上第19卷第32页)。对照《共产党宣言》里说的“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同上第4卷第489页),就不难发现,马克思恩格斯所推动的无产阶级革命,是要用工人阶级统治的民主取代资产阶级统治的民主。这样来理解民主,当然还不是普世价值意义上的民主。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里曾提出工人阶级取得政权后的民主制的具体措施,如:公社由普选产生的代表组成,“这些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一切学校对人民免费开放,不受教会和国家的干涉”,“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该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等等(同上第17卷第358页)。恩格斯认为公职人员由选举产生和只发给他们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是“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两个可靠办法,也是保证国家民主性的可靠办法(同上第2卷第228页)。

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指出的无产阶级统治的民主制的重要措施,在资产阶级统治的资本主义世界,有些已经成为事实。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它可以说明,现代民主制已经突破了原有的资产阶级统治的民主制的藩篱,使民主日益成为普适性的政治制度。

马克思对于民主问题的认识,从理论观念上看并没有局限在上述的范围里。在他看来,民主是人的自由权利在政治领域,首先是在国家制度上

的表现,这从前面引述的关于民主制是“人的自由产物”的论断就可以了解。他后来说的“自由就在于把国家由一个高踞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同上第19卷第30页),是对自由和民主的关系的更为明确的表述。从这个角度来看,马克思是承认民主的普适性的。

有些人往往用当代某些民主国家的不足之处来批驳民主的普世性。他们不了解,普世价值的实现是受一定历史条件的限制的。马克思说过:“人们每次都不是在关于理想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所规定和所容许的范围内取得自由的。”(同上第3卷第507页)民主自由的实现程度都不能不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在欧美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里,民主自由的实现程度都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步而逐步提高的。以美国的选举权为例,1787年通过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规定只有自由人和3/5的非自由人可以计入选举议员的人口数,1870年宪法修正案才规定,公民的投票权“不得因种族肤色或曾为奴隶而加以拒绝或剥夺”,1920年的修正案解除了公民投票权在性别上的歧视,1969年修正案规定“不得以未交人头税或其他税为理由”而否认或剥夺公民的投票权,1971年的修正案规定18岁和18岁以上公民的选举权,不能因为年龄关系而加以否定或剥夺(《中外宪法选编》,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第234—238页)。

更有启发意义的是,马克思在1880年向法国工人党领袖盖得口授法国工人党纲领导言时说:“生产者不占有生产资料是不能获得自由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64页)这个深邃的见解揭开了民主自由何以在许多国家不能普遍实现的谜团。纵观到目前为止的世界历史,自由、民主、平等、人权,始终是有产者的权利,无产者是很难实现自己的自由民主权利的。所以,只有社会上的大量无产者发展成为有产者,自由民主的普适性才能实现。我认为马克思的这个理论是非常有价值的。它把人类解放同取得生产资料所有权直接联系起来,意味着劳动者不取得生产资料所有权,就没有自由民主权利,就不可能得到解放。从这里我们可以理解,马克思为什么要提出,未来社会的所有制形式,应该是在联合生产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让每个劳动者都占有生产资

料所有权,因为这是实现自由民主权利的经济基础。现在有人把劳动者毫无所有权的国有经济,说成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这完全是同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的。它已经成为建立民主政治、实现普世价值的基础性障碍。遗憾的是,直到现在,还很少有人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意义。

简短的结语

马克思的这些关于自由的论述,可以加深我们对普世价值的认识。

首先,我们只能在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所规定、所容许的范围内,争取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普世价值的实现,不能有过的期许。但这是就实际的普世价值来说的,而目前中国社会最迫切的需求是观念的普世价值。只有全社会从上到下普遍地树立普世价值的观念,改革开放才有明确的方向。目前这场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本身,就足以说明树立普世价值观念是多么必要。我同意徐景安在创建新文化论坛上的意见,普世价值应当从三方面着力:一是吸取西方的文明成果,二是发掘优秀的传统文化,三是创新发展。

其次,自由、民主、博爱等普世价值同民众从无产向有产的转变是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的。我们在提倡普世价值的同时,还应当关注生产力的发展和公民有产化的进展。黑龙江大学熊映梧教授在生前曾经提出“公民产权本位论”,主张每个公民都应享有一定的产权,有些学者呼吁实行“耕者有其田”,把土地所有权还给农民。这些正是争取公民产权的理论阐述和实际行动。公民有产化的推进有助于普世价值的实现,普世价值观念的树立和实践也有利于公民有产业化。这两个方面的进步,都有待于我们的努力。

最后,我认为,普世价值的理论探讨和广泛宣传,应当成为现阶段启蒙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当前的民主革命,包括改革开放、维权运动、启蒙运动,都需要推广普世价值的观念,推动普世价值的实现。在一定意义上说,改革开放也好,民主革命也好,都是争取实现普世价值的过程。只有普及普世价值,使它深入人心,改革开放才能找准明确的方向,民主革命才有完成的希望。

(责任编辑 杨继绳)

“一二·九”运动到底是谁发动的

● 冯兰瑞

引言：旧话重提

《炎黄春秋》2006年第10期《林炎志谈父亲林枫》一文,引起了老友周明兄的关注,给《炎黄春秋》和《纵横》等期刊写信,并连续四次给我来信,谈的都是关于“一二·九”运动的问题。想必是李昌与“一二·九”运动有密切关系之故。他认为“一二·九”运动关系重大,希望李昌、高锦明(原名敖白枫)这些“一二·九”亲历者能够写点文章,说可能比他看到的有些文章会全面些。同时,他还给《纵横》杂志去信,请他们将该刊2007年第9和第12两期寄给这两位老同志,并向他们约稿,或派记者访谈,做口述历史。

周明兄长我四岁,是位老革命,也是做青年工作出身。1936年底、1937年初,我参加重庆青年自强读书会(简称“自强”)、自强救国会(简称“自救”)时,他已是“自救”的负责人。如今从大连工学院党委书记的岗位上离休多年,以九二高龄而如此关心青年运动的历史,总希望有一部记述“一二·九”全过程的书,不遗余力地多方促进,古道热肠,执着追求,令我感佩。遗憾的是,我老伴李昌因病住院,而高锦明同志也有病,作口述历史亦已困难。看来这个艰巨的修史任务,只有寄希望于他人了。

周明兄来信涉及的主要问题,一个是民先队第一任总队长是谁(见《炎黄春秋》2007年第4期“编读窗”栏),再一个是“一二·九”运动的发动有无共产党的领导。

关于民先总队长问题很容易说清楚。周明说,“民先总队的第一任队长是敖白枫……第二任队长才是李昌。”关于这个问题,我已给周明兄写了封信,附去一份有关材料。事实是,周明说的

是1936年的情况。当时民族解放先锋队成立北平总队,第一任总队长的确是敖白枫(高锦明)同志,1936年5月,他调任中共北平西山区区委书记之后,李昌才接任总队长。^[1]1937年2月,民先队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会上决定在原名“民族解放先锋队”之前冠以“中华”二字,正式成为全国性的青年骨干组织,称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全国民先。^[2]这次代表大会上,选举李昌为全国民先总队长。此信及附件,刊于《炎黄春秋》2007年第5期“古今谈”专栏。

“一二·九”运动是不是在党的领导下发生?这个问题历来就有歧议:一说,“一二·九”运动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生的;另一说“一二·九”运动是自发的,不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生的。2007年冬季重提这个问题,是由于周明给《炎黄春秋》的信说:“我向敖白枫(即高锦明)做了询问。他告诉我,‘一二·九’运动确实是党领导的,当时北平有临时工委,工委书记是王健(即后来的财政部副部长王学文)。临时工委的任务有两个,一个是军运……一个是学运……学运的方向是完全一致的,但他们有些分歧。这些分歧在林枫建立北平市委以后才统一了。”

此说除了将王学明误为王学文外,主要问题还在于比较笼统、含混。即把历时三年的“一二·九运动”和“一二·九”运动的发动混淆在一起了,因而也没有破解“一二·九”运动究竟是不是在中共党的领导和组织下发动的这一数十年来的悬案。数十年来主流意见和官方史籍从不同角度强调“一二·九”运动是在党的领导下发动的。但有的说法纯系猜测或想象,读之令人不禁莞尔。例如:一位老同志、当年燕京大学的“一二·九”运动积极参加者回忆说:“当时我们还没有入党……在白色恐怖下,不知所措。”“党出来领导我们了。然

而,亲爱的党,你在哪里?”(见《一二·九运动回忆录》第一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5月版,第107—109页。)再如:1982年出版的《中共党史资料》第1辑中,高文华在《一九三五年前后北方局的情况》一文中写到“一二·九”运动时说:“我们北方局支持并领导了这一爱国运动,在党内是赵升阳等同志,还有柯庆施、陈伯达领导的,而直接出面领导的是李昌、蒋南翔(清华大学支部书记)、林枫、徐冰、许德珩等同志。”这个说法把几个重要人物都搞错了。赵升阳即李葆华,是1936年5月才到北平任市委书记的,“一二·九”运动爆发时,他是京东巡视员。陈伯达“一二·九”前在天津,并没有领导运动。《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中是这样写的:“一二·九当天我在天津,第二天看《大公报》才知道发生了抗日救亡大示威。”“十二月九日当天的群众游行示威是……在一部分地下党员的努力活动下,广大爱国学生自发举行的。”蒋南翔当年是清华大学的党支部书记,他回忆说,他领导清华大学学生会,响应了北平学联做出的举行“一二·九”运动的决定。说的是“响应”学联的决定,不是“领导”了“一二·九”运动。

至于说李昌直接出面领导了运动,更是离奇。李昌当时为此专门给《中共党史资料》编辑部写信,声明他没有也不可能“直接出面领导运动”。他写道:“这里说的爱国运动是指‘一二·九’、‘一二·一六’游行示威和南下宣传团等抗日活动,我应说明,当时我仅仅是一个积极分子,连党员都不是”,“所以,我并没有‘直接出面领导运动’。”

我认为,“一二·九”运动是不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生的和“一二·九”运动有没有党的领导,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应当明确加以区别。“一二·九”运动的广义,系指从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加剧,华北危亡在即,北平学生首先在12月9日爆发了请愿游行斗争,从而引发全国性的历时近三年的学生争取民主自由的抗日救亡运动。如果认真考察“一二·九”运动过程的几个发展阶段,要说清楚一二·九运动与中共领导的关系,特别是“一二·九”运动是不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发生的问题似也不难。

据我见到的资料,“一二·九”运动,如果从1935年12月9日的请愿游行算起,到1938年

11月中共中央决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停止发展为止,历时三年整。这三年总的形势是,全国抗日救国运动风起云涌、日愈高涨、不可遏止,也是民先队蓬勃发展的时期。与此相应,“一二·九”运动也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一、发动和发生阶段;二、成长壮大阶段;三、持续发展阶段。

1938年11月,党中央做出了民先队停止发展的决定。此后,出于工作和斗争的需要,“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这块牌子还保存,频频出现于党的重要文件上。例如《中国青年》杂志多次刊登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署名的文件:1939年5月4日发表《致三民主义青年团书》,12月9日发表《“一二·九”四周年纪念宣言》。还有中共中央青委《关于加强青年工作的决议》、《关于纪念四四儿童节与开展儿童工作的决议》等文件,均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西北青年救国会联名发表。更重要的一次是1940年5月4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曾与其他几个青年团体联名发表《上蒋委员长书》。

如果将1938年11月后的这段民先队名存实亡,仅作为中共党的一种斗争工具的时期不算,只从1935年“一二·九”发动请愿游行到1938年11月停止发展为止这三年来考察,整个运动则可以分为上述三个互相衔接又有所交叉的阶段,本文着重讨论第一阶段:发动和发生阶段。

第一,“一二·九”运动发生的时代背景

1. 国内外形势使然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军对华侵略步步紧逼。国民党政府实行不抵抗主义,放任日军占领了东北三省(这个历史事件是抹不掉的。尽管张学良承担了不抵抗的责任,也不能为国民党开脱)。1935年华北危急,国难当头,民族危亡。日本和蒋介石政府密谋“华北特殊化”、“华北五省自治”。国民党河北省党部、北平市党部、中央军和宪兵第三团均已从华北撤走,预定于1935年12月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委任宋哲元为主任。“华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热血青年不愿做亡国奴,奋起抗日。这是当年最大



李昌夫妇金婚纪念(1996年)

最重要的时代背景。

另一方面，蒋介石坚持实行“攘外必先安内”，调集大军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进行了第四、第五次军事围剿，在白区对进步力量实行文化围剿。红军反第五次围剿失败，被迫开始长征，到达陕北时已损失了90%。

加上共产党在白区仍执行“左”倾冒险主义方针，遭受了毁灭性打击。大批党团员骨干和进步分子被捕、被杀害或逃亡，损失惨重，革命力量受到很大削弱。到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期间，中共北平党的组织不仅很不稳定，而且几乎处于瘫痪状态。

2. 党的力量削弱，组织变动频繁

“一二·九”运动时期党的北平市临委负责宣传的彭涛在1960年11月24日的一次谈话中说：“当时党员全(北平)市共有十来个，连共青团员不过二十个左右。”时任河北省代理书记、组织部长的朱理治1960年回忆得更具体，当时北平只有9个党员。1936年初，刘少奇主持北方局工作时，说“整个北方局能够联络到的党员不过三十人左右，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使党的组织几乎瓦解殆尽，并在灭亡之途往下滑。”

那几年，北平市委迭遭破坏，市委书记、委员被捕、牺牲、转移。市委组织变动频繁，书记几次易人，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包括代理书记)竟连续换了近二十位。1935年秋冬，党的北平临委处于分裂状态，根本无暇也无力顾及领导学生运动。

然而，半个世纪以来，在不少回忆“一二·九”运动的文章中，在“一二·九”运动亲历者的座谈会上，一般都说“一二·九”运动是党领导发动的。如：人民出版社1983年5月出版的《一二·九运动回忆录》一书，多数人的文章、发言就是这样说的，但都语焉不详。“一二·九”四十五周年的一次聚会上，陈其五同志说：“我当时还不是党员，但我清楚地意识到党在领导。”但究竟是怎样领导怎样发动的？当时党的市委是什么情况？书记是谁？

则说不清楚。

当时北平党的组织、书记变动情况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主要有以下三种：

第一种是前面提到的，1935年1月，建立了中共北平市工作委员会(简称市工委)，不久书记许子云等被捕，组织被破坏。六七月间，河北省委派李常青到北平，重建市工委，任命原市团委书记王学明为书记，杨子英、冷楚先后负责组织，彭涛负责宣传。

第二种说法是，由于北平市工委发生路线分歧，河北省委决定撤销市工委，成立市临时工作委员会，由谷景生任临委书记，组织发动了“一二·九”运动。

第三种说法是，1935年11月下旬，李常青奉命到北平，“直接主持北平党的工作”(也有说李常青以省委特派员身份兼任中共北平临委书记的)。

我查到的当事人详细讲述“一二·九”运动策划发动过程的材料，有姚依林、郭明秋和谷景生三人的文章和谈话。姚依林和郭明秋文章是第一种说法，谷景生文章是第二种说法。按谷景生有关文章和谈话，谷主要是通过郭明秋单线联系来组织和指挥“一二·九”游行的，但郭的文章没有支持这样一种说法。所以本文以下按第一种说法展开。

“一二·九”运动，是一次学生群众向政府当局请愿，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爱国救亡活

动。当时的临委书记王学明等,坚持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路线,不可能去组织领导学生请愿。在王学明任临委书记时,谷景生是“文盟”和“左联”党团书记,不是临委书记;李常青是省委派来调查北平临委分裂问题的,不可能自己当了书记。

事实是,1935年1月,时在天津的中共河北省委决定建立北平市工作委员会(简称市工委),同时恢复共青团北平市委。许子云任市工委书记,王学明任团委书记。不久,市工委再遭国民党当局破坏,许子云被捕。下半年,省委决定重建北平市党的组织,派李常青到北平,宣布成立中共北平市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临委。任命王学明为临委书记,临委负责组织工作的委员先后为杨子英、冷楚,彭涛负责宣传。谷景生担任北平左翼文化总同盟(“文盟”)和左联党团书记。临委成立之后不久,内部就发生了路线上的严重分歧。就是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亦即北平共产党组织还处于自身难保、无法作为的情势下,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了请愿游行的学生运动。

3. 临委分裂

1935年七八月份,黄河泛滥成灾。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北平分会的负责人周小舟(党员),找了姚依林(即姚克广,清华大学学生会代表,1935年夏入党)、黄敬(即俞启威,北大学生代表,党的关系尚未恢复)、郭明秋(即郭桂英,共青团员)、彭涛(临委委员)等几个同学发起了救灾活动。8月份,由他们推动和参与组织了一个公开的学生群众团体:“北平市大中学校学生黄河水灾赈济联合会”(简称赈济会)。女一中学生会临时主席吴闰箴被推举为赈济会主席,姚依林担任赈济会秘书长。并在北平市社会局立案,为公开合法的团体。

赈济会会址设在女一中。不久,郭桂英担任了女一中学生会的正式主席。

1935年10月,赈灾工作胜利结束。由于学生代表携带募集的捐款、物资和抗日宣传品分赴冀、鲁等灾区慰问,将救济物资送到灾民手中,在群众中的影响很好。这时,作为赈济会的负责人彭涛考虑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扩大赈济会工作的成果,进一步组织起爱国学生,发展抗日救亡力量?

为此,彭涛同黄敬、姚依林、郭明秋商量。他

们一致主张成立一个公开合法的学生群众抗日团体:“北平市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将赈灾活动转变为政治活动。彭涛把这个主张作为自己的建议提到市临委会上讨论。临委会议上发生了意见分歧,争论激烈。两种意见尖锐对立,开不下去,只好休会。中共北平市临委因此分裂为两派,王学明代表的多数派反对发动群众向政府请愿,坚持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彭涛等为少数派。《姚依林百夕谈》^[9]中写道:“要不要搞一个这么庞大的合法群众性抗日组织,实质上涉及要不要搞统一战线的问题。他们(指彭涛等——冯注)认为成立这一群众性抗日组织已是当时群众的客观迫切要求。”“但是,临委中以书记小王(指王学明——冯注)为代表的多数不赞成搞这一合法群众性组织。他们认为把党员分散到合法组织中去工作是降低了党,而且,势必会降低党的口号。如‘打倒国民党’便无法提,‘拥护苏维埃政权,保卫苏联’便无法提,只能提出为广大学生群众能接受的口号。于是,双方争执不下,在口号问题上发生激烈争论,彭涛成为临委会议上的极少数派。他们所研究提出的口号,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临委多数派则认为这是右倾口号;又如‘要求言论、出版、结社自由’,临委多数派则认为国民党不会给自由,这是社会民主党的口号;又如提出:‘蒋委员长如抗战就拥护,不抗战就不拥护!’更加被临委多数派认为是右倾投降的口号。凡是提出为当时广大学生群众可以接受的口号,以小王为代表的多数派都不赞成。临委会议上意见分歧,无法决定行动。”(引自姚锦编著:《姚依林百夕谈》,中国商业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20—21页)王学明认为彭涛是右倾机会主义,撤销了他的职务。从这里也可看出,“一二·九”请愿的口号,也恰是中共北平市组织所不能接受的口号。

以后,争论双方都向中共河北省委反映情况。省委听了临委两派的汇报,派李常青来北平调查,和两边的人都谈话,却只是了解情况,没有表明态度。

第二,“一二·九”请愿游行究竟是怎样发动的

1. 甩开临委,成立学联,决定请愿

中共北平市临委会后，彭涛找姚依林和黄敬、郭桂英多次研究，又找周小舟去商量。

黄敬 1932 年在青岛入党，1933 年被国民党逮捕，1934 年保释出狱，1935 年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尚未恢复组织关系。18 岁的郭桂英还没有入党，时任共青团市委组织部长。姚依林则是 18 岁刚刚入党的一个新党员。但他们思想认识一致。彭涛由此下了决心，不管临委会多数派意见，他们志同道合的几个人，干起来再说。于是，成立了无名义的四入领导核心小组。因彭涛 1933 年曾参加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有些斗争经验，其他 3 人推选彭涛当了组长。他们这个“无名义的”“领导核心小组”，甩开了共产党北平临委的领导，研究筹备了两三个月，成立了北平学联。（参见《姚依林百夕谈》第 21 页）

姚依林在 1982 年 8 月 12 日同范瑾（黄敬的夫人）、兰铁白等谈话中也说过：由于临委大多数人反对举行公开示威游行，一开会就发生争论，“不能开会，王学明放弃不管。彭涛出来说：咱们自己干吧。”北平学联“是在北平临委不起作用、分裂的情况下，自己搞起来的。”^[4]11 月 18 日各校学生代表在中国大学举行了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北平市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北平学联”。大会选出主席郭明秋（女一中代表）、秘书长姚克广（即姚依林，清华大学代表）、总交通孙敬文（镜湖中学代表）、总纠察邹鲁风（东北大学代表）和总交际王汝梅（即黄华，燕京大学代表）。北平学联发表宣言，要求立即停止内战、对日作战、保卫华北……（参见黄华著《亲历与见闻》，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6 页）

几位重要的直接当事人的回忆表明，北平学联的成立，既不是中共北平市临委的意见，也没有党的组织领导，而是自发搞起来的。只有一两个党员参与了领导，如彭涛、姚依林。学联成立后全力开展学生运动。11 月下旬，他们讨论，酝酿举行一次请愿活动。何以这次请愿的日期要选在 12 月 9 日？是因为这一天宋哲元的“冀察政务委员会”要成立。后来，这个伪组织因发生学生运动而推迟了成立的时间。

中国共产党清华大学当时支部书记蒋南翔写道：“在北平学联做出了发动北平学生起来游行请愿的决定后，北平市委何凤元（可能是临委

中支持彭涛的少数派）曾到西郊区委传达：希望清华、燕京两校率先起来响应，因为当时的反动统治，北平只有这两所大学有公开合法的学生会……”于是清华就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利用上午第四节课纪念周的集会时间，由吴承明出面向全校学生大会提出‘响应学联号召，联合北平各大中学校进行游行请愿’的提议，但由于右派学生竭力阻挠，使会议无结果而散。于是再接再厉，又在下一周十二月三日的周会上，再次提出上周末通过的提案，经过会议中的激烈辩论，终于在全校大会上胜利通过了游行请愿的决议。这是清华学生救亡运动的一次重大胜利。”（《蒋南翔文集》下卷，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8 年 4 月第一版，第 1177 页）

2. “一二·九”运动的准备

“一二·九”运动是自发的，也是有准备的。“一二·九”运动的准备过程显示，思想准备比较充分，而且也有一定的组织准备，后者主要是指学生们自发的抗日救亡组织。从 1931 年“九一八”事变以来，这种思想发动和组织准备从未间断，是一浪高过一浪。

黄华在 1980 年 8 月 23 日“一二·九”运动四十五周年座谈会上发言，谈运动的思想准备过程和组织准备过程。他说：“思想准备方面，事前有红军北上抗日，党的‘八一宣言’，号召统一战线，……学生中有一些活动和酝酿……”关于组织准备，“学校里各种各样的读书会，各种各样的学生组织，如雨后春笋，多了……东北大学在‘一二·九’运动中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清华大学不只学生，包括教员都有抗日要求。”黄华只说了学生组织，没有提到党的组织领导。袁宝华在会上接着发言：“赞成黄华刚才讲的，开头思想准备还是比较足的……至于组织准备，党当时的力量比较薄弱，后来在延安看到陈云同志的一篇文章，说当时在华北一共只剩下二十多个党员了。当时，所谓组织准备之一，就是各学校都酝酿成立学生会。……虽然当时组织准备薄弱一些，思想准备还是有重要作用的，就是少数人登高一呼大家就响应了，到处都是干柴，你一点就起来那种形势。”

3. “一二·九”运动与《八一宣言》

黄华始终强调的是《八一宣言》的作用。2004

年我为此事请教过黄华。他说,要说党对“一二·九”的作用,就是《八一宣言》的影响。历史资料表明,“一二·九”请愿游行,提出了团结抗战的口号;从路线问题上考虑,多少是接受了《八一宣言》的影响。

1935年8月,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举行第七次代表大会。季米特洛夫在大会上做了题为《法西斯主义就是战争》的报告,号召建立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当时在莫斯科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康生、林育英、吴玉章等人,根据国际七大的精神,经过反复讨论,由王明执笔,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并以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名义,于10月1日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中文报纸,以后改名《救国时报》,吴玉章主编)上发表。由于这个告全体同胞书是1935年8月1日开始草拟的,所以副标题用了《八一宣言》,以后就索性通称为《八一宣言》了。宣言指出中国亡国灭种的大祸迫在眉睫,宣称“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再一次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阅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八一宣言》还摘要刊登在《共产国际通讯》和《共产国际半月刊》等外文版报刊上。

《八一宣言》发表后,传到国内。大约在10月或11月份,燕京大学的黄华(王汝梅)、清华的姚依林(姚克广)等懂外语的同学先后看到了,遂传到北平学联。北平学联正在酝酿组织发动12月9日的学生请愿。《八一宣言》的精神与学联请愿的要求契合,为北平学联所接受。他们就根据《八一宣言》的精神来组织领导这场学生运动,提出了停止内战、团结抗战的口号。蒋南翔回忆说:“‘一二·九’运动爆发以前,中共《八一宣言》已传到北平。‘一二·九’运动中‘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正是根据中共《八一宣言》的精神提出的要求。”(见《蒋南翔文集》下卷第1155页)“一二·九”运动所遵循的路线,是团结抗日统一战线。这就表明,彭涛这一派在北平临委会上同王学明的多

数派在口号上发生的激烈争论,实质上是两条不同路线之争在学生运动中的反映。不过,他们当时不明白、没有意识到这是路线问题罢了。

这时候,中共中央和红军还在长征途中。尽管遵义会议已经开过,但当时党中央在政治上还在执行反蒋抗日、武装夺取政权的方针。河北省委也还在坚持反蒋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路线。当时,不仅中共北平市临委、河北省委没有见到《八一宣言》,连中共中央也还不知道《八一宣言》。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11月,中共驻第三国际代表团成员林育英(即张浩)回国潜至陕北,向中央传达了国际七大精神和《八一宣言》。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才接受了国际提出的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批评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确定了包括利用地主大资产阶级营垒中不同派别的冲突和矛盾、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

当然,还需指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并非始于“八一宣言”。1931年“九·一八”事变第二天,北平一些国民党员致电国民党中央就提出“请息内争,共抗外敌”;11月4日北平大学教授们也提出“立泯系派之见,共赴国难”等等。在1935年“一二·九”运动发生不久的12月12日,上海文化界救国宣言也提出“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停止一切内战,武装全国民众”。说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乃长期以来的社会共同呼声。

4.“一二·九”学生请愿游行,党中央是事后才知道的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时,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还没有召开,党的政治路线和斗争策略尚未改变。中央怎么可能指示北方局、河北省委或北平市临委去发动、去领导“一二·九”运动呢?后来,毛泽东听到“一二·九”学生请愿游行的消息,感到很高兴。一再说,“一二·九”运动以后,“事情就逐渐好办了”;“现在中国的情况跟过去大大地不同了,现在的事情不是比过去难办,而是比过去好办多了”;“在十二月十日,一听到北平‘一二·九’运动的消息,我们心里好不欢喜!”(《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251—252页)1936年七八月份,毛泽东在陕北会见黄华时又说:“‘一二·九’运动是五四运动以来最伟大的群众运动。

只是因为消息闭塞,在‘一二·九’之后好久才知道。”(黄华著:《亲历与见闻》第25页)毛泽东两次说的具体时间不完全一致,一次说的是“一二·九”的第二天听到,一次说的是“一二·九”之后好久才知道。但是可以肯定,“一二·九”运动爆发时他和党中央并不知道。

河北省委书记高文华,省委委员、组织部长柯庆施,省委委员、宣传部长李大章等,是在12月下旬才代表河北省肯定了“一二·九”运动的作用。

5. 从南下宣传到成立民族解放先锋队

1935年12月16日这天,是宋哲元的“冀察事务委员会”再次宣告成立的日子,北平学生又举行了一次更大规模的“一二·一六”游行示威活动。这次示威遭到了反动军警更加残酷的镇压。12月9日那天他们用水龙、枪托(柄)对付学生,而这次除了水龙外,还用了大刀,不少学生受伤、被捕。

1935年12月20日,报刊头条新闻报道,北平国民党明令解散平津学联。平津学联转为地下组织,继续活动。这时,各校积极分子已发展到2000多人。国民党为了进一步阻止学生活动、分散学生的力量,宣布各学校提前放寒假。当局还进一步提出所谓“晋京聆训”,以分化爱国学生,同学们都愤然加以抵制,先是提出继续罢课,揭露当局的镇压;继而组成平津学生南下宣传团,仿效俄国知识分子“到民间去”,宣传抗日救亡。“北平南下,天津北上”。总指挥有董毓华、宋黎、江明。姚依林回忆说,南下宣传是黄敬首先提出的。他们准备了十来天,把2000多名同学组成了四个团,于1936年1月初分头出发。姚说:学联组织平津各校“知识分子第一次投身到广大劳动人民群众中去,收获很大。这次不仅进行了抗日救国的宣传,同学们亲自感受到劳苦大众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的苦难生活和人民的反抗,受到深刻教育”(见《姚依林百夕谈》第34页)。南下宣传团在所到之处做了一些宣传抗日,发动群众的工作,由于国民党军警的堵截、骚扰和包围,先后回到北平。同学们在艰苦南下宣传过程中深深感受到,要坚持斗争,必须建立一定的战斗组织。为此,第三团和第一、二团都经过全体团员大会通过,先后成立“中国青年救亡先锋队”和

“民族解放先锋队”。

这时中共河北省委已将闹分裂不起作用的北平临委撤销,建立了北平市委,林枫任北平市委书记。1月下旬,林枫找姚依林、黄敬等开会讨论建立民先队的问题。2月1日,民族解放先锋队在北平师范大学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决定把南下宣传团第一、二团在保定成立的“民族解放先锋队”和第三团在高碑店成立的“中国青年救亡先锋队”合并组成“民族解放先锋队”,原“中华民族自卫委员会”并入“民先”。北平民族解放先锋队宣告正式成立。

6. 几个党员在“一二·九”运动中的作用

“一二·九”请愿游行究竟是谁发动的这个问题,姚锦记录的姚依林生前的一段谈话比较可信:“并不是谁有什么高明见解,谈了这段斗争实践后,他深沉地说,当时我们没有听过,也并不懂得什么叫路线问题。只是因为我们本身就在群众中生活,很了解广大群众的思想情绪,知道什么是群众那时可以接受的,实事求是地反映了客观的真实情况而已。……而彭涛是一个踏实肯干、善于独立思考,敢于坚持真理的好党员。”(见《姚依林百夕谈》第22页)他又说:“‘一二·九’运动的真正主要负责人,据我看是彭涛同志。在运动中,在整个过程中,经验最丰富的,组织能力最强的是黄敬同志。尽管他组织关系没有恢复……”(《姚依林关于一二·九运动的一次谈话》《中共党史资料》2007年第4期第96页)

在“一二·九”运动的第二阶段,尚有诸多自发因素,如“三·三一”抬棺游行。

1936年1月底,北平市委建立了学联党团,成员有姚依林、黄敬、孙敬文、郭明秋(“一二·九”运动爆发后由共青团员转党),姚依林任书记。1936年4月,中央派刘少奇到北平之后,又建立了学委(学生工作委员会),遂逐步将学生运动纳入党的领导之下。“一二·九”运动进入第二阶段。

为什么中共将学生运动纳入组织领导之下是逐步的呢?从总体上看,自林枫到北平、党的北平市委重新建立,到1938年11月中央决定民先队停止发展为止,这个阶段的“一二·九”学生运动是在党领导下进行的。不过还要看到,群众运动发展变化总要有个过程。不可能中共党的组织一建立,一场成千上万人参加的群众运动立即就

能改变它的自发性质；不可能党一声令下，就把群众运动纳入到党领导的轨道上来。共产党处于在野地位的历史条件下发动群众，同共产党在全国执掌政权的条件下发动群众，其情形是很不一样的。执政条件下，党可以凭借取得全国性胜利的历史资源和政治威望，运用掌握的巨大行政力量和手段，一夜之间迅速动员国民。在野的条件下，这是不可能的，何况当时共产党正处于高危状态。“三·三一”抬棺游行还带有自发的成分，也就非常自然、可以理解了。

1936年“三·三一”大会是悼念死于监狱的学生郭清烈士的追悼会，是在党领导下，北平学联决定的，而后来发展为“抬棺”游行，却是学生自发的行动，中共党组织是不赞成的。在国民党军警包围、镇压的情况下，学生群众被激怒，自发地行动起来，是控制不了的。笔者认为这是历史，这是学潮，不是什么个人、什么组织能够左右得了的。在它16年前的“五四”和它40年后的“四五”等等青年学生运动也都是这样的。

郭清是北平第十七中学学生，只有18岁。1936年2月份被捕，在狱中受刑致死。消息传出，各校学生群情激动，悲愤交集，斗争情绪很高涨，酝酿进行大规模的反抗。北平学联与各校会商，决定在北大三院召开追悼大会，同时提出希望大家保持冷静，不要有过火行为。

追悼大会由北大学生会主席韩天石主持。3月31日上午，在气氛肃穆悲壮的追悼会上，一位东北籍学生从棺材铺借来了一口空棺材，放在大礼堂中央，白布上挂着郭清的遗像，周围布置着花圈挽联。参加追悼会的学生见到棺材，极为悲愤，一些女生泣不成声。会上散发了宣传品。开会前，军警、特务闻讯赶来将北大三院团团包围，校方更以开除学籍威胁韩天石，勒令立即散会。此举不啻火上浇油，同学们反抗情绪高涨，强烈要求抬棺游行。学联负责人劝阻无效。几个民先队员抬起棺材，不顾军警的刺刀、机枪，推倒北大三院通往孔德中学的后墙小门冲了出去，举行了震惊全国的“三·三一”抬棺游行示威。在北池子大街，队伍被冲散，许多同学受伤，抬棺的李昌胳膊被打伤，黄秋耘后脑勺被打破流血，53名同学被捕，包括17名女生，还有一名新闻记者。这次行动后来被党内有的领导人批评为“左”倾冒险主

义。

在1980年代一次回忆“一二·九”运动的座谈会上，当事人韩天石曾表示，抬棺是群众自发的行动，如此上纲上线，是不妥当的。追悼会前学联党团也曾研究防止过激行动。可是，群众一旦被激怒，是劝阻不住的。

至于“一二·九”运动第三阶段，与本文主题关系不大，就不多说了。

第三，关于“一二·九”运动是不是在中共党领导下发生的争论历史

回到本文讨论的主题：“一二·九”运动是不是在党的领导下发生的？

两种意见——主张不是的，被称作“自发论”；主张是的，被称作“自觉论”。这两种意见，最早出现在延安整风前的1939年。以后，“自发论”受到批判，就无人敢再提了。为了弄清历史真相，我们必须回溯到1939年。

1. 两种意见的提出

据我所知，两种意见最早均出自1939年12月9日延安举行的“一二·九”运动四周年紀念大会上。当时李昌是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的组织部长，大会请他首先讲话。李昌讲话的题目是《“一二·九”运动与民主》。他说：“从运动的本身看来，‘一二·九’运动是具备着许多为历次青年运动所没有的特点的。这就是说：‘一二·九’是自发的，但很快的转成了自觉的运动；是斗争极其尖锐——游行示威和巷战的混合交杂——的运动，同时又有极广大的群众基础，是勃然而起的，同时又是持久的；是学生运动，同时又是学生与各界特别是工农结合的运动。很明显的，这些特点对于目前的青年工作有很大的启示作用和教训，需要我们客观的加以检讨。”（李昌《“一二·九”运动与民主——为纪念“一二·九”四周年而作》，讲话前先发表于《中国青年》月刊第二卷第二期，1939年12月5日）“一二·九”运动“自发论”的观点是李昌第一个明确提出的。

李昌讲话之后，大会请毛泽东讲话。毛说：“‘一二·九’运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同志们都知道，刚才李昌同志也讲过。”毛对“一二·九”运动的评价很高，批评了那种说“一二·九”运动不如

“五四”运动的观点,说:“‘一二·九’运动以后,事情就逐渐好办了……‘一二·九’运动的功劳都是很伟大的。”他讲话的第三点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一二·九’运动和中国共产党关系是怎样呢?”他说:“毫无疑问,‘一二·九’运动中共产党起了骨干的作用。没有共产党作骨干,‘一二·九’运动是不可能发生的。”他接着说,“一二·九”运动“是共产党北方局和上海等地党组织的直接领导。这样,才使‘一二·九’运动发生,并使之在全国各阶层开展起来,形成了全民族救亡运动的巨大政治力量。”(见毛泽东:《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250—260页)毛泽东的讲话,就这样笼而统之地说出了“一二·九”是在党的领导下发生的,肯定了党对“一二·九”运动的领导。

1940年12月9日,“一二·九”运动五周年,延安照例举行纪念大会。作为当时公认的“一二·九”运动的代表,李昌又一次应邀讲话。这时,他似已意识到自己去年在纪念大会上的讲话简单了些,不够全面。因此,在这次大会上讲话时,就说得较上年全面了。他说:“‘一二·九’的发动,本来就有中共‘八一宣言’作思想前导,有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作领导核心,因此继‘一二·九’游行之后所开展的全国青年运动,就具体反映着中共的青年运动政策,反映着青年团的行动方向。而在‘一二·九’基础上所产生的全国学联,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以西北为中心直接由团改造成的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就成为鼎足而三的继承中国学生运动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传统的三大青年团体。……由此可见,只有在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民主地区,中国学生运动才能得到新的发展,而且它的发展将因各地青年工作者的注意和帮助的加强,而达到更高的程度。”(李昌《“一二·九”和今天的学生运动》《中国青年》第三卷第三期,1941年1月5日)需要注意的是,即使这样,李昌说的还是“八一宣言”做“思想前导”,党员团员做“领导核心”,“继‘一二·九’游行之后”的运动才“反映着”党的政策,而不是笼统、简单地说“党的领导”。

持“自发论”观点的不仅有李昌,还有蒋南翔、黄华、姚依林,还有陈伯达。袁宝华也有类似的看法。李昌在1939年延安纪念“一二·九”运动

四周年大会上第一次说“一二·九”运动是自发的。蒋南翔也曾写道:“尽管‘一二·九’运动开始是自发的、公开的、合法的,但学委建立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体现出来了。”(《蒋南翔文集》下,第1198页)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曾向当年燕京大学学生会主席黄华同志请教。黄华说,“一二·九”开始是自发的。要说同党的关系,是有影响,《八一宣言》的影响。当《八一宣言》传到北平后,燕大、清华有几个进步学生首先看到,然后才传给学联的。

在延安整风前后,毛泽东已是党的领袖,他的话一言九鼎,成了定论。李昌的“自发论”在中央青委受到批判。此后就没有人敢于公开发表不同意见了。1980年代,姚依林已位居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讲了一系列事实真相,同时也特别嘱咐:去世后才能发表。

2. 对毛泽东在纪念“一二·九”四周年大会讲话的两种解读

当时的中央青委副书记冯文彬理解,毛泽东讲话肯定了“一二·九”运动是在党的领导下发动的。冯在1940年10月25日党中央的机关刊物《共产党人》上发表一篇题为《坚持青年工作的岗位》的长文,批判青年工作中的“先锋主义”和“第二党”工作方式以及不尊重党的领导的错误。文章针对李昌主张青年工作要有相对的独立性,要实行民主,要抛弃模仿党的一套政治化的工作方法方式,改变缺乏民主化与青年化的作风等意见,提出批评。

尽管如此,李昌并未改变“一二·九”是“自发”的认识。

1941年春,中央青委机关开始“检讨”,总结工作。对当时所谓工作中的失误,进行了批评,这实际上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前奏。

李昌坚持自己的意见,对毛泽东的这个讲话有他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毛说党领导了“一二·九”运动,是就历经三年的“一二·九”运动总体而言,并不是说运动一开始就是党领导的,毛说的北方局、上海等党组织直接领导,是指“一二·九”第二阶段后的情况。于是,青委内部发生了争论。李昌这些意见(包括在“一二·九”四周年会上讲话)反映出他眼中的“一二·九”运动在发动和爆发阶段的历史特点:一次勃然而起又是持

久的,具有广泛群众基础又富有知识青年特点和自由民主精神的,自发而有相对独立性的抗日救亡运动。

1941年5月4日,中央青委副书记冯文彬又在《共产党人》发表《党的青年工作者的党性问题》一文,将青委“检讨”的结果归纳为十二个问题。文中严厉批判青年工作缺乏党性,历数青年工作中的严重问题,如:过分强调青年工作的独立性、先锋主义、本位主义等问题。在批评青年团体、青年运动中忽视或否认党的领导作用这一严重问题时,举的例子就是“一二·九”运动。冯文彬写道:“过分强调革命青年团体开辟党的组织与工作的作用,而忽视了或否认了在历史上青年运动中的党的领导作用。如在‘一二·九’运动中只强调青年的作用,而没有看到当时党的领导作用。”

中央青委检讨结束后,给中央送了检讨的报告,还送上了一份把李昌调去华北工作的决定。中央批准了这个决定。1942年春,李昌辞别了工作4年的中央青委,偕夫人携刚出生的女儿离开延安去华北。他们路经晋绥边区时,被中央晋绥分局书记贺龙留下,任命为晋绥边区兴县县委副书记。

第四 结论和应该怎样对待历史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何谓党的领导?

评判一场运动、一个组织的发生发展有没有党的领导,关键在于实事求是地考察清楚以下两点:

一点是,党的组织系统是否自上而下地部署、发动并控制其发展?

另一点是,在这个运动中,党的指导思想是否得以贯彻,基本政治口号是否和该党吻合,党的路线、纲领以及方针政策是否得到执行(执行政策上的具体问题则不应强求。)

据此两点来考察“一二·九”运动的三个阶段,可以看出:

第一点,第一阶段具有明显的自发性质,谈不上中共党组织的领导。

不错,个别党员参加了“一二·九”运动的组织领导工作。但是,根据历史资料来分析,参加组

织学联、发起“一二·九”运动的4个核心人物中,只有两个党员:彭涛和姚依林。黄敬尚未恢复党的关系,郭明秋还没有入党(是共青团员)。他们每个人对运动都起了重要的骨干作用,但只是个人身份,不代表任何一级党的组织。实际上,当时北平临委是反对组织学生群众合法斗争的。彭涛是北平临委成员,但已被撤销了职务。他们甩开了临委,参与筹建北平学联,参与组织、发动了抗日救国的“一二·九”学生群众运动。这一点非常重要。

此外,很多党外人士也起了重要作用。如主张郭明秋当学生会主席的女一中校长孙荪荃,进步教授张申府(中共创始人之一,当时已脱党)、吴承仕、许德珩等。

第二点,其实更为重要:“一二·九”发动请愿的指导思想,亦即所遵循的路线、方针与当时党的路线、方针是否一致?史实表明是不一致的。

如前所述,当时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刚刚结束长征,还在执行反蒋抗日的纲领、路线。中共党的各级组织还没有接受《八一宣言》建立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当然不可能自上而下地部署、发动和控制北平学生和平请愿的运动。受《八一宣言》影响、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一二·九”运动不可能与党中央当时的路线一致。这是历史的真实,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历史的事实表明:“一二·九”运动是自发^[1]的,其发生和爆发阶段没有党的领导。到了1936年初,北方局派林枫到北平,重新建立了北平市委之后,学生运动才逐步走上了中共领导的轨道。这就是结论。

最后,我们要检讨一下对待历史的态度。

我们要尊重历史事实,不能为权者讳。真实地记录历史,是每一个修史者的责任。在中国历史上,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美化帝王成了惯例。中国共产党胜利了,就把一切成绩和好事都归于党的领导,甚至都归于最高领导人英明,这与封建专制社会的传统一脉相承。我们必须抛弃这种陋习,还历史本来面目。

注释:

[1] 1936年5月,李昌被调去北平民先总队部接任敖白枫的总队长职务。李昌认为,自己这个总队长没有经

过大家选举,是不符合民主程序的。他主张民先队从总队到各级领导都要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他的主张获得通过,决定民主选举,改善各级领导,选出能力强、态度积极的人担任各级队长,提高民先队的政治素质。在各区队、大队、小队都经过民主程序选举出了负责人之后,8月份,北平民先总队召开了代表大会,总结半年的工作,民主选举新的总队领导。李昌当选为北平民先总队队长,是为第二任。大会还选出了总队部领导集体:杨雨民、杨克冰(女)、孙传文等,组成了北平民先总队部。

[2] 民族解放先锋队成立之初,组织机构为四级:总队、区队、分队、小队。最高的领导机关是北平总队部。总队部以下按地区设区队部。区以下以学校为单位成立大队或分队。当时北平全市有5个区队,城里4个区队,即东、西、南、北区队,城外1个区队:西郊区队(清华、燕京)。

1936年暑期,总队接受李昌建议:动员同学利用假期回乡机会发展队员,组织民先队。10月统计,国内有民先队组织或队员的市县除平、津两地外,还有西安、济南、唐山、长辛店、开封、烟台、武昌、汉口、苏州、南京、成都、保定、青岛、广州、香港、上海、太原、宣化、杭州、洛阳等,法国里昂、巴黎和日本东京等6个外国城市也有了民先组织。国内外有民先组织的县、市已达30个。

各地民先队建立起来后,大多接受北平民先总队部的指导,实际上北平民先总队已成为全国民先队工作的中心。这种情况下,有的地方民先队提出希望有一个全国性的组织机构,领导全国民先的工作。

1936年12月,中共北方局决定把北平民先总队改造成为全国性的组织。于1937年2月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选举了全国民先总队队长。

[3] 《姚依林百夕谈》,为姚依林与其堂妹姚锦于1984年4月至1988年3月谈话的记录,由姚锦编著。谈话是间隙、持续进行的,多次谈话概括称为《百夕谈》。谈话结束时,姚依林不同意当时发表或出版,说:“……我死了,你就可以拿去发表出版。”姚锦按照他的嘱咐,于姚依林逝世的第二年,才交《传记文学》在1995年下半年分几期全文发表。1998年姚依林逝世4年之后,才由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

[4] 《姚依林关于“一二·九”运动的一次谈话》是1982年8月12日范瑾、兰铁白、邵红叶、吴方、黎先耀等5位同志根据胡耀邦的指示拜访姚依林时的访谈记录,由兰铁白整理,刊于《党史研究资料》2007年第4期第92—101页。访问开始,范瑾说:“耀邦同志要郑伯克同志

传达指示:写纪念黄敬同志的文章。……要写全面,从‘一二·九’运动到一机部都可以写。……现在想请您谈谈‘一二·九’运动,以及对黄敬同志的评价。”黄敬于1958年2月10日去世。胡耀邦要写纪念黄敬的文章,请黄敬的夫人范瑾同志来写,为此范瑾等几个人访问了姚依林。黄敬、姚依林是“一二·九”运动的发起人、当事人,姚依林谈黄敬、谈“一二·九”运动,是难得的第一手历史资料,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

[5] 本文所说的学生(或群众)自发的运动的“自发”与哲学概念上的“自觉”对立面的“自发”是不同范畴,不能混淆。因而也不能认为共产党领导的运动就叫做“自觉”,就达到认识和必然的统一,就是科学的、正确的;反之就叫做“自发”,就是盲目的、不科学的。

参考文献:

《姚依林百夕谈》 姚锦编著 中国商业出版社
1998年12月

《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7年8月

《姚依林关于“一二·九”运动的一次谈话》 1982年
8月12日范瑾、兰铁白、邵红叶、吴方、黎先耀访谈记录,
《党史研究资料》2007年第4期

《蒋南翔文集》下卷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8年4月
《“一二·九”运动回忆录》第一集 人民出版社 1982
年5月

谷景生:《“一二·九”运动与党的领导——为纪念“一
二·九”运动六十周年而写》

《缅怀“一二·九”运动的领导人——彭涛同志》 作
者:谷景生 高惠如 郭明秋 姚依林 孙敬文《人民日
报》1986年12月14日

郭明秋:《回忆“一二·九”运动的党的领导》,载《“一
二·九”运动回忆录》第一集

谷景生:《回忆“一二·九”运动与北平地下党》载《党
的文献》2001年第2期,《人民日报》1995年12月9日

张如贤:《谷景生与“一二·九”运动》,载《谷景生与
“一二·九”运动》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6年9月

谷景生:《历史深处听惊雷》

林炎志:《做工人阶级的青年先进部队》——纪念“一
二·九”运动七十周年》

马钟嶽:平津《十校宣言》与“一二·九”《纵横》2007
年第9期(总第213期)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李炳泉在北平和谈中的真实身份

● 诸有琼 遗稿

1947年底我和同学李树藩相识。1948年7月中共南方局职业青年支部成立,李炳泉担任支部书记,树藩是支部委员。我当然不知道他们是地下党员,那是党的秘密。炳泉家住东城迺兹府大草场甲16号,这是我们多次去的地方。他和树藩谈“正经”事时,我就和他的夫人刘可兴聊天。1948年我和树藩结婚后,炳泉也到过我们在东皇城根62号的家。这里后来成为地下党的一个联络点。

为了保护文化古都北平的文物和二百万人民免遭涂炭,地下党从多条途径做“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的工作,争取和平解放北平。李炳泉曾经在傅作义办的《平明日报》以采访部主任为掩护职业,加上“剿总”少将联络处长李腾九是炳泉的堂兄,因为有这些有利条件,1948年秋,地下党决定把炳泉从职业青年支部调出,专门做傅作义的工作。他就是最先向傅作义转达党中央和谈意图的人。从那时起,我就看不见炳泉的踪影,但也从不打听他的下落。直到北平和平解放,炳泉随解放大军进城见面后,谈及他作为我党代表,参与了北平和谈工作的全过程,才知道他这一段传奇式的经历。

北平和谈的史实,在党史、解放军战史中都有详明的记载。1951年放映的大型文献纪录片《中国人民的胜利》也有中共代表李炳泉引导傅方代表崔载之到达天津前线司令部时的场面。但在十年浩劫中,李炳泉被迫害致死,还说李炳泉在北平和谈中投靠国民党,是傅作义派出的谈判代表,有叛特嫌疑,以致在关押中受到残酷迫害,含冤致死。

“四人帮”垮台后,李炳泉冤案得以平反昭雪。党组织特别肯定了李炳泉在北平和谈中受党派遣,代表北平地下党参加和谈工作,为人民立下了功绩,当时《人民日报》、《北京日报》都有专文报道。当年北平和谈亲历者中共方面的余涤清、崔月犁,傅作义方面的周北峰、李腾九所写的回忆录也都有翔实的记载。按说,这桩冤案已彻底澄清,应该了结了。

然而在“文革”之后,明明是“文革”中对李炳泉的诬陷之词,却又公然出现在某些史料及传媒中。

经查证,这种敌我混淆的错误言论原来始见于当年曾任“华北剿总”《平明日报》主编杨格非的文章。他在《北平和谈二三事》中说:“北平和谈……第一次的代表是崔载之、李炳泉。”“崔、李接受的



北平和平解放,很多像李炳泉这样的地下工作者立了大功

关于和谈的指示多是原则性的……”(见1979年《文史资料选编》第四辑。)为此,李炳泉的家属曾专访杨格非,向他详述了北平和谈的经过。说明:

李炳泉是中共北平地下党派出的参加和谈工作的代表,不是傅方代表。进行和谈时,李已离开《平明日报》一年之久,与《平明日报》毫无关系。他此时的掩护职业是北平铁道管理学院中等技术科的教师。说李炳泉是傅作义派出的代表,是“文革”中造反派的恶意诬陷,早已平反纠正。

但在建国50周年时,杨格非又发表《傅作义的心路历程》坚持说:“傅第一次所派的与中共和平谈代表是《平明日报》社长崔载之、采访部主任李炳泉。”(见《炎黄春秋》1999年1月)

无独有偶,当年曾任“华北剿总”政工处长的王克俊,在《北平和平解放回忆录》中说:“我便与傅先生商定,派《平明日报》社长崔载之、李炳泉为代表……”(见1980年文史资料选编第六十八辑。)中共党史早已说明,指派中共党员李炳泉参加北平和谈工作的,是中国共产党,不是傅作义,更不是王克俊。

由于北平和谈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热门话题,杨格非、王克俊又曾是当年“华北剿总”一方的人士,因而他们笔下所写的,就格外引人注目,从而产生误导。据知,北平和谈是在绝密中进行的,国共双方参与策划者,仅限个别上层领导。为了确保安全,当时李炳泉作为北平地下党代表的身份,也绝不能公开。

建国后,在1950年中苏合拍的大型文献纪录片《中国人民的胜利》中,摄入了中共北平地下党派遣李炳泉为代表,引导傅方代表崔载之到达平津前线司令部,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的代表接待的几个镜头,李炳泉作为北平地下党代表的身份公开载入史册。

然而,在某些书报中把中共北平地下党所派参加和谈工作的代表李炳泉,却说成是傅作义的和谈代表。

例如北京市档案馆编著的《北平和平解放前后》(1988年12月,赵家鼐等编)对中央军委的电报多处注解错误。如说“李炳泉……作为傅作义的代表,参加了北平问题的谈判。”(第50页)“傅作义的代表崔载之、李炳泉到涿县东北野战

军第十一纵队驻地,要求谈判。”(第509页)

其他散见于报章、杂志以及人物传记中涉及北平和谈的错讹之处不及备述。现在仅介绍其中一件令人惊叹、痛心之极的事例如下:

1999年隆重纪念北平和平解放50周年的庆典中,在中共北京市委领导下组织了一系列纪念活动。其中介绍北平和平解放的光辉历史时,竟也公然出现敌我混淆歪曲党史的错误,也把中共北平地下党派出的参加北平和谈工作的代表李炳泉,说成是国民党傅作义派出的代表。

如《北京青年报》1999年1月26日第13版,有长文题为《五十年前,“三大法宝”拯救北平》,作者徐达、赵晋。该文对李炳泉作如下介绍:“地下党员李炳泉作为傅作义的谈判代表崔载之的副手,参加了三次谈判的全过程。”

《光明日报》1999年1月29日第7版,也有长文题为《彪炳史册光耀千秋》,作者同为徐达、赵晋。该文对李炳泉作如下介绍:“傅作义……遂派北平《平明日报》社社长崔载之、报社采访部主任李炳泉(中共地下党员)携电台……出北平城……”

李炳泉的家属曾为李炳泉的形象横遭歪曲而提出抗议,要求北京市委有关当局为党史、党员负责,公开澄清错误消除不良影响。但回答却是“捂盖子”,以回避错误了结。

令人百思不解的是,和谈期间,李炳泉的政治身份甚至前线司令部的接待人员参谋处长苏静也不清楚。他在回忆录中说:“李炳泉对和谈表现了高度的热情与胆识,他说自己是共产党员,我还不相信。”“李炳泉为傅派出的代表,由他传达对方的意见,名正言顺。”(见《回忆北平和平谈判》,1991年解放军出版社。)他详述了何思源等为北平和平解放奔走,却只字未提北平地下党做出的贡献。

现在看来,当年李炳泉参加北平和谈及其身份问题,只有北平地下党的领导人清楚,亡羊补牢难道不应该吗?

试想现在党的领导作风如此,党的形象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可知。但令人担忧的是,李炳泉被诬为傅作义代表的这一冤案,又何了了呢?让炳泉同志在天之灵得以安宁吧!

(责任编辑 杨继绳)

外国人怎样研究中国

● 陆亨俊 遗稿

1978年6月,我到新华社布鲁塞尔分社工作,分社负责欧共体(欧盟前身)和北约两个总部以及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三个国家的报道工作。当年11月,以交通部长叶飞率领的中国代表团访问荷兰,当时我国驻荷大使是丁雪松,她是新华社的前辈(新中国成立初期是新华社平壤分社社长),对分社工作非常支持,使馆把我的名字报给荷兰外交部作为随团记者,参加整个访问过程。荷外交部不但同意,而且邀请我在代表团结束访问后再留下一周,在荷兰各地采访。代表团访问了10天,考察了航运、港口建设与管理、造船等项目,商谈了两国的合作问题,还参观了世界最大港口鹿特丹港、举世闻名的围海造田。我一个人留下来的时间里,还参观了三个博物馆、两家报社、一所研究所和一所大学。这半个月的访问是我第一次对一个国家做比较系统的采访(荷兰方面也认为这是他们正式邀请新中国第一个记者对他们进行采访,所以安排得很周到),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但是最使我感到惊诧的是我在访问莱顿大学汉学院图书馆时,看到两位金发姑娘在读《孟子》和许多关于中国的图书资料。因此,我在布鲁塞尔分社的4年中,我又两次去莱登大学采访,想具体了解一下外国人是怎样学中文和研究中国问题的。

—

在欧洲最早研究汉学的是荷兰人。在英国人到亚洲以前,荷兰和葡萄牙的商人就到了广东、福建和台湾,中国的瓷器和茶也通过荷兰商人被远销到西欧(茶在荷兰文中是tea,发音如同dan,这与闽南话“茶”的发音相同;英文和法文中的茶字都和荷兰文一样,只是发音不同)。1626年(明朝天启六年)荷兰的传教士就编纂了一本《中-荷-拉丁字典》。莱顿大学于1875年设立了第一个

汉学讲座,首任教授是薛力赫,他与法国汉学家柯狄尔共同创办了专门研究汉学的杂志《通报》,是西方最早出版的一本汉学杂志。1930年,当时荷兰最著名大学之一的莱顿大学正式成立了汉学院。

我第一次去访问时是伊维德教授接待的,他专门研究中国古代小说和元明杂剧,他刚把王实甫的《西厢记》译成荷兰文。据介绍,汉学院是六年制,现有学生100多人。一年级新生(每年都有50—70人)入学后,头两周每天上课5小时,每周学50个汉字,我看了课本第一课是“人、刀、力、口、土”。第三周开始,每天两节课学汉字,四节课在电化教室学口语,我看第一课是:“郭先生你好!我很好,你呢?好,谢谢你。郭太太和郭小姐也好吗?她们也很好,谢谢。”这些课本都是美国出版的,有英文的注音和解释。伊维德教授还说,一年级要学900个汉字,要基本上掌握汉语的各种句型、能简单对话。还要学中国历史、文化、哲学方面的基本知识。他说,这个要求不低,常常有近一半学生升不了二年级。二年级开始学古代汉语,同时学习中国近代史和中国文学史;三年级学的古典文学,包括朱熹的《孟子集注》、袁枚的《子不语》和《古文观止》,还选读中国现代作家的短篇小说,同时学习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地理等课程;四、五年级学生在教师指导下结合专题研究进行学习(很少到课堂,主要泡在图书馆里)。其中少数被公派到中国留学1—2个学期,六年级集中写毕业论文。

二

我第二次去访问时,专门采访了汉学院院长许理和(这是他的中文名)教授,他是专攻中国思想史的,1959年他的博士论文是《佛教征服中国》(1972年在荷兰出版,1998年中国出了中译本,共632页),主要是讲公元四五世纪早期佛教在中国

的传播。这次历时一个多小时的访问非常有意思，许理和教授一开始就说，他中文的口语不好，允许他用英文讲，但是他希望我讲中文，他可以练习听。

这对我也是求之不得。许理和说，他在写这篇论文时，先后曾参考了80多本（篇）中文书和100多本英、美、法、德、印度和日本学者的著作，还是花了一些工夫的，不过这也使他迷上了中国的文化和思想史的研究。他最近几年主要研究“外来思想”对中国的影响问题。

许理和说，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三次重要的“外来思想”。第一次是魏晋南北朝时，佛教的传入与传播。第二次外来思想是指明末清初的基督教文明的传入，除了基督教教义本身以外，还伴随着传入了当时西方的科学和技术，如数学（几何、三角等）、天文（汤若望和南怀仁两个传教士还担任过“钦天监”负责制订历法）、机械（如钟表、望远镜），以及地理、医药和西方的绘画知识等，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第三次外来思想是五四运动前后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入，促使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经过艰苦奋斗，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许理和认为，这三次外来思想都是从西方传入的（佛教是经过西域传进来的）。“全盘西化”是不对的，也是不可能的（日本学西方，也没有全盘西化）。但是，历史证明中国是有“兼蓄并容”（他这时用蔡元培的话）外来思想的传统，并加以本土化的。

当然这是一个外国人对中国的研究和看法，只是给我们参考。不过也可以看到，像许理和这样的学者还是很有功底的，研究工作也是严肃认真的。

汉学院有12位博士和4位讲师（都是欧美人），他们所教授的课程一般都根据他们的专长和所研究的问题来定，大致上分两大类：一是关于中国历史和古典文学的研究，如两汉南北朝史，中国道教的起源和发展，古代中国建筑史特别是《鲁班经》的研究，明清时代安徽商人的历史作用，明末清初的中荷关系（主要是荷兰与台湾福建的关系）等，还有一类是现代中国的研究，如中日关系的历史、现状和前景，当代中国的社会心理，中国农村问题（重点研究岭南和关中地区），中国的民族问题，东南亚华侨史，中国书法，卞之琳作品研究等。

许理和还告诉我说：“最近有两位教师写的人物传记可以定稿出版，一本是《郑成功传》，另一本是《廖承志传》。”

三

莱顿汉学院的这些研究成果得益于收藏十分丰富的图书馆和资料中心。

我在第一次走马观花访问时就很吃惊，除了看到金发姑娘在读《孟子》以外，在图书馆的另一隅，我看到两个男学生在仔细地研究几张地图，一张地图上印有WeiHo几个英文字，我一时想不起是什么地方，一个学生用汉语告诉我，这是陕西省渭河流域的地图，是根据卫星照片绘制的；另一个学生看的则是天津地区的卫星照片，一张是1960年代拍的，另一张是不久前拍的，这位学生用英语对我说，这里是新开的河道，那里是新的居民区……他们说，作为学习“中国地理”这门课，学生都要来图书馆研究从美国买来的中国各地的卫星照片。我当时感到十分惶惑，我国大学里地理专业的学生能不能看到这一类的卫星照片？

汉学院有两位美籍华人，一位是教务主任梁先生，另一位是图书馆馆长兼中国资料中心主任马大任。马先生说，这里是西欧最大的中文图书馆，拥有中文图书16万册，有关中国的外文书2万多册，各种报纸杂志3000种（其中2200种是过去出版现已停刊，有的已制成缩微胶卷），这些报刊有一半是大陆出版的，其余一半是香港、台湾和海外华人的报刊。以大陆出版的杂志来说，种类繁多、五花八门，我看到的有《红旗》《儿童时代》《瞭望》《化石》《大众电影》《遗传》《人民文学》，还有《中山大学学报》。单以上海出版的杂志就有《收获》《上海文学》《上海文艺》《上海戏剧》《上海教育》《上海农业科技》《党的生活》等20多种。

各种书籍按经、史、志、文和现代政治、经济、文学、哲学几大类编目。林林总总，十分丰富，特别将解放前的、大陆和港台出版的按主题放在一起，查阅很是方便。“志”的部分则收藏了大量的地方志，据说还相当全。中国古代白话小说方面也很多，而且版本十分可贵，我在书架上就拿下一部《三宝太监西洋记》，是明万历年间刊行的，是难得的珍本。在那2万多册外文书中最多的是英文，但

也有不少是法文、德文、俄文、日文的书。我在书架前大致看看,在书名中就可以看到不少“反共反华”的内容,但是我也有所发现,例如有关《易经》研究的外文书籍就有十多本;美国著名女作家赛珍珠(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有关中国的几本小说的各种版本和其他国家的文本,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据马主任介绍,这里有三类资料的馆藏是

很可贵的。一是对敦煌资料的收藏,包括与我国相比可以说是数一数二的,这里不但收集了解放前和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出版的有关敦煌的书籍、画册、论文、资料,而且收集了世界各国有关的文献和部分可以买到的实物,其中一部分已经上了书架,大量的还收藏在几个大木箱子里。二是收藏了一部分很有价值的太平天国的文献资料,其中有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于太平天国壬子二年(1852年)奏天王洪秀全准颁的诏书。还有《太平礼制》《太平军目》《太平条规》,以及太平军编的《三字经》(1853年出版)、《新历》等等。还有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在香港、东南亚和西欧出版的有关天平天国的报道、评论和文献,也是很难得的。三是著名的汉学家高罗佩(1910~1967)生前所收藏的许多珍稀的中国明清时代的书画,在他去世后全都捐给了汉学院。高罗佩通14国语言,汉学造诣尤深,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还写了长篇小说《狄公案》(以唐代名臣狄仁杰为主角的破案故事,共130万字,国内已有译本)。



1982年4月29日日本作家陆亨俊(左三)在荷兰莱登汉学院采访,左四为汉学院院长

令部”出版的小报,也有国家机关“造反组织”的“给牛鬼蛇神的通令”、“大批判专栏”、“首长讲话”,还有各地武斗的“血案纪实”、“最最最强烈的抗议”等等。据介绍,这只是一小部分,大部分已制成缩微胶卷(每个胶卷有1000张胶片)。管理员拉出一个抽屉,里面满满的都是胶卷。据说,在“文革”期间,美国的情报机关在香港高价收购大量从内地流传出去的小报,对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形势进行分析,1970年代以后就分门别类,复印装订成册,在国际上出售。莱顿大学的这些资料都是从美国买来的。至于当时在香港和台湾出版的有关“文革”的资料、书籍更有一大堆,诸如《红卫兵造反演义》《×地武斗始末》《××部夺权记》《九死一生实录》等等,名目繁多。

我们新华社每天都出《参考资料》,其实几个大通讯社也都有,我就看到路透社出版的“参考”,其中主要是苏联和中国的材料(那也是可以公开订阅的)。这不稀奇,难得的是美国人在香港出版的《中国大陆现况汇报》《中国每日报告》《中国大陆报刊选译》《中国(地方)广播选译》这四份刊物都是每周出6本,每本40—60页,已全部译成英文。还有一份华盛顿出版的《中国报告》,每周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分专刊出版。新出的还在书架上,旧的都装成合订本收起来了。在这些陈列着合订本的书架上,我还看到一本厚厚的《工作通讯》,我打开一看,原来是我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出版的、给团以上干部阅读的内部刊物,据说有人把

四

看了当代中国的资料就会感到强烈的震撼。

我的面前是美国华盛顿出版的二十大本厚厚的《红卫兵资料》,共计8000多页,主要是红卫兵小报,有《新北大》、清华《井冈山》,有上海、广州、长沙,甚至哈尔滨、乌鲁木齐、拉萨各地“红卫兵司

1961 年全年的一套偷带出国 , 卖给了美国 , 我所看到的已经是译成了英文的合订本。不必问了 , 这也是从美国买来的。

不过最令我吃惊的是 1982 年我第三次去采访时 , 马大任先生还拿出一包材料 , 打开一看 , 原来是 1978 年至 1979 年间“西单民主墙”部分大字报选 , 以及已被中国政府宣布为“非法印刷品”的小册子和传单。我随口就问 , 从哪里搞来的 ? 他没有正面回答 , 而是说 , 现代复印技术只要有了一份就会有成百上千份。作为学术研究 , 这些材料在多少年以后 , 有的东西还是很有用也很有价值的 , 毕竟这是历史。你可以批判它 , 但是你不能否认他的曾经存在和作用。

马先生还说 , 从整个中文图书和资料的收藏来说 , 英国、法国、德国收藏的要比荷兰多得多 , 但是都分散在各研究机构和大学里 , 而荷兰政府对中文图书资料却实行高度集中政策 , 凡是中文图书都要集中到莱顿汉学院来 (包括国家图书馆以及外交部和教育部收集的在内 , 有两本以上的单位可自行保存)。图书馆也有条件地向社会开放。荷兰朝野谁要了解中国问题都可以到这里查询 : 好几个官方的代表团访华前也来听取有关介绍 ; 1977 年荷兰公主贝亚特丽克丝 (1980 年登基为女王) , 访华前也曾来过这里。有的公司和中国做生意也来找资料 , 各部门收集到的中文材料也拿到这里翻译。汉学院自然成为全荷兰研究中国问题的中心了。

五

虽说这已是近 30 年以前的见闻了 , 但每想起那些事总有很大的感触。1982 年离任回国后 , 我也写过一些文章在有关的报刊上发表 , 但由于当时的条件都没有做细致的报道。近年来 , 有些事引起我想重新整理这篇文章的意愿 :

第一是报上报道世界各国兴起了学习中文的热潮 , 中国有关部门也在积极推广“孔子学院” , 有些人好像很得意 , “中华文化发扬光大了”。所以我想客观地介绍一下外国人过去是怎样学中文的 , 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们都记得 100 多年前 , 许多中国人就开始学英文和法文了 ; 解放前在一些大城市里小学三四年级就学外文了 , 不知道当时英国人和法国人也在“发扬光大” ? 现在人家有几

家大学把学习中文当做选修课 , 而我们却在幼儿园里把英文作为必修课 , 这又说明什么呢 ? 外国人学中文的人多了和中国人学外文的人多了 , 我认为这是好事 , 这说明全球化的趋势在加速发展 , 我们正在赶上这个形势。但是完全没有必要就自吹自擂起来。当然 , 我们为外国人学中文提供一些教材、音响制品 , 也是应该的 , 像英国的 BBC 提供《Follow me》(跟我学) 一样。至于孔子是不是就是中华文化的唯一代表 , 而都叫“孔子学院” , 那也可商榷 , 不过有人宣扬 21 世纪人类要靠孔子思想来“拯救” , 那却是荒唐的。十多年前 , 原巴黎分社的杨起同志有一篇非常精彩的《专访法国总统》, 希拉克说 , 法国在启蒙运动、文艺复兴和法国大革命中都有建树 , 但这完全不意味着可以教训别人 , “每当法国想教训别人时 , 她就迷失了方向 ; 每当她自守自爱时 , 别人就愿意听取她的意见……法国不要试图教训别人。”这是智者的语言 , 很值得我们深思的。

第二是我们对历史事件和历史资料的态度问题。近几年是中国重大历史事件的“重大节日” : 2006 年是发动“文化大革命”40 周年 , 当年真是天下大乱、大灾难啊 ! 同一年也是粉碎“四人帮”30 周年 , 那时是全国一片欢腾啊 ! 2007 年是“反右斗争”50 周年 , 几个月时间里就揪出几十万个“右派” , 可说是“战果辉煌” ! 2008 年是“大跃进”50 周年 , “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 吃饭不要钱 , 结果饿死多少人 , 恩格斯说 , 一个伟大的民族要善于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我们这个民族应该是一个伟大的民族 , 不过这几年对这些教训好像没有什么声音 , 文章也极少 , 似乎大家都不记得“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这句话。可是在海外关乎这些的文章、书籍却不少。所以每当我想起在莱顿大学汉学院看到那一大堆“红卫兵”小报和关于中国的资料 , 我的心是不平静的 (荷兰只是一个小国 , 就有这么多的资料 , 美国、苏联、日本等国肯定会更多 , 而且我听说他们的资料早就信息化 , 用电脑储存、联网 , 数量更大了)。许多事我们自己不让说 , 港澳同胞、台湾同胞会说 , 海外华人会说 , 外国人也会说。在信息社会里 , 我们一手遮不了天。对于历史事件 , 我们可以歌颂它、批判它 , 但是不能掩盖它 , 更不能伪造它。历史就是历史 , 中国人不研究 , 外国也会研究。

(责任编辑 杨继绳)

“内人党”冤案亲历记

● 哈斯格尔勒

1967年，滕海清来内蒙古担任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对内蒙古实行全面军管。

1968年1月10日，根据由南方支边来内蒙古大学的一位历史教员捕风捉影的情报，在自治区革委会核心组几个负责人的策划下成立了挖新、老内人党的工作小组。

1968年2月4日，滕海清带着李树德（内蒙古革委会副主任）向康生、江青汇报准备挖“内人党”，得到首肯，并得到康生的指示：“内人党至今还有地下活动，开始可能揪得宽点，不要怕！”

1968年4月14日—26日，在郭以青的指挥、策划下，对时任内蒙古大学党委副书记的巴图进行“车轮战”式的审判。酷刑下巴图编造了假口供，指认鲍荫扎布等16名厅、部、盟、市级干部是内人党骨干。这16人立刻遭到秘密逮捕并分别设立专案进行突审。

1968年4月26日，高锦明签发了由“滕办”主任李德臣起草的《关于“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叛国案件的报告》，直接报送了党中央毛主席、中央文革。

在全内蒙古范围内一场骇人听闻的挖“新内人党”运动就开始了。

这次从金字塔的顶端发动、领导、布置，不断督战的运动之火，到了金字塔的最底层，火就越烧越旺越大，到后来已发展到无法控制，给国家、给蒙古民族、给内蒙古地区造成的损失是永远无法计算和估量的。

现在我们就官方发布的数字，仅看一下能数得过来的损失，就可见一斑了：

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的起诉书指控：“内蒙古自治区因‘内人党’等冤案，有三十四万六千多名干部群众遭到诬陷迫害，一万六千二百二十二人被迫害致死。”

曾任内蒙古党委第二书记的廷懋就“内人党”冤案于1981年8月1日致信黄克诚说：“内蒙在‘文革’中打‘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和挖‘新内人党’，死两万多人，伤残十七万，被株连的上百万人。”

而民间的“三十二寡妇上访团”的统计数字是：致死4万多人，伤残人数为14万多人，被抓、被挖、被迫害的人数大约有70万。“三十二寡妇上访团”的数字可能更接近于真实。

当时我在乌兰察布盟GY县中学工作。我是这场冤案的受害者之一。

1968年12月6日一早，突然通知我去县委大礼堂开大会。

礼堂的前门脸上挂的是“宽严大会”的会标。一会儿，县军管的首脑腾有几宣布：今天是宽严大会，也是挖“内人党”的动员大会。话音刚落，在一片有序、高昂的“打倒……！”声中，原县委正副书记、正副县长等6人，每个人都被迫低头、弯腰、喷气式由两个革命派同志一人揪着一只胳膊再用另一只手分别压着他们的左右肩，六个人在十二个人的押送下鱼贯出场。此时的口号声响天震地，声嘶力竭。看到了真正的“内人党”，真正的阶级敌人，群众的情绪很是激愤。

宣布完这6个人的罪行，不断有人上台批判声讨。

又是排山倒海的口号声，这时又押上来一个人，这人是广播站的孟克，蒙古族，我认识他。这么忠厚老实的人也是“内人党”？这太可怕了！押上来的孟克没有低头、弯腰，还是穿着那件深咖啡色的中山装。他被当场宣布因认罪态度好从宽处理，当场释放，并立马给他戴上了一个大大的毛主席像章，金光闪闪。他成了今天被从宽的样板。

常言说：“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叫门。”可



江青、康生支持挖“内人党”

是在那个疯狂的年代,什么“常言道”“俗话说”都将失去意义。我似乎看到那台血水四溢、泛着白骨的绞肉机在步步向我逼近。

那时我已是三口之家,丈夫,也是老师,儿子两岁半。

从12月6日下午至12月7日晚为“务虚阶段”,说是在等待“内人党”自觉登记。别人的感受是什么我不知道,我是在难耐的惶遽中一分一秒挨过来的。这时在校内已形成了强大的挖“内人党”攻势,各类标语口号都直指“内人党”。到处可见巨幅口号:“内人党不投降,就叫它灭亡!”

7日下午,全体教职员工都迅速、主动地贴着各自的大字标语。我也跟在人群后面假作镇静地努力参与着。高音喇叭里反复宣读着敦促“内人党”投降书,《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和《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等文章。突然播了一篇校内文章引起了我的高度注意:我校就有“内人党”分子,在我校的“内人党”中有老的,有小的;有蒙古族,有汉族;有男的,有女的……

晚上7点整按组集合开会。会议的主题是:敦促“内人党”自首投降。一直没有一个人自首投降,但每一个人都在争先恐后地朗读《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和《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以表自己的清白。

突然挖肃组长点我的名字并大叫:“不要装模作样了,老实交代你的问题!”“站起来,站到中间去!”虽然我有思想准备,但我的第一感觉还是愕然、吃惊和羞辱。

我被勒令站到了中央。人的尊严就这样被剥得精光。我好像被裸体放在了展台上,无处躲,无处藏。羞辱,愤怒,可怜巴巴的无奈。质问声、勒令

声响成一片。往日的同事、好友马上转变了态度与平时判若两人。火力越来越猛,从开始的“说清楚”逐步升级到“必须交代”,勒令、怒斥,一会儿又升级到人格侮辱和谩骂。

挖肃组长:交代你何时、何地、何人介绍加入了“内人党!”

我不是“内人党”。

挖肃组长:你是蒙古人,你能不是“内人党”吗?

我是蒙古人,但我决不是“内人党”。

挖肃组长:拿出你不是“内人党”的证明!

我无言以答,因为我无法拿出证据。

轮番批斗、审问,狂呼口号说要打掉反革命气焰。好笑,我都成了被捆着四个踢子放在祭坛前的猪羊,瞪着可怜的双眸伸着脖子等着挨刀了,还谈何气焰。辱骂、恫吓直到凌晨。工、军宣队的队员一起都来了。由工宣队S指导员出面宣布了对我的隔离审查。马上从外面又进来几个手提棍棒的学生押送我回家。他们推搡着,工宣队W队长、S指导员紧跟在后。我暗想,这是去取行李。到家后,我才明白他们是来抄家的,持棍棒者动作敏捷地跳上桌凳,扯开我家纸顶棚,拿着事先准备好的大号手电筒东照西照,大声地呵斥着。他们将我床上的铺垫掀开时将我两岁多的儿子惊醒,孩子被吓得大声地嚎叫要妈妈。

抄家大约进行了一个小时左右,他们很扫兴,什么也没有找到。

我抱着儿子,儿子又睡了。他们宣布抄家结束,我请求我要带儿子一起坐牢。工宣队S指导员马上转过身来从我怀中夺过孩子扔在床上,并厉声勒令我:走!同时将我强行推出门外。孩子在我身后撕心裂肝般地哭嚎着。手持棍棒的学生在工宣队的陪同下将我押到校内原来的播音室,一间真正的黑屋:所有的门窗全用大字报纸糊得严严实实,顶棚上吊的是一只可能是15瓦的灯泡。昏暗、阴冷、霉味。

第二天8点,工、军宣队的几个头头和专案组组长来了。他们是来给我做“思想工作”的,动员让我自己主动承认、交代问题。这时我还是很有信心地希望我能向他们解释清楚:我不是“内人党”,抓我是一场误会。然而,他们是众口对我

一人,每个人一张嘴不是毛主席语录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从12月8日一早我就开始了“喷气式”就是上身和下身要弯成90度角,两只手臂从后向上高高举起。是他们七手八脚强行“帮助”我做好的这个姿势。并交代说,只要我不交代就一直这样站下去。难熬的一天过去了,我还寄希望夜晚会休息,10点过了,12点也过了。这时我才被告知这叫“喷气式车轮战”,什么时候交代清楚了,什么时候马上休息。

他们是三班制。轮流值班的除两名女老师外,还有红卫兵学生、工宣队、军宣队的人,已经是第四个昼夜了。这时的我头脑反而清醒和冷静了许多,我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了我已陷在一个冤案之中,而且我是其中的重要人物,不然不会在老百姓中第一个抓我。我面对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但我能做到的只能是不和他们争论、解释。因为我没有任何问题可承认和交代,也决不会编假话骗人再乱咬乱供,我的良心和人格都不容许。

我无法回答他们的问题,我精疲力竭。这四昼夜我几乎没有吃东西,只是在第四天被军管的S连长灌了一茶缸子牛奶。从被抓的第一天起我就来了月经,血很多,而且越来越多,棉裤的两条裤腿成了硬壳。在大学时我是速度滑冰运动员,无冰期的陆上训练,其中有些练习基本上和“喷气式”差不多。

第五天晚上我被叫到专案组。他们把我的丈夫叫来做我的思想工作,一看见他,自己的亲人,我委屈的泪水怎么也遏制不住了。抽噎中我只说了一句话:“我不是‘内人党’。”我看见他也哭了,我就更哭了,由抽泣变成了号啕大哭。无奈,他们只好将我丈夫拉走了。

我又被押回了我的黑屋,依然还是那个“喷气式”。为了能得到几分钟的喘息,我频频要求去厕所。轮班看我的红卫兵小将是我教过的高中一年级学生。这次押送我去厕所的是小宁,厕所在操场的东北角上,离我的黑屋有二三百米左右;小宁是个胖乎乎的老实孩子,她母亲在县医院工作,是一位很热心的东北老太太,我们认识。小宁突然对我说:“我妈让转告你,不行就先承认了,外面已经死人了。”我听得清清楚楚,我也清楚

楚地告诉她:“我不能,说我是骨干分子,我交代谁去?”

后来才知道,在下午的会上布置了下一步的战略部署,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强调提出:“在控‘内人党’运动中,一定要稳准狠,其中要在‘狠’字上下功夫。”

第六天开始将看押我的人马全部换了班,接班的是原初二的学生,我没有教过。这些人已经是十七八岁的大小伙子了。

据说,在这次军管会的会议上,学校的运动受到了批评。说来也就是,全县第一个揪的老百姓“内人党”,居然能始终抗拒不交代,下一步运动怎么搞?据说,这次会上县军管会首领魏政委向中学的各路头头摊出了关于我的底牌,并下了死令:“哈斯格尔勒绝对是‘内人党’,我们有百分之二百的把握,关起门来打狗绝不会错。”

看守们全换成了新面孔,武斗也升了级。揪头发,扇嘴巴,用拳头打后枕部(因为是低头弯腰状态),用大头鞋踢小腿,将本来就向后翘着的两只胳膊再使劲向上提,这叫“燕别翅”,工宣队S指导员亲自上阵,将我“别着翅”的手再使劲向里掰,说这叫“吃猪蹄”。还有“冷静思考”和“热情招待”:先将你拉到外面雪地里冻,冻到一定程度,再把你拉回屋里,让你紧挨着烧得快红的铁火炉站立,并且头要向着火炉上方。我真担心我会跌倒在烧红的火炉上面,因为我已经是在摇摇晃晃中勉强站着,不断地出现间断性的意识不清。我常常不知道我是站在哪里,有时觉得自己是在悬崖边;或是在深深的谷底,上面的一切都是旋转状向我压来;又好像身处在农村长满荆棘的田头小路上,还清清楚楚听到围在我身边的那几只狰狞的恶犬,不断地向我狂吠。真的,我当时确实听见了狗叫;但是不管我在哪里,又总觉得我的儿子在我的身后不断地哭叫着,不断地拉扯着我的衣服。这时我已经不会思考,可是奇怪的是只要他们对我动武,我马上头脑就清醒些。我那时思考的主要问题是:我怎样才能死?触电?菜园中有一口深井?割腕?没有刀。吞金,没有金。我满脑子全是各种死亡的构图。似乎我的全部存在只是为了死亡。

后来他们对我降低了要求,说我是一般成员,只要承认了,就可以马上回到人民中来,说我



本文作者哈斯格尔勒近影

没有发展成员,也用不着揭发别人。显然这是欺骗,因为从他们之间的谈话中我知道,我校在我之后抓的那几个人,有几个都指认是我发展了他们。同时还拿来了一本黄颜色纸的32开的小册子,说这是全县已挖出的“内人党”分子名单,共27人。好笑,里面居然有人指认我是他们的发展人,说只要我在那上面指认一个是我的“内人党”发展人就行了。我拒绝了,还是唯一的那句话:“我不是‘内人党’。”

对我加大了火力,拳打脚踢、辱骂、继续“车轮战”。工宣队队长,是一位煤矿工人,嗓音带有磁性,说话流里流气,在我的记忆中他只会背一段毛主席语录:“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今天他亲自出马,又一次读了那段语录,大声勒令我交代,见我无反应,就冲上来用左手一把揪住我胸部的衣服,近近的逼视着我。他一只手紧紧的提着我,又唾沫四溅地狂吼:

老实交代你的“内人党”问题!

我说:我不是。

他说:我们有充分的证据。

我说:把证据拿出来。

他说:现在是等你主动交代,立功赎罪。到时候我们会拿出证据。

我强令他放开手,他还真的放开了手。

他说:还有5分钟12点(夜里),给你5分钟时间好好想想;不交代12点整就枪毙。

我当时对“枪毙”一词是深信不疑的,几天来我在他们身上已经看不出一点点人性的东西。我

从他们之间的谈话中和审问我的过程中我了解到:我是全县老百姓中第一个被揪出来的;我在被揪出来的人中态度又极其不好,一直顽抗;我也得知了外面有人被打死,我对我自己活着出去已不抱希望;更现实的是我被折磨得已经到了根本不想活的地步。我当时唯一痛心的一件事,我对不起我年迈的父母,他们始终挣扎在人间的最底层。父母生养了我,并在那样困苦的条件下让我念完了大学。我原本要改变他们处境的想法无法实现了,连养育之恩都不能报了……

工宣队长说:5分钟到了,你何去何从?

“你枪毙了我,也不是‘内人党’。”

工宣队长又一次将我从胸部提拉起来,那副狰狞的面孔离我那么近,细长的眼睛都变大了,涨红着脸,咬着牙抡起胳膊狠狠地抽了我两个大嘴巴。

我当时只觉得我已经到了另一个世界。我两眼不断地冒着金星,一切都离我越来越远了,我听不到任何声音了。过了多长时间我不知道,但我渐渐听清楚了,几个人在七嘴八舌说我在装死。我努力睁开了眼睛,在天旋地转中我寻找着打我的人,满腔的怒火已使我到了无法呼吸的地步。我的正前方的小课桌上有一个外壳是孔眼铁皮的热水瓶。我企图抄起热水瓶去砸那个队长。哪里有我的行动自由?早有人大叫一声将我按住。

打人的人更是恼羞成怒,暴跳如雷,那气势好像要将我一口吞下,或是两把就把我扯得粉碎。他搓着双手,大步走来走去,边咆哮着:不要脸!给脸不要脸!敬酒不吃吃罚酒……他最后一句话竟是:“再给你5分钟!”

“5分钟也不要了。我绝不是‘内人党’!我告诉你们:历史总有一天会证明我是一个大好人!”

工宣队长又一次饿虎扑食般地将我揪住,左右开弓打耳光……此后几天的事情我一点记忆也没有。

到底打了我多少耳光,我不得而知。但是当时有人见过我去厕所,见的人后来说:绝不敢认那就是我:头肿得很大,形状和颜色更像一个番瓜,目光呆滞,两个人架着,趑趄着移动着脚步……第二天工宣队队长在教工“内人党”学习班

上不无炫耀的恶狠狠地说：“连个小小的黄毛丫头都拿不下来，笑话！让她嚣张，我一次打了她十六个嘴巴，不是也彻底老实了吗？这就是不老实的榜样！”

再后来又是怎么打的？怎么站的？谁动手打的？我一概不知。

我一觉醒来发现我躺在床上，还有被褥。看守看见我醒来了，也没有人对我大喊大叫，也没有再勒令我做“喷气式”弯腰、低头认罪。这时有人对我说：“承认了，就没事了。看，现在多好。”我百思不得其解：我承认什么了？

几十年后，在呼和浩特的大街上邂逅一个原该中学的女学生，寒暄过后，她特别详细地询问我的身体状况。我一如实作答：眼底，腰椎，胸椎，尾椎，尾骶骨，神经系统都有问题，只是我这个人不太在乎，不会轻易趴下。她看着我，笑了笑，犹豫了一下说：“老师，搞‘内人党’时，搞你搞到第九昼夜时值班的有我一个，不过我先声明我绝对没有打过你。”我有些愕然，这是唯一的一个当时参与搞我“内人党”的那么多人中，敢于承认事实，当面说出真相的人。她紧接着说：“老师，我真佩服你的坚强，同学们也都佩服你的为人和骨气。最后几天你已完全神智不清，开始胡说。总是反复说：小玮回家（注：小玮是我儿子，当时只有两岁多）……往哪儿拉我呀？枪毙我也是好人！但当工、军宣队审问时，只要问是不是‘内人党’，都坚决说：不是。而对其他一些问题的回答显然都文不对题地胡说。后来人家就不再问‘是不是’这样的问题了，而只强调时间、地点、人。你的回答居然是1942年（注：我的出生年），这当然不行。反反复复，问来问去，突然他们就宣布说承认了。那种状态下，话都不会说了，能承认啥？”

“那么认罪书？……”我久久搞不清，是谁替我写了“认罪书”。

学生说：是工宣队W队长写的。你当时既不会正常说话，更不会写字了。工宣队W队长自告奋勇说：“我替她写吧，让她休息。”短短的一页东西，前后又都是套话，十分钟不到就写好了。那个队长真流氓，因为你不会写字了，只好按手印，真就像拉杨白劳那样按的手印。

我“承认”了，我承认了真好，不挨武斗了，不用“车轮战”了。但有时，不知道是他们高兴了，还

是他们不高兴的时候，我还得低头弯腰“喷气式”。他们说，这是因为我态度始终不好，还没有交代罪恶，因此还是一直关押着。

不要说夜里，白天就出现幻视，幻听。反反复复叨叨的就是我的儿子。不知是恻隐还是策略，真的有人把我儿子领来了。儿子真懂事，让来就来，让走就走，一点也不哭闹。我估计在他那小小的心眼儿里早已知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厉害。还是在“车轮战”期间，不知是哪位好心的老师做了点饭菜，放在饭盒里让只有两岁多的儿子给我送来，有半尺深的雪，儿子是怎么走来的？从宿舍到关我的黑屋足有200米的距离。我听到了是我儿子在喊我，突然工宣队W队长一边大喊“去”一边一脚踢开了门，门正好是向外开，门口的两个小台阶比门口大不了多少，儿子惊恐中被门一撞就滚下了台阶，饭菜全撒了。

现在好了，能不时地见到儿子了。儿子的到来无疑对我是一剂最佳良药，我的身体和精神状态开始好转。

有一天一大早来通知说，一会儿去参加“宽严大会”。马上工宣队W队长进来严厉警告我：“只准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我仍然是由几个人押送着去了会场——学生大食堂。不知道为什么让我坐在最后。一会儿宣布“宽严大会”开始。只见我丈夫走上了主席台，他要做啥？我眼睁睁地看着他开始了发言，用他那略带南方调的普通话说：“我现在讲一讲，我是怎样加入的‘内人党’和如何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的”，我目瞪口呆，我无法理解他在说什么，也不明白他在做什么。当他说到他是怎样受了我的骗，上了我的贼船时，我突然抑制不住，竟然哈哈大笑起来。

他被吓坏了？是胆小？是自卫？还是习惯？

然而，不管怎么说，当我看见一个人能如此轻易地放弃直立行走，而马上顺从地像狗一样爬行，并且按着主人的意图去表演一切时，我鄙视。

后来我才清楚，工、军宣队给他自由和宽大的条件是彻底揭发我，和我划清界限，他按着工、军宣队的意图，毫无羞色地承认，是我发展他加入了“内人党”。他的出卖和背叛对我的伤害是致命的，比工、军宣队，比无产阶级的铁拳还要厉害！

我被抓起来时还只有26岁，1964年大学毕业

业。没有亲历过认真的政治运动。虽然不是红旗
下出生,却是在共产党的教育下长大的。对共产党
的伟大、光荣、正确也没有怀疑过;对社会,对
国家,对政治向来也没有过认真的思考和分析,
对存在的一切向来不会提出什么怀疑和意见。

26岁的我,已成了重度伤残。除了肉体上的
伤残及病痛外,更要命的是整个人完全处于麻木
状态:大脑,思想,心灵,也包括灵魂。

单独在黑屋里隔离关了43天,放我回家是
因为我的孩子已病得生命垂危。而且当时军管还
有令:任何医院不得收治“内人党”及其家属。儿
子能活下来是偶遇一位好心医生冒险伸出了援
手紧急施救,儿子才得以逃生。救命之恩,感激终
生。

白天还必须参加继续交代和揭发“内人党”
问题的“学习班”,让我参加的是重点人特殊管理
小“学习班”,依然没有任何自由。这种情况一直
到1969年5月7日,我又一次心脏出问题并伴
随扁桃体化脓,我住进了包头市二医院。等我病
好转出院后,回到家里,整个形势已经有了明显
变化。已经给一些人平反了,但是不包括我。

有一天,我前夫回包头市看望他父母,我在
整理东西时发现了他的一个绿色塑料皮的笔记
本,比32开本略小,我翻开一看,顿时我目瞪口
呆,天旋地转,这竟然是他揭发我的提纲?光是提
纲就有8页!这时的我呆呆地瘫坐在那里,已经
无力再愤怒、无力伤心了。过了好大一会儿,我
还是强制自己平静下来看了一遍这篇追命的提纲。
他把凡是他知道的有关我和我娘家人的过去和
现在的一些真实的事情都写上了,这些事情当然
不是什么阶级敌人活动,却都在后面生硬地加了一个
“内人党”尾巴,比如说,我曾于1963年暑假
去巴盟探望过我的表姐,就在这个真实的事情后
面,他却能编造说,这是我专程去那里发展“内人
党”组织。他的所谓揭发材料几乎全是这样构成
的。这样的揭发是最具杀伤力的。

看过“提纲”后,我又开始神志恍惚。彻夜无
眠,一大早我请一个学生帮忙把我的行李搬到了
一个空房子里,从此我彻底离开了那个倒霉的
家,离开了那个革命的男人。

我最亲的亲人——丈夫在我大难临头之际
背叛了我、出卖了我,我孤立无助到了极点。

这场噩梦,它给我造成的损失是极其惨重
的,26岁我就成了重残,整整10年我不能和正
常人一样的生活、学习、工作。也是这场运动给我
只有两岁多的儿子留下了无法改变的伤残和病
痛,永远夺去了他的健康和幸福,并且从小就离
开了亲生父亲。

然而,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灾难,我只是整个
冤案中的七十万分之一,我只是伤残者中的十几
万分之一。

下面是几个盟市的统计数字(根据内蒙党委
落办文件和阿拉腾德力海编著的《内蒙古挖肃灾
难实录》一书)。

这里的“盟”的级别等于其他省的“地区”,但
人口要少得多。当时整个蒙古族人口大约是130
万。

1. 锡林郭勒盟挖“内人党”打死、逼死1863
人。

2. 伊克昭盟打“内人党”15万人,占当时74
万人口的21%。打死1260人。打伤5016人。打
残2322人,完全丧失工作能力的739人。

3. 乌兰察布盟打死1686人,伤8628人,残
4650人。

4. 巴彦淖尔盟挖8415人,死363人,重残
3608人。

5. 哲里木盟挖48500人,死3900人,伤残
14000人。

6. 呼伦贝尔盟挖47500人,关押14329人,
死2307人。

这里统计的死亡人数只是6个盟的数字,就
已达11379人。显然这里没有包括阿拉善盟、昭
乌达盟、兴安盟、呼和浩特市和包头市的死亡人
数。

这里统计的伤残人数,也只是伊克昭盟、乌
兰察布盟、巴彦淖尔盟和哲里木盟4个盟的数
字,就已达38224人。

这里面还没有包括内蒙古军区,各盟军分区
打死、打残的人数。光一个内蒙古军区政治部就
打死10人,一个省军区有多少个部?内蒙古军区
打“乌兰夫反党集团”235人,挖“内人党”3567
人。军区机关挖“内人党”:司令部160人,政治部
195人(死亡率10/195),后勤部217人。

(责任编辑 杨继绳)

调查“五·一六”

● 袁光强

“文化大革命”制造了许许多多冤假错案,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案是其中较为离奇的一件。全国有数以百万计的干部群众根本不知道“五·一六”是个什么样的组织,许多人连它的名称都没有听说过,竟被莫名其妙地打成了“五·一六分子”,遭受残酷的迫害。

“文革”期间笔者从新华社借调到中央文革记者站担任北京记者组组长,较早发现“五·一六”的反革命活动,并组织力量对它进行过一两个月的全面调查,比较了解情况。据我了解,“五·一六”是一个人数不多的组织,当清查“五·一六”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进行时,它早已被彻底摧毁,实际上并不存在。现将我了解的情况记述如下:

初见攻击周总理传单

1967年7月上旬的一天上午,我去天安门广场看大字报,在金水桥附近看到一些红红绿绿的传单。我顺手拣起几张,一看标题就吓了一跳,原来都是恶毒攻击周恩来总理的。传单下方都署名“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在此之前,北京大街小巷到处可见“打倒谭震林”、“打倒陈毅”等大标语及大字报,名曰“反击二月逆流黑干将”,却没有见过公然把矛头指向周总理的。我认为这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分子所为,是明显的反革命行径,是阶级斗争的最新动向,便急忙把传单带回记者站。我负责的北京记者组有30多名记者,分散在各中央机关、大专院校及一些工厂企业采访文革情况,当天也有记者送来内容相同的传单。我把这些传单拿到记者站负责人徐学增同志那里(徐是从新华社解放军总分社南京军区记者组组长岗位上借调来的,他是我在第三野战军时期的

老战友),请他及时上送中央文革,并同他一起研究如何对此进行调查。我判断这个极“左”面目明显的组织可能出自某个高校,就提出先让大学生通讯员去高校摸摸情况。徐学增同意我的意见,要我去找负责领导通讯员的唐茨同志商量。

1967年六七月间从北京各高等院校抽调20多名学生组成的通讯员组,驻在铁狮子胡同二号原西藏驻京办事处旧址。这些通讯员协助北京记者组跑北京各院校,但为了保密,一直不让他们到记者站驻地花园村一号来,只能电话联系。负责领导他们的唐茨同志,是从新华社解放军总分社广州军区分社调来的军事记者。我去找他询问是否知道“五·一六”这个组织,他告诉我,有个来自人民大学的通讯员(名字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他到北京钢铁学院采访,对该校各个群众组织及他们的头头都很熟悉,其中也包括该校“五·一六红卫兵团”的头头张健旗。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线索,当即请唐茨同志把这位通讯员找来,向他询问有关情况,要求他继续与张健旗接触,以进一步了解他们的组织及活动情况。

深入巢穴探明阴谋

由于我们的那位通讯员也是在校大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多次接触后容易沟通并取得信任,因此“五·一六”的头头张健旗能对我们的通讯员无话不谈,包括他们的秘密行动计划。8月9日下午5时左右,唐茨同志急匆匆来电话告诉我,我们那位通讯员从张健旗那里获悉,“五·一六”的一些头头当天晚上将聚集北京外国语学院一栋楼里开会,策划打一场反对周总理的大战役(即“五·一六”事后宣称的所谓“八·九战役”)。唐茨同志问我

是否要通讯员亲临现场观察了解情况。当时我毫不犹豫地对唐茨同志说,只要“五·一六”的头头们允许,就一定要去,并把去后了解到的情况及时直接打电话告诉我。

布置完任务后我一直守在电话机旁。晚上9点钟左右,那位通讯员果然打来电话,急切地报告说,他刚刚参加完他们的会议从会场出来,会议决定当天夜里要搞一次大动作,即派人到北京动物园、甘家口商场、新街口、西四丁字街、西单大街等这些白天人多的地方,张贴攻击周总理的大字报。大字报早已写好,就等到0点夜深人静的时候派人出去张贴。我问大字报的标题是什么,他说有《揪出二月黑风的总后台》、《周恩来的要害是背叛“五·一六”通知》、《周恩来是毛泽东思想的可耻叛徒》等。

听了通讯员的报告,我深感事关重大,有必要采取措施予以制止。从我听完通讯员的电话到0点——“五·一六”头头计划行动的时间,还有3个小时,如果制止还来得及。于是我急忙给中央文革办事组组长王广宇(马列主义研究院干部)打电话,将通讯员报告的内容原原本本地告诉他,强调情况绝对准确,请他立即向中央文革领导成员报告。之后我仍一直守在电话机旁,多次向王广宇询问结果。第一次他回答,中央文革小组正在开会,他已经将我报告的内容整理成电话记录,送到会场交给小组成员。第二次他回答,会议还未散,等散会后有结果即告诉我。到0点后我再去电话询问,他回答说已与北京卫戍区联系,他们将派人把那些攻击周总理的大字报全部覆盖上,以免造成恶劣影响。我对未能事先制止感到有些失望。

第二天一早,我派出四五十名记者到各处去查看实情,我也到驻地附近北京商学院去了解情况。我一到该校院内,就看到有一大群学生正在开会批斗一个“五·一六”分子。这个“五·一六”分子是个学生,据说他也在头天夜里出去张贴攻击周总理的大字报。

到各处查看实情的记者回来后,都说看到许多新贴出的“誓死保卫毛主席”“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之类的大标语,显然是为了覆盖原有大字报的。这就证明“五·一六”策划的这次反革命行动计划已经付诸实施,确实在当天夜里贴出了那些攻击周总理的大字报。我把通讯员提供的情况及

记者们的所见综合整理了一篇稿子,登在当天记者站编印的《快报》上。

组织力量 全面调查

在“五·一六红卫兵团”贴出反对周总理的大字报之后不久,中央文革向记者站下达了任务,组织力量对“五·一六”展开调查。记者站负责人徐学增同我商量后决定,在北京记者组内设立一个“五·一六”调查组,由唐茨同志兼任组长,组员有赵振英(马列主义研究院干部)、刘慎思(解放军沈阳军区政工干部)和梁为樑(解放军济南军区教员)三位同志。

中央文革只是要我们调查,对调查内容没有提出具体要求。我和调查组同志一起开会研究,确定从调查它的组织及活动入手,然后再调查它的背景,究竟有没有后台。

经过调查组同志们共同努力,很快查明了“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人员组织状况。它没有“总部”,其主要头头是北京钢铁学院的张建旗和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刘令凯。“总部”下设“政治部”“作战部”“组织部”“资料政策研究部”,以及农林口、财贸口、文教口、公交口、外事口、军事口、中学、全国通讯联络站等8个“方面军”。“五·一六”的头头宣扬他们有所谓“8个方面军”,其实是在虚张声势。根据我们分别调查统计它在各个方面的人数,加上“总部”及各“部”的人数,总共实际不超过50人,可谓是真正的“一小撮”。

据我们记者调查,这个组织的成员怕见阳光,不敢见人,他们多半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出来活动。活动的方式也很单纯,不是散传单,就是贴大字报。所有传单和大字报都是把矛头指向周总理。

他们的活动一经暴露,就会遭到革命师生的批斗。8月14日,北京钢铁学院、北京地质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农业大学等高校的一些群众组织,联合成立“专揪‘五·一六’联络总站”,并设立若干分站,开始对“五·一六”分子展开抓捕行动。8月20日,“五·一六”最大的头头张建旗被他在所在的北京钢铁学院师生抓获,它在各个“口”的一些骨干分子也先后落网。喧嚣一时的这个反革命组织,到8月底就已经土崩瓦解,被彻底摧毁了。

调查工作难度最大的是查背景及后台。我们的记者每天跑,到处问,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有查到什么有力的线索。只是在一名“五·一六”骨干分子的笔记本中,发现记载着《红旗》杂志社编辑周英的电话号码,而周英是主管《红旗》杂志社的副总编辑、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的妻子。还有个“五·一六”骨干分子宣称,他们同《红旗》杂志社编辑部负责人林杰有联系。仅靠这一点材料,难以判断周英、林杰同“五·一六”有无关系,更难判断他们是不是这个组织的后台。

调查组记者采写的所有调查材料,都经过我编审印发。开始登在《快报》上,后来为了便于查阅,改出专刊《关于“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调查材料》。专刊大约印了十几期,后因调查难以为继,记者采写不出新的调查材料,也就无形中停刊了。

我们在调查“五·一六”向毛主席和党中央提供有关情况方面,尽了自己应尽的责任,却遭到王力、关锋的无理指责。据徐学增同志告诉我,有一天这两个人把他叫去,王力向他大发脾气,指责我们的调查“不对头”。关锋更是气急败坏地说:“你们的调查叫我们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关锋这样说是有原因的,就因为有一份调查材料牵涉到他

的妻子周英和他的下属林杰。就在王力、关锋对我们横加指责之后不久,8月26日,这两个曾经不可一世的人物,被毛主席下令抓起来了。

后来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已有了变化,中央文革记者站宣告结束,我们的调查工作自然也就结束了。

记者站工作结束,我返回新华社,继续干我的老本行——时事政治编辑。不料一年多之后,新华社清查“五·一六”,竟然把我也列为重点清查对象。曾经较早发现并为调查“五·一六”竭尽全力的人反遭清查,这也是黑白不分是非颠倒的那个时代的特有一景,实在是荒谬和滑稽。由新华社军管小组导演的这场闹剧,在逼我“交待”一段时间又实在查不到什么证据之后,就把我“挂”了起来。两年后才恢复我的工作,并当众宣布为我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我这里记述的是我亲身经历的有关“五·一六”的情况,至于一年多以后,为什么在全国掀起了清查“五·一六”的政治运动,那我就不清楚了。

(作者为新华社高级编辑)

(责任编辑 杨继绳)

广 告

广告审查批准文号:苏医械广审(文)第 2008040039 号 京医械广备字第 2008050153 号

SIEMENS

西门子助听器

解决听得见
听不清
耳聋
耳鸣的烦恼

服务中心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甲16号

电话:010-64071474 64074641 64002810

传真:010-64055026

邮编:100009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大街46号天恒大厦508B

电话:010-84608848 传真:010-84608847

邮编:100027

SW 声望听力 网址: <http://www.sw-tl.com>

夜半抄家记

● 牛辉林

公元 1966 年，“8·18”毛泽东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之前的北京大学，虽然是文化大革命群众造反运动的发源（不是策源地），却还没有红卫兵群众组织。那是因为，以“5·25”“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作者聂元梓为代表的北大“左派”团队，在 6 月凭借毛泽东直接批示，冲垮了北京旧市委支持的以陆平为首的北大旧党委，7 月凭借中央文革直接出面赶走了新市委派出的张承先工作组之后，又在江青、康生直接授意下，于 8 月初通过选举建立了文化大革命的“全国第一个红色政权”——以聂元梓为首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校文革”）。那时的聂元梓如日中天，是全国上下公认的“第一左派”。所以，北大师生中还没人想到除了校文革政权外，能够再自发建立其它群众性组织。

“8·18”之后，北大师生才知道毛泽东除了支持“左派”人物贴大字报造旧党委的反，更支持广大学生娃娃的红卫兵组织造旧世界的反！于是北大校园内很快就有些“红五类”（贫农、下中农、工人、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出身的学生，自发组织各种名称、大大小小的红卫兵团队。其中就有我跨系（打破系与系的界线）串联了 600 多“红五类”同学参加的“北京大学红卫兵”。

我当时是法律系二年级学生。那时的法律系是国家规定的“绝密专业”，全系五个年级清一色“组织观念强、政治觉悟高、阶级立场坚定”的“红五类”学生。“5·25”聂元梓等七人批判北京市委和北大党委的大字报一贴出，法律系全系师生一致坚决反击，坚定维护党组织的权威。我在那几天与大字报支持者的大辩论中十分风头，是全校出了名的“老保”。6 月份，“5·25”大字报成了毛主席亲自支持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之后，我和系里的同学们着实痛苦反省了一个阶段。7 月 26 日在中央文革主持的关于工作组问

题全校辩论大会上，我“将功折罪”又代表法律系同学发言表态批判工作组，支持聂元梓为代表的北大“左派”，成了全校知名的“两头冒尖”人物。为了响应毛主席号召组织红卫兵，我多次向聂元梓和校文革的左派老师们检讨“5·25”的错误，汇报组建红卫兵的工作，得到了聂元梓和校文革的谅解、信任和支持。9 月份时在聂元梓和校文革的直接支持下，正式出任了“北京大学红卫兵”总部负责人。时称“总勤务员”，俗称“司令”。后来社会流传很广的“北大牛司令”称谓由此而来。

北大红卫兵成立前后，全国“大串联”已经开始。虽然北大校文革一再号召全校师生“留校闹革命”，到了 10 月北大外出串联的学生已是十之八九了。我也就趁机与两位不是北大红卫兵的好友到长江以南去游山玩水，直到 12 月中旬中央三令五申停止“大串联”后才返校。抄家事件就发生在我返校不久的那些日子里。

1966 年 12 月下旬的一天下午，在北京大学红卫兵总部值班的同学，接到了校文革副主任姜同光老师的一个奇怪电话。电话里说有一伙小流氓在聂元梓家里捣乱，让北大红卫兵去一些人把他们赶走。值班同学是我的好友，历史系四年级的何本方。老何在转告我电话时，我们就对此表示怀疑。第一，“现在的老聂是什么样的人物？什么样的小流氓敢到老聂家去捣乱闹事？”第二，“什么人在老聂家闹事，校文革、保卫组管不了，要北大红卫兵派人出头？”同时，我也为要召集人马去撵人的事发愁。因为所谓北大红卫兵只是一个松散在各系的群众性组织，集合同学们干事没有正当理由，没人会服从你。于是，何本方便自告奋勇先去老聂家里侦查一番再做定夺。过了大约一个小时，我正在急不可耐时，何本方回来了。一进办公室就唉声叹气地说：“老牛啊，帮助老聂去撵人的事可不能干哪！”接着他讲述了自己的侦

察结果。第一,这伙人不是什么小流氓,是一伙大学红卫兵、高干子弟。第二,这伙人领头的一男一女不是一般人,是老聂现任丈夫的儿子和女儿,男的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生,女的是北京邮电学院学生。老聂的丈夫也不是一般人,是资格很老的中央一级大干部。第三,兄妹两人到北大与政治运动无关,是向聂元梓讨要家里东西的。据说聂元梓拿了老爷子和孩子们的不少好东西……

就在何本方准备继续向我表达自己看法的时候,聂元梓的秘书、哲学系青年女教师陈宝华来电说老聂要亲自到哲学楼来见我。何本方一听,又嘱咐了我几句不可相信老聂的话就抽身走了。不一会儿聂元梓带着陈宝华到了红卫兵总部办公室。老聂一落座就表扬北大红卫兵阻止外地串联学生,保护校门石狮、华表等重要文物的功劳,并借题发挥地说:“你们现在是北大的主人,对学校的一草一木都有责任。对北大的运动、师生们的安全更要负责,你说对吗?”接着话题一转:“你知道我今天来有什么事吗?”

“是不是有一伙小流氓到您家里捣乱?”我也是明知故问地试探。

“姜同光给你们打电话了吧?其实不是什么小流氓。领头的是兄妹俩,都是大学生,还是红卫兵。自以为是高级干部子弟,无法无天,谁劝都不听。”老聂口气很平和,颇有长者之风。

“是不是要我带人去把他们赶走?”

“也不是。北大这么多人赶走他们几个人还不容易。因为领头的兄妹俩和我有特殊的关系,所以我请示了中央,让北大派人把兄妹俩送到中南海去,交给总理和康老负责教育。”

“总理和康老?”我一时惊得脱口而出。心想毕竟是老聂啊,这么一点小事惊动中央,竟然让总理和康老出面处理。刚刚受何本方影响的种种怀疑荡然无存。当然也没好意思再追问那兄妹俩和她是什么特殊关系。

“他们是来闹事的。我现在这个年龄和身份总不能和他们一般见识吧?因为这么个事,动用公安、保卫、校文革也

不太合适吧?想来想去还是由你们红卫兵小将出面比较妥当。我刚才也说了,你们也有这个责任嘛。他们不让我这个校文革主任办公,也不让休息,从办公室闹到家里,你们北大红卫兵也有责任帮助我嘛。”老聂没理会我的惊讶,继续心平气和、入情入理地讲道理。

“您说的对!我们有这个责任,也应该尽这个责任!您说怎么办?”我心悦诚服地赶紧表态。

“很简单,你带些人去家里,不要骂,更不能打,要讲道理,劝他们离开北大,由你们护送到中南海交给总理和康老。”老聂交代得一清二楚,便起身离去。

接下来我集合了二十多名晚饭后在校的北大红卫兵同学到聂元梓家中,几经交涉,软中带硬地带着兄妹二人乘坐校文革派的大轿车一块到了中南海北门。没有想到的是,在中南海北门外通过门卫和传达室反反复复联系了四五次,根本联系不上总理和康生。时间到了半夜十一点多,押送人的红卫兵们开始发牢骚、埋怨我办事没谱。兄妹两人也挖苦我相信聂元梓的鬼话,说



1966年6月18日,北京大学召开大会,批斗该校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党委副书记彭佩云

上当受骗、吃亏倒霉还在后边呢！

正在我进退两难的时候，聂元梓和陈宝华坐着北大的华沙牌小轿车到了。陈宝华到大轿车上把我叫到小车里。一见到聂元梓坐在后座上，我就没好气地问：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呀？”

“中央今晚有紧急会议，总理和康老都没有时间。我请示过了，让你们把这兄妹俩送回他们自己家，交给他们的父亲管教。”老聂很有些不自然地说。

“他们的父亲又是什么人哪？”我没好气地问。

“彭（德怀）黄（克诚）分子、大黑帮。”

“让黑帮分子管教？”一下子从总理和康生管教变成让黑帮分子管教，从送中南海变成送回自己家！我一时还真转不过弯来。

“不是一般的管教，是要抄家！要严令他不准再唆使子女到北大闹事！”聂元梓也没好气地狠狠地说。

这也是个没有办法下台阶的办法。我的心中虽然充满了疑虑，但事已至此，也只好听从她的指示，由她乘小车在前领路，我们押着兄妹俩乘大车跟在后面，向南长街方向走去。那年月的北京大街上灯很少，没多久两辆车在黑暗中停在一个大胡同的口上。陈宝华又把我从大车上叫到小车里，聂元梓从车窗口指着胡同里一个亮着一盏灯的门楼，向我交代任务：“这就是彭黄分子、大黑帮吴溉之的家。他的主要罪行，第一，彭德怀、黄克诚反党集团死党；第二，勾结安子文叛徒集团迫害干部，生活腐化；第三，纵容子女迫害左派。你们一定要勒令他低头认罪！”

当我起身准备去执行老聂的指示时，她又拉了一下我的袖子，小声地说：“你要注意，他家书房的桌子上有一部红色的电话机，你进去先要掐断它！防止他家的人向外通气！”

其实，老聂这句话不如不说。因为我听说过，那年月中国省部级以上高级干部家中都有俗称“红机子”的电话，是直通中央的。也是当时高级干部家庭身份、地位可以“通天”的标志，并非是随便向外边通气的。所以，我脑子里很自然地闪过了一丝嘲讽的念头：“是怕人家向中央报告吧？”更引起了我对这次抄家合法性的怀疑和警

惕，也就坚定了我在抄家过程中一方面虚张声势应付聂元梓，一方面又小心翼翼不敢伤害吴溉之家人的想法。

我回到大轿车上留下了四五个人看管兄妹俩，便带着其余人员去抄家。我们采用从电影、小说中学来的“上房压顶”、“居高喊话”各种办法才打开了吴家紧闭不开的大门。又在三进三出大四合院的外院与警卫军官和工作人员们进行了一番唇枪舌战，才由工作人员引领，在二进院的正房客厅见到了一身睡衣、一脸病容的吴溉之老人。那老人十分沉静，没有一丝恐惧慌乱地上下打量着我和我身后的红卫兵们。用浓重的湖南乡音问道：“小同志，你们是什么单位的？”

“北京大学红卫兵！你少套近乎，我们和你不是同志关系！”我想尽量表现出合法抄家的气势。

“噢，那就是聂元梓同志派你们来的喽？”

“我听不懂你说什么！”看到老人神秘的笑容，特别是听到那个年月从毛泽东到党政军最老资格、最高级别干部才有的那种口音和口气，我这个北方土八路干部子女一时心慌，竟没有听清老人把聂元梓说成“泥丸子”的话是什么意思。

“首长问，是不是聂元梓同志派你们来的？”扶着老人的工作人员自动当了翻译。

“我们是奉了中央首长的命令来抄家的！”

“噢，是哪位首长啊？”老人仍然是面带神秘的笑容。

“总理和康老！”

“噢，是聂元梓同志给你们传达的吧？”

“用不着你问那么多！现在是北京大学红卫兵奉命来抄你的家！轮不着你来盘问我！”老人话语和表情中的嘲讽让我很不舒服，一时火气上冲。

“小同志噢，别动火气嘛，抄家也得向我说明个理由吧？”老人很机警，立即收起笑容，很平和友好地说话。

“那，我来问你，你知道不知道聂元梓同志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北大校文革主任，是毛主席支持的全国第一左派？”由于我从心里已经不相信聂元梓信口所说的中央首长指示，底气不足，不敢把听老聂说的什么彭黄分子、安子文黑帮之类的话说出来。

“怎么会不知道哟。元梓是我的爱人，我们是

夫妻嘛。应该说我比你懂得多啦。”老人一口一个“丸子”，一口一个“夫妻”、“爱人”地解释，突然让我感到有些滑稽。心想人家派我来抄家，您老爷子还一副恩爱夫妻的架势？便不以为然地反问：

“那你为什么还要让子女去北大迫害她？”

“你呀，说你不知道嘛，你还不服气，你到现在还没闹清楚我让孩子们去北大干什么嘛！”这位曾担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党组书记（院长是民主人士沈钧儒老先生）的老人，抓住机会立即用长辈的口气驾驭场面。

“那你说你让他们干吗去了？”我没好气地顶了一句。

“你看看你，做事没有调查清楚很不好嘛。两个孩子不是和你们在一起吗？叫他们进来当面一问，不就清楚了吗？”老人一旦驾驭了局面便开始批评人、指挥人了。

没办法，我只好让人去叫兄妹俩来。兄妹俩一进房门便扑到老人身边，一边搀扶，一边上下打量，关切之极地问：

“他们没怎么样吧？”

“放心吧，我看这位带队的小同志也是干部子弟吧，很讲道理，很有水平啦！”老人真到位，努力拉近双方情感，又不失时机表扬人。老人不理睬我有些不以为然的态度，又用埋怨的口气对兄妹俩说：

“噢，你们把我写给聂元梓同志的信给小同志看一看嘛！你们真是不行，连个事情也说不清楚！”

兄妹俩从身上拿出老人的信交给我。老人的信写在红色竖格浅黄色宣纸信笺上，书法很是讲究，信的大意是：

“元梓，很希望你能回家来住。我还是很爱你的。如果你对我们的婚姻不满意，我也同意办理离婚手续，绝不拖累你。但你拿了孩子们的东西，请还给他们，孩子们多次要去北大找你，我都劝阻过……”

我反复看着信笺上的浓墨书法，想着来以前何本方说的别管人家的家务事，感到老大没意思。便转向兄妹俩：

“你们去要什么东西？”

“那是两年前空军从香港捎回来的一只女

表，很贵重。是刘亚楼叔叔送给我结婚时用的礼物。”当哥哥的那位不无自豪地告诉我。

40年后的2006年，当我开始撰写自己的“文革”回忆录时，一位朋友告诉我，吴溉之曾在1946年时奉中央命令在东北创办中共军队的第一所航空学校，那就是中共空军的前身，吴溉之应当是中共空军的元老。刘亚楼那时作为东北民主联军的参谋长，参加了创办航校的工作，解放后被任命为空军司令。所以，刘亚楼不仅与吴溉之是湖南老乡、红军战友，而且有组建新中国空军的工作渊源，交情匪浅。我才真正明白了吴家何以那么看重那只女表。

接着兄妹俩又向我简单说明了去北大的经过。原来老人家和聂元梓结婚时，兄妹俩和身边工作人员都坚决反对抵制，关系一直紧张。当他们发现聂元梓不断从家里拿东西到北大，竟然拿走了刘亚楼送的表，就坚决要去讨还。老人家没办法才写了那封信……没想到聂元梓交给他们的手表竟被摔坏了！兄妹俩气不过，便与聂元梓闹起来。兄妹俩越说越气，当着我们大骂聂元梓：“这个坏女人，太毒了！她困难的时候找关系来巴结我们家，现在翻了身又来糟害我们家，迫害我爸！”

“好了！我们不是来听你们家的控诉会的！”我发觉满屋子的人都在静静地听兄妹俩的控诉。突然觉得抄家要泡汤！老聂就在大门外的车上，回去怎么交代？我赶紧打住兄妹俩的话头，转向老人家：

“告诉你，我们这次来的任务，一是要抄家，二是严令你管束子女不能再去北大闹事！”

“小同志，我来告诉你，我是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常委，我家里的所有文件都是绝密！你可是动不得啦！”老人家也是立即制止了还想说话的兄妹，转向我十分严肃地宣布纪律。

“抄家又不是抄文件。我动你的文件干吗？不过你倒是提醒了我，我们抄家没动你的文件也得有个手续凭证。凡是放文件的柜子一律封存，你要签字！省得将来说我们动了你的绝密文件，吃不了兜着走！”我因进门之前已经有了绝对不越轨的准备，老人家一提醒，我马上回应。

说办就办。吴家工作人员找来了纸张和北大红卫兵们一起裁出纸条，写上封条年、月、日，再

加盖我带来的“北京大学红卫兵”公章,按老人家指点的文件柜、办公桌,看也不看,一一封存。然后写好字据,老人家和我不见了。一件对我来说可能影响一生的政治事件就这么圆满地解决了。40年来,每每想起这一幕,就庆幸万分!别说当时20岁的毛头小子抄了老人家的文件,就是没动文件,但没有双方签字的手续凭证,后来的麻烦可就大了!幸亏我当年读书的法律系是绝密专业,脑子里好赖还有个绝密的概念。也幸亏老人家心存对娃娃们的善念,及时提醒。

封了文件柜,总得还抄点什么才算得上抄家。我在老人的客厅和书房中草草看了一圈,没收了一副木盒子装的麻将牌(涉嫌赌博),一个木制类似八卦模样的古董(涉嫌迷信)。拿起那个放在桌上早已掐了线的“红机子”,心想抄家的东西少了点,分量轻了点?猛地想起聂元梓还交代要把老人家的那辆吉姆车开走。哈,那可算是个大物件了!

“你车库里的吉姆车,你已经没资格再用了,我们要开走交回国家!”

“汽车本来不是我个人的,国家配给的。我的身体不好,也不出去,你们开走吧。”

“还有一盒麻将牌、一部红机子、一个木八卦,需要你在抄家清单上一并签字。”

“都是些没用的东西,应该拿走。”老人很爽快地边说边在清单上签字。

这时,陈宝华进来把我叫到屋子外边,低声传达:“老聂让你们把吴溉之拉到西单的中组部门前批斗……”

“这都后半夜了。哪里的街上还有人?批斗给谁看?再说了,这个人年岁这么大,又有病,万一出个事,谁负这个责任?这事我不干!谁干让谁干去!”这时的我,心中充满了对聂元梓为人的反感,觉得她做事太过分了,明明是夫妻,老人家还说爱她。因为这么个事,利用我们把人家往死里整……我越想越气,说话嗓门就大起来。陈宝华一看劲头不对,赶紧走了。

“抄家结束,全体撤离!”我带着气回到屋里大声宣布完,转身就走。

“小同志,希望你再来。”这时的老人追了一步,在我身后十分亲切地说了一句。我不由得回头一望,老人家的子女和工作人员都是一脸友

好。跟我来的北大同学们竟然也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随在我身后颇有风度地快步顺序穿过两层大院出门上车。这时聂元梓和她的车都已不在门外,估计是听了陈宝华汇报我的态度,就离开了。

“司令,坐吉姆回学校怎么样?”我正准备最后一个上大轿车,跟车来的北大中年司机拍了我一下,很是江湖地说。在回北大的路上,中年司机给我大讲了一通汽车经:

“这可是部好车啊!副总理级的大干部才配给呢。咱们国家领导人的车都是苏联人送的,最高级的是吉斯,送给毛主席、刘少奇、朱总司令,下来就是吉姆了。咱北大最好的车是陆平那辆老别克,还是辽沈战役缴获国民党熊式辉的。和吉姆比可差老鼻子了……”

那次抄家之后,我又和同班好友牛泰生、吴金岳一起两次回访吴溉之老人的家。老人和他的子女及秘书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向我们讲述了与聂元梓相识、结婚、反目的全过程。

原来聂元梓也是行政十二级的抗战老干部,到北大之前在哈尔滨市委宣传部当处长。她那时的丈夫也姓吴,是市委副书记。因政治和生活上都犯了严重错误,聂元梓与其离婚后通过关系找到北大党委书记陆平。陆平对她一直不错,先安排经济系副主任,又出任哲学系党总支书记。1965年“社教”运动中,高教部驻北大工作组认为陆平党委有严重问题。聂元梓跟着工作组充当批判陆平党委的积极分子。不久中央书记处决定撤走高教部工作组,改派北京市委工作组。早已恨透了忘恩负义聂元梓的陆平党委一班人立即对她进行清算和批判。成了整肃对象的聂元梓度日如年,又千方百计找关系调离北大。认识了吴溉之老人后,聂元梓便把调离北大给老人当秘书作为嫁给老人的条件。当老人带着她回湖南老家结婚度假(婚假是中组部长安子文在老人家中当着聂元梓的面给陆平打电话要的)后又回到北京时,已是1966年的春节后了。当聂元梓从老人那里得知彭真和北京市委受到严厉批判,垮台在即的消息后,她就预感北大陆平党委的日子也不久了。不仅再不提调离北大,而且天天住在北大观察风向。不知当时在北大做秘密调查的康生的老婆曹轶欧给了她什么消息,就有了毛主席后来亲自批示支持的“5·25”大字报。大字报广播后,好

心的吴溉之老人还在北京饭店请了自己的亲朋好友(包括湖南文坛名宿李六如老人)庆贺“爱妻”成了全国第一左派。此后,聂元梓每天在北大忙运动,偶尔回一趟老人家,便要一些、带一些笔墨纸砚、古董、古玩等值钱的东西。老人的子女对此反感之极,偶然发现她向老人借走了刘亚楼送的那块珍贵手表去“玩几天”……终于发生了那天的抄家事件。

我和同去的同学,及我们在北大红卫兵总部的好友同学们,因此认为聂元梓是一个品质不好的人,在北大再不能跟着这个人参加运动。1967年初便趁着解放军进校搞军训,发表声明解散了北大红卫兵,去当逍遥派。不久,北大以哲学系干部教师为主体的,“社教”运动中反陆平的“左派”队伍内部发生分裂,影响到一部分高年级同学成立了“反聂”派的群众组织。本来我们这伙低年级的学生是置身事外的,但聂元梓担心我把抄家的事情抖出来对她不利,恶人先告状向江青报告我是与“联动”关系密切、攻击江青和中央文革的“坏人”,导致江青在北京市委扩大会等场合点名说我是“坏人”。愤怒之下,我们一伙也加入了北大“反聂”一派的斗争,最终成了北大“反聂”一派的核心力量。

当1968年北大分裂为对立两大派群众组织时,反对聂元梓一派群众组织的核心人物是“孔、杨、周、牛、侯”。孔繁是哲学系资深“左派”教师;杨克明是哲学系青年教师;“5·25”七人大字报主要作者之一;周培源是周总理点名支持的北大副校长、世界级资深流体物理学家;侯汉青是“5·25”时支持七人大字报的图书馆学系研究生,都曾是聂元梓“校文革”的成员。只有我一个低年级学生。这已是抄家事件的后话了。

这世上的事无巧不成书。40年后的2006年,我看到了聂元梓在香港出版的回忆录,果然有抄家一段,果然把责任推到了我的头上,说是我逼着她领路去抄吴溉之的家。我也是一笑了之。没成想,过了不久就在北京一位朋友的公司里遇到了已经八十多岁,还很健康的聂元梓。老聂已经认不出年届花甲的我。当我自我介绍后,老聂的第一句话是:

“牛辉林啊,我的书还在修改,你将来写书可不要骂我啊!”她并没有问我是否看过她的回忆录,但一定猜到我一定会看过。一位历尽政治沧桑,坐了十多年大牢的耄耋老人仍然如此机敏,如此看重自己的名誉,真让我感叹、唏嘘不已。

(责任编辑 杨继伟)

广 告

大午温泉度假村

大午温泉度假村位于保定市徐水县,距北京110公里(京石高速徐水出口),是以大午温泉地热井为依托兴建的一处园林美景。

大午温泉地热井深3003米,井底水温62℃,出井水温56℃,日出水量达1200立方米。温泉是地壳深处经过几亿年的蕴酿而成,含有多种具有活性作用的微量元素,如钙、钠、镁、钾、锶等离子,有一定的矿化度。大午温泉水质卓越,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

大午温泉度假村地处乡村田野,绿树环抱,鸟语花香,清幽娴静,远离尘嚣,初入使人有世外桃源之感,可谓“源于自然、高于自然、虽由人作、宛若天成”。度假村下设温泉贵宾馆、温泉佳宾馆、温泉游泳馆、温泉露天池及大午企业文化主题公园,馆内设休闲大厅并配备大、中、小型会议室,集温泉泡浴、按摩保健、休闲娱乐、会议接待、餐饮住宿、度假旅游多功能于一体,可观赏田园风光,品尝乡村野味。宾馆高档舒适,价格低廉,服务超值,适合工薪阶层全家出游,更适合离退休老人的休闲疗养。

“古有武陵源,今有大午城”,大午的天是蓝的,水是甜的,人是善良的,诚实善良的大午人,欢迎您的光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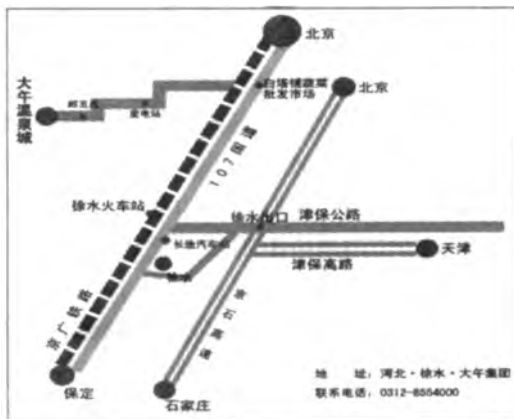
客房价目:大午庄园标间60元,温泉佳宾馆标间280元(含温泉门票48元)。

地 址:河北省徐水县河北大午农牧集团

联系电话:0312-8554000 8554999

自驾:京石高速徐水出口下,沿107国道北行至白塔铺蔬菜市场,沿大午集团指示路牌西行5公里即到。

火车:从北京西客站搭火车到保定火车站或徐水火车站。大午温泉度假村距徐水火车站5公里、距保定市25公里。保定市12路公交车直达大午温泉度假村。



贵州麻山事件始末

● 伍小涛

建国初，正是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时期。尽管贵州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认同中共的政治权威，但是，一旦政策出现偏差，这种政治认同很快会出现疏离状态。1956年出现的“麻山事件”就是政治认同出现危机的一种表现。

麻山位于黔、桂交界的望谟县，是一个“种一坡，收一箩”的高寒山区，少数民族主要以苗族为主，“由于历史地理条件的限制，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极不发达，生产、生活方式也是简单朴素和艰苦，除个别的区、乡所在地外，一般居住的是茅屋，吃的是包谷，穿的是破布和麻布。并且眼光也非常狭小，只知道麻山大，再就是望谟，有‘望谟国’之称的笑话。”因此，建国后政府“大力扶持农业生产，基本上改变了山区的经济落后面貌，少数民族的生活较解放前有了很大的提高。同时农民已全部走上了农业合作化，私营商业已全部公私合营，手工业者已经组织起来了。随着生产关系的改变，望谟的各族人民和全国人民一道，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另外，党对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和提拔，也是十分重视，少数民族干部占全县干部总数的70%左右；县、区、乡一级的政权机关，已实现了机关民族化。”（《贵州省民族访问团在望谟县的访问工作情况报告》，贵州省档案馆，全宗号47，目录号1，卷576）

但是，在麻山少数民族地区高歌行进的时候，也积聚一些矛盾。这主要是（1）农业合作化的发展过快。1955年全县参加初级社的农户仅占

28%，1956年春即跃进到高级合作社（入社农户达92%）；尤其是麻山的偏僻地区，居住十分分散，当时互助组还未办好，也同样限期合作化。由于时间短，运动猛，工作粗糙，强迫命令很严重，有的乡5天就办了6个社。为了强迫群众入社，有的地区对单干农民规定了许多限制，如不入社不给盐巴吃，不准走合作社的田坎，不准到合作社的地界内砍柴放牛，合作社失了东西要单干户赔等等。在处理入社问题上不照顾民族特点，自留地过少或没有留，布依族姑娘的棉花地，苗族的麻园地、养老田、养老牛、祭祀牛都不加区别的强制入社。岂油乡有一农民要求留一棵黄果树给娃娃吃，愿以8元抵交黄果树的价款，但在干部以“自私自利”的批判下也被迫入社了。苗族老人说：早死两年还好，死了有牛宰。布依族妇女说：“入了合作社衣服都穿不上了。我们不是猴子可以光着屁股爬。”特别是有些地区耕牛计价过低，股份基金采取按经济情况分摊的错误做法，损害了中农利益，中农说：“土改斗地主，互助组限制富农，合作化化中农”，“田土入社，牛马归庄（指集体农庄）条条卡死，叫我们无路可走。”在社的规模上也没有照顾山区特点办得过大，有的生产队相距三四十里，群众感到很大的不便。（2）在各项经济工作中强迫命令违犯政策的情况也很突出。商业部门收购农村土特产品时压级压价，贱买贵卖，群众反映“比奸商还恼火”，“买东西贵如金，卖东西贱如泥”。税收上对少数民族节日杀猪宰牛没有适当照顾，课税方法机械执行“先税后售”，交不起税不准在市

场上出售,甚至把农民出售的东西扣留;有的一件产品要纳几次税,不适当的提高税率和规定不合理的税收项目,猪税 1954 年税率 8%,1955 年 12%,1956 年提高到 13%—21%。群众反映“政府的税一年重一年,比国民党还恼火”。银行干部在收贷上单纯任务观点,不顾群众实际困难硬逼硬追,有的农民被迫卖衣服还贷款;在农民出售产品时不择手段地硬扣,昂武乡一农民杀了一只 19 元的猪,在扣除税收和贷款后,剩下 7 分钱,群众反映是“辛苦一年帮政府喂猪”。(3)不重视发展边沿少数民族地区的文教卫生。麻山地区 6 个乡镇没有分销店和仓库,8 个乡镇没有小学。乐旺、桑郎等地有些群众,因医务工作人员服务态度不好,情愿自己的孩子病死也不去治疗。(《关于平息望谟县少数民族骚乱事件的情况报告》,贵州省档案馆,全宗号 1,目录号 1,卷 1386)

从 1953 年起在全国实行了统购统销政策。贵州省也出台了《贵州省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实施细则》:“农村粮食统购统销,应分别核定每户农民的粮食产量,分别规定各类地区农户和不生产粮食的农村居民的用粮量标准(即留粮量标准,包括口粮、种子、饲料)按户计算;凡生产粮食的农户,按照核定的粮食产量,减去用粮量和实缴公粮(包括地方附加)后,粮食有余的为余粮户,不余不缺的为自足户,不足的为缺粮户,不生产粮食的农村居民也为缺粮户。国家对余粮户分别核定粮食交售任务进行统购,对缺粮户分别核定粮食供应粮进行统销,对自足户不进行统购统销。……”但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国家征购过头粮的现象比较普遍,农民生产的粮食,大多都给收购上去了,所剩无几。”而地方干部为了政绩,又想法设法地层层加码并强迫完成。望谟县一区委书记“在一次乡干会议上听到有些乡未完成所布置的任务,就要他们检讨。不会检讨的就骂他们像死人一样,搞不好送公安局等粗暴态度,因而造成有些乡支书最怕到区开会”。因此“所经之乡,粮食空气紧张,一般定产定购偏高,供应过紧,昂武乡是区干部杨大向以两块丰产田增产 14.5%来强调定产,白邑乡交胞寨蒙卜进珠没有余粮可卖,找到乡政府,乡干说:‘工作同志说你家有余粮,你就有吧,找我们也不行’被迫卖 200 斤口粮,过后又供应。渡邑乡定产比常产高 14%—17%。打郎乡杨曼

5 口人,土改常产,田 17 挑,土 10 挑,1955 年实收田 19.5 挑,土 13 挑,定产 19.5 挑,土 4 挑,公粮 207 斤,定购 1030 斤,结果只卖 250 斤,显然是偏高。现在打郎乡芭蕉坪一带农民不承认‘三定’数字,普遍地说:‘当时男的都不在家,区长用绳子捆人,威胁妇女定的产,我们没有这么多的粮食。’有些农民埋怨乡长,乡长推说:‘那是区长搞的,不能怨我。’其次是粮价折合不合理,农民反对统购时 2 斤包谷抵 1 斤稻谷,供应时抵 1 斤。再次是民族节日和婚丧、盖屋等特殊用粮未供应,昂武老年代表说:‘社会主义是好,就是要住破房子,盖房子又不供应。’其四是农民反映统销‘定时、定点、定量’卡得太紧,到月没钱买不成,过月再买不供应,只好借来吃了明年再还,这样下去,年年不够吃。”(《望谟县(六个乡)民族访问工作总结报告》,贵州省档案馆,全宗号 47,目录号 1,卷 712)

1956 年 2 月下旬,家住纳夜乡海孟寨的村干杨绍斌等人到罗甸县柑棚寨探视一个年过六旬自称“皇母娘娘”的疯婆熊狗奶后,回到麻山海孟寨当众说:“王母娘娘下凡降旨了,现在中国出了皇帝,6 月 6 日登位……皇帝登位后,不要公余粮,不要人民币,不办合作社,不生产,不种地,吃不完,穿不尽;住的是大瓦房,还有学校进,石头变大米,野草变衣被,青菜变肉片,猪、鸡不用喂”等。不久杨绍斌又在海孟寨和乐旺乡新寨装神。他手敲铜锣,身披红布,走前退后,左转右转,指天踏地,念念有词:“合作化,合作化,双季小米双季包谷全是假”,“合作化,天要塌,地要垮,只有皇帝来,万年米、大楼房、绫罗绸缎身上挂”……引起大众思想强烈共鸣,麻山一带成百上千农民丢下农活到海孟寨去观看、朝拜。在这种情况下,杨绍斌、黄卜芝汇集 70 多名骨干分子在白邑乡交胞寨开会,杨自封为“大将”,黄被封为“指事”,以下为“飞虎”、“帅爷”和大小代理、片长、“神仙”(宣传员),划分片区,密谋策划“用皇母娘娘名义号召麻山农民大闹一场”,并张贴布告,立国号为“农民共和国”,定国都于“海孟”寨。

对于杨等人的行为,兴义专署认为此事件乃为群众迷信性质,因此只简单地进行了一些一般的宣传解释工作就把被捕的首要人员释放了。“由于没有从本质上去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事件于 5 月份又二次重起,以黄卜芝为首的 10 多人与前

次释放的杨绍斌又活动起来。这次活动与前次不同了,行动上采取武装,抓住我们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四处活动煽动群众,他们提出口号:第一枪打合作化,第二枪打公债,第三枪打统购统销。但活动范围仍限于苗族圈子里,说:‘6月6日皇帝登位,布依族杀一半,汉族杀光,苗族不穿麻布了要穿龙袍’,还说:‘皇帝登了位有万年米,一颗谷子吃一年,猪儿不杀变老虎’等等。由此宰杀猪儿和耕牛,种上的青麻砍掉了,生产也不搞了。骚乱的面很快蔓延了五个乡。他们还编成了歌谣进行宣传说:‘苗家受苦360天,3600年的苦难到今天还不能出头露面,哪朝哪代都是滥客家(汉族)当官,盼望出个皇帝解除苗家苦难’”(《望谟县委对骚乱事件的检查报告》,贵州省档案馆,全宗号1,目录号1,卷1386)。

与此同时,石牛乡乡干狄光举、王光前和王新华等人从麻山学习回来后,“到处造谣,进行欺骗,为了争取群众夺取政权,他们的口号是:(1)不上公粮,(2)不卖余粮,(3)不办农业生产合作社,(4)不纳税,(5)不修公路。因此,很多农民都希望皇帝赶快坐位,有的全家男女老少脱了衣服裤子在楼上跪着求皇帝。陆老毛说:‘有一天晚上皇帝叫我一,因我没有答应,病了三天。’陈德说:‘打倒魔王(指人民政府),皇帝才能登基,我们吃粮用钱才能得到自由。’由于反革命分子的阴谋毒辣,对无智的农民进行欺骗的说:‘解放军没有了’,‘解放军的枪打不响了’,‘解开胸膛子弹就打不进’等谬论。因此有的农民就拿起土枪、斧头为皇帝卖命。对政治觉悟表现较好的积极分子加以威胁,不准靠近政府,强迫写悔过书。石牛乡谢干事(女)因不参加,家里东西被逐出。因此,该乡乡长、乡干、社主任、党员、团员、民兵等几乎全部参加”(《贵州省民族访问团在望谟县的访问工作情况报告》,贵州省档案馆,全宗号47,目录号2,卷712)。

6月底,水秧乡闹皇帝的群众也日益增多,办社辅导员张老华(汉族)怕影响生产,未经过区、乡领导同意,擅自将民兵队长狄顺国的一枝钢枪收了。7月9日邮亭乡王友德(支书)率11个民兵带有7枝钢枪去接犯人,准备也劝狄顺国安心生产,狄认为是又来缴他们苗家的枪,故带着40余人将王等围起来,王等被迫交出武器。狄等又想谋害他们,并将他们捆起送往麻山。王友德、张老华等见

事不好先后逃出,到二区新屯与县报告。当天晚上,县里由财贸部副部长任长庆带领20余人准备叫狄退还政府的枪。次日狄顺国带有200余人埋伏在桥地坪进行伏击,双方均有伤亡。(同上)

……这样骚乱迅速地扩大到麻山大部分地区,甚至蔓延到与紫云、罗甸的交界处。

兴义地委认为“这主要是镇反不彻底而造成的反革命暴动”,把参加骚乱的群众一律视为土匪和反革命而采取了偏重于军事打击而忽视政治工作的方针。1956年6月底,中共贵州省委、省军区决定增调部队进入麻山地区。7月1日,内卫公安师59团团团长孟贯一率第八连和第一连一个排兵力,与兴义专署副专员王刚正带领的地委工作组到达望谟县城,随即进入麻山,安顺军分区1个分队配合紫云县公安中队进驻白花;省公安厅武工队同时进入麻山。望谟县公安干警和政府机关干部职工大部配发武器,少数驻守县城,多数进入骚乱地区。为了便于统一指挥,成立了由孟贯一任指挥长,熊亮臣、辛培田任副指挥长,王刚正任政委的“望谟前方指挥部”。7月20日又成立了以安顺军分区司令员王彦才为指挥长、熊亮臣为副指挥长的“望谟、紫云、罗甸三县清剿暴动指挥部”,22日起开始军事清剿。

因此,“骚乱群众反映:‘只听到你们的枪响,听不到你们的嘴讲。’然而我们并没听到这些呼声。对方与我军作战成员,除了有一部分拿枪的以外,其中还有妇女,有个别上了年纪的老人拿着柴刀,十一二岁的娃娃拿着木棒而随着呐喊助威。他(她)之所以敢于上战场,不过是因为迷信‘皇帝’封了枪口,解放军的枪打不响。我们的错误就在于把群众性的骚乱事件,误为反革命暴动。把受骗参加骚乱的群众扩大为反革命,扣上‘土匪’帽子,对骚乱者的家属扣上‘土匪家属’,对被俘的人员采取侮辱和关押,以为据此做法可以服众,平息骚乱。相反更加疏远了群众与政府的关系,加深了民族隔阂,助长了群众的反抗性”(《望谟县委对骚乱事件的检查报告》,贵州省档案馆,全宗号1,目录号1,卷1386)。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贵州省委发出紧急指示:骚乱事件是民族性质的,必须贯彻和平解决的方针。因此兴义地委下令:不准再放枪。据此,望谟县委随即派出武工队分头深入骚乱地区,宣传省委

紧急指示,停止军事行动。正如一检查所说:“由于在具体执行省委和平解决的方针指示时,发生了片面性,从而在军事上陷于完全被动,纵容骚乱分子杀人,抢劫供销社,到处浩浩荡荡的行动,也没有采取有效措施,硬啃地委‘不准再放枪’的指示,因此,束缚了自己的手脚,放任了骚乱事件的泛滥。”8月上旬,又连续发生阻击、伏击武工队事件。8月中旬以后,又有4名干部职工被杀害,部队指战员、民兵10余人遭伏击牺牲,供销社和粮库被抢劫。9月8日,狄顺国等纠合350多人进犯大观被击退后,窜至伏开与杨绍斌汇合,扬言“打进县城杀人”。这样骚乱地域不仅演变为望谟县的4个区29个乡,而且涉及周边的紫云、罗甸和广西的乐业、天峨诸县总共近50个乡(《中国共产党望谟县历史》,第133页),因此指挥部经请示省委、省军区批准,决定进行军事打击。9月11日在伏开战役中,武装骚乱分子死伤近百人,被俘百余人,缴获各种兵器144件。与此同时,为使省委和平解决方针得到切实贯彻执行,9月13日成立了以中共黔南地委副书记姚英为书记的(望谟、紫云、罗甸)三县工委,并派中共黔南地委书记金凤到望谟,向在望谟的军政干部传达省委《关于解决少数民族地区骚乱事件的紧急指示》。10月下旬,副省长吴实到望谟明确指出:这次事件的参与者绝大部分是老百姓,事件本身不是反革命骚乱,既不是政治土匪,也不是经济土匪;争取所有参与者回来,捉到的进行教育释放,即使是首要分子只要回来,同样宽大处理;回来的干部仍保持原职务,伤亡的群众由政府进行医治、救济、抚恤。并当众宣布将所抓获的83名参与骚乱人员释放。在强大的军事和政治压力下,10月下旬,黄卜芝等于白邑一山洞内被追剿部队击成重伤,在送往县城途中气绝身亡。至12月初,已有3250余人回家生产,交回各种枪支833支,手榴弹11枚,子弹5231发,土炮4门,刀327把。这样,除杨绍斌等20人隐匿在深山密林外,基本抓获。至此骚乱平息(1957年1月12日杨在牛场被抓)。

这次骚乱长达7个多月,共发生大小战斗110次,伤亡194人。其中骚乱者死伤140多人(含紫云、罗甸及广西死亡的22人),军政人员和民兵牺牲21人,伤23人。骚乱中宰杀牛、猪2046头。20多个乡基本上停止生产,粮食减产6460

吨。伏开、纳夜等地的供销社和粮库被抢,损失物资约合当时的人民币1.27万元,损失公粮3.45万公斤。(《中国共产党望谟县历史》,第134—137页)

对于这次骚乱,中央和贵州省委是这样认为的:“第一,对于少数民族地区发生的骚乱事件,要认真分析其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弄清楚事件是属于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是哪类问题的性质;第二,骚乱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也说明我们的工作还有缺点错误,有偏差,应引起我们的注意,加以改进和克服;第三,由于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的落后,封建主义思想及落后旧观念残余的影响,使少数民族群众容易受到欺骗蒙蔽,被人利用唆使,产生不满,引起骚乱;第四,对于骚乱事件,尽量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进行处理,按照不同性质的矛盾加以区分解决。在具体措施上,要认真检查民族政策执行情况,部队应该发扬我军优良传统,执行宣传民族政策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消除积怨和偏见,在平息骚乱中,尽量少抓人,要采取教育疏导和感化方针,一切从安定团结出发,进一步做好善后工作。”(《贵州民族工作五十年》,第179页)因此,为了稳定局势,除了在麻山少数民族地区派出访问团进行安抚外,还采取了下列措施:(1)当年粮食征购由4330吨调减为3310吨,统销指标由2610吨调增为3825吨;(2)省下拨10万元救济款购买了750吨救济粮,150头耕牛,800头仔猪,220匹布,发放给受灾群众,以8000元用于牺牲人员的抚恤和骚乱死亡人员的家庭救济;(3)宣布对参加骚乱农民一律不咎既往,已回家的干部不给处分并恢复原职,补发工资,党团员保留其党籍、团籍;(4)抽调干部下农村恢复受到破坏的各种组织;(5)明确宣布根据山区特点确定合作社规模,条件不够的允许退到互助组或单干,麻园地、花地按需要留足,允许汉族农民留适当蓝靛土,养老牛退回农户,养老田和姑娘私房地可以由合作社租种分租,也可以退回农户自己经营;(6)取消税收部门所有独出心裁的错误规定,对民族节日的屠宰税、土酒税实行照顾政策(《中国共产党望谟县历史》,第139—140页)。通过这些措施,少数民族基本上实现了对中共的政治认同。

(作者系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党史党建部副教授)

(责任编辑 徐 孔)

我知道的李庆霖上书毛主席的一些情况

● 张玉钟

1972年12月20日,福建省莆田县小学教师李庆霖给中共中央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反映他儿子李良模上山下乡中屡遭苦难的状况。信寄出4个多月后的1973年4月25日,毛主席亲笔给他回信,并给他寄了300元人民币。随即李庆霖的名字全国家喻户晓。他的这封信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两千万知识青年的生存状况。当年,我才23岁,也是一个下乡知青,比较幸运的是已在莆田地委宣传部通联站工作,这是个专门从事新闻报道的机构。由于工作关系,我多次陪同新华社记者采访李庆霖,是莆田地区内第一个知道毛主席回信的人,也是因此事第一个接触李庆霖的人,因此我有许多第一手资料。后来我读了许多关于此事的报道文章,其中不少与事实有出入,现在此事早已成为历史,我想把许多还鲜为人知的情况及细节,归纳为几点解密于此以飨世人。

一、李庆霖的信是如何到毛主席手上的?

1973年4月29日,也就是毛主席给李庆霖回信的第四天,新华社福建分社记者赖玉章突然来到莆田地委,点名要我陪他去办一件事(地委宣传部通联站共9个人中只有我一个莆田人,他每次来莆田采访多数由我陪同)。这一次他非常神秘,他是上午到达的,下午要我带他去城郊公社下林小学,我问他什么事?他一再对我交代要保密,然后告诉我,这个学校有个教师叫李庆霖,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毛主席不仅给他回信,还给他寄了300元钱;毛主席回信的内容他记录在笔记本上念给我听:“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他还说这是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新华社的,要先派记者来调查,连福建省委领导都还不知道呢。

下林小学离城关只有两公里左右,下午我带赖玉章坐了一辆人力三轮车到了这个学校。我们点名要见李庆霖,当时他还正在上课,我们就在办公室等。下课后李庆霖见到两个陌生人找他,神情很是惊异。待办公室没有其他人后,赖玉章开口问他:“你有没有给毛主席写一封信?”我在一旁没有说话,一直注意观察他的表情,我记得他沉默好久都没答话,他在心里估摸到底是福还是祸。赖玉章问话后微微笑着,他心中觉得应该是好事降临,于是他重重地点了点头。接着赖玉章说:毛主席看到你的信还亲笔给你回了,并给你寄了300元钱。他听了脸上并没有露出笑容,而是紧张而严肃地反问:“毛主席是怎么回的?”赖玉章给他念了信的内容,这时我看到他脸上渐渐舒展开来,溢出兴奋之情。赖玉章说这件事还要十分保密,并告诉他自己在兴化宾馆某房间,约定晚上到宾馆细谈。晚上7时多,李庆霖到了赖玉章宾馆房间,就我们三个人谈了两三个小时一直到夜深才离去,这次谈话(事实上是采访)令我终生不会忘记。

李庆霖那天晚上已经没有了白天那种拘谨严肃的神情,表现得非常高兴,他说话慢,语调也比较低,但完全打开了话匣子,从他家历史身世、儿子上山下乡遭遇的苦难,到自己如何想给毛主席写信,都说得非常详细。我们提出了最感兴趣的一个话题,问他信是如何寄出去的?原来那一天他在一张竹桌上写好了信,接着就写信封“毛泽东主席收”,就拿出来

邮寄。当时莆田城内只有一家邮局，离他家西北向。他一边走一边心里在打鼓，倒不是怕闯祸，主要是担心主席收不到，因为这之前他也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却石沉大海，他想可能是周总理没收到，那主席要看到这封信就更难了。走到半路，他脑子突然闪出一个念头，他经常看到报道毛主席接见外宾，外交部王海蓉都在场，何不如把信寄到外交部王海蓉收，请她转交给毛主席。他想到这里心里一阵激动，就马上折回家中，就在信封上写外交部王海蓉先生收。因为我年纪轻古文基础差，我马上问他，王海蓉是女的，怎么

称“先生”？他温和地笑了笑说：“先生”是一种尊称，男女都可以用（对女士也可称先生我就是这一次听李庆霖说的）。他还说他也给王海蓉写了一封短信，说自己家碰到天大困难，请她一定把信转给毛主席。然后就把给毛主席的信套进去寄走。因此可以断定，这封信是王海蓉收到后看了一定很感动，亲手转交到毛主席手上的，非此这封信也就夭折了。我想全国知青和家长真的应该感谢王海蓉先生！

我看到的所有文章包括有的采用李庆霖自述的，都说新华社记者赖玉章是5月1日到莆田找李庆霖的，这是记忆上错误，准确的是4月29日。过了几天到5月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了福建省委，省委通知了莆田地委和莆田县委。当时的县委书记是部队干部叫刘功，激动地对着电话筒高呼毛主席万岁，后来许多媒体都写到这个细节，这是确实的。5月6日，李庆霖收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寄来的毛主席回信的复印件，随后也收到了300元钱。从此开始，这件事就在莆田城内传开来了，李庆霖出名了。

二、李庆霖是怎样性格的一个人？

李庆霖1929年出身在莆田县城关一个极度贫困的贫民家里。他祖父当过乞丐，父亲很小就被送到一家首饰铺当学徒，以打制妇女首饰为业，但因生意萧条，铺子关门也到乡下乞讨，后来患上精神疾病，上吊自杀未遂致残，年纪不大丧



李庆霖晚年照

失了劳动能力，全家人就靠母亲打小工、当保姆维持生计。尽管家徒四壁一贫如洗，母亲却咬着牙节衣缩食硬撑着供李庆霖读书，而李庆霖的妹妹上不起学，8岁就被送到一家草编店里学编织草帽草席。1944年福建省立仙游师范来莆田招生，免收学费还供应伙食，李庆霖便去报考，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了。入学那一天，母亲挑着行李陪着儿子，从很早上路，一直走到下午才到学校。李庆霖深知读书机会来之不易，发愤刻苦，熬了4年到1948年毕业，分配到莆田县黄石镇沙坂小学，月薪为140斤大米，生活很清苦，但总算有一口饭吃。解放后，他被政府留用继续任教。1951年，22岁的他与学校所在地的农村姑娘张秀珍结婚，婚后5年中长子良模、女儿良培、次子良雄相继出生。1956年全家搬回城关老家居住。1958年他被调到沿海忠门公社前坑小学担任教导主任，并担任一个毕业班的班主任。才3个多月就初考，这个班因成绩太差没有一个考上初中。当年正逢大跃进时代，时兴“插红旗、拔白旗”，莆田县教育局召开小学庆功大会，李庆霖等一批升学率低的班主任被宣布作为“白旗”拔掉，同时他被免去教导主任职务，工资由每月50.5元降为42.5元。这一次处分在他心里刻下了一道永远抹不掉的伤痕，直到他出名后在各种场合都愤愤不平不厌其烦地谈起。

一辈子艰难曲折的经历，使他学会了坚强。看起来文弱书生，心里却潜藏着一种敢于与命运抗争的强者精神。正因为这样，他遭遇儿子上山

下乡中的困难,敢于向各级领导机关反映,敢于给周总理写信,没有收到回信也没灰心,反而进一步想到给领袖毛主席直接写信。也许是他从小刻苦读书积累下的扎实基础,他的文字功底令人佩服。他出名后,红旗杂志通过地委宣传部约他写一篇谈反潮流的文章,这个任务部里就交给我去转达,过几天他把稿件交给我邮寄到北京,我把稿件从头到尾看了,不久红旗杂志刊登出来,我又认真看了,几乎全部是原文,编辑基本没有改动,这当时就让我这个拿笔杆为生的心悦诚服。现在我回忆这件事,并非说他所包含的政治内容,而是说他文字功底和朴实文风,有一种很大的可能让毛主席也被他所感染。当年把毛主席复信和李庆霖的信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3]21号)向全国传达,印发出来的是他原原本本的信,一个字没有改动,原文中就没有一个错别字,我想就是现在任何一个大秘书要做到自己一次性起草的文章作为中共中央文件而不需要改动一字的,恐怕是极少的。毛主席自己一生讲究文字,看到这样一封信怎不会被感动?而且全信朴实无华,让人读了觉得真实可信,却也不乏幽默感,比如“呼天不应,叫地不灵”,“只好大胆地冒昧地写信到北京‘告御状’了”,这些话很符合毛主席喜欢的语言风格。还有从全信内容看,李庆霖虽然把上山下乡中的困难写得很尖锐,但敞开的是一种真诚的心怀,从头到尾没有一句否定毛主席亲自倡导的这场上山下乡运动,甚至你读不出信中有对整个上山下乡运动的怨恨情绪,这也不能不令伟大领袖感动!所以,毛主席在对八大军区司令员谈话中,赞扬李庆霖那信“写得相当好啊”。他看了三天才下决心回信。他还建议把这封信编入学生课本中。

三、李庆霖政治上是怎样大红大紫起来的?

毫无疑问,李庆霖“告御状”促使了中共中央高层高度重视和全面调整知青政策,直接使全国两千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也包括回家乡的知识青年)的命运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在今天看来仍然是一件大好事。随着中共中央[1973]21号文件的贯彻落实,李庆霖成了全国知青及其家长

心中的神圣人物。因为他为广大知青办了一件天大的好事。

但是历史的发展往往难以预料,李庆霖出名之后很快就在政治上也大红大紫起来,这当中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毛主席对他器重有加。毛主席除了给他亲笔回信并寄钱外,还特地对他政治上的发展也嘱为安排。回信后的两个月,约在1973年6月下旬,福建省委和莆田地委、县委都得到了正式渠道传来的一个内部消息:毛主席对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说:要问一下福建的李庆霖是不是党员?如果是党员,可考虑推选他为“十大”代表;如果不是党员,有入党要求,可吸收他入党并参加“十大”,如果没入党要求,可让他出席“四届人大”。毛主席对一个普通的小学教师的政治安排说得如此细致而具体,这令各级领导感到极大震动和高度重视。但据我所知,当时领导层内部都在紧张商讨如何落实毛主席的指示,却没有一个领导正面向李庆霖透露。因此他本人对此毫无所知。当年身兼福建省党、政、军一把手的韩先楚接到毛主席的这一内部指示后,即把李庆霖召到福州亲自接见,但也并没有当面说出毛主席的指示,只是鼓励李庆霖说,你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来,包括政治上的经济上的。李庆霖就向韩先楚司令员提出两件事,一件就是上面说的1958年他被插上白旗受处分,他要求给予平反纠正;还有一件是他妻子曾经是国家正式职工,困难时期被辞退,要求给她恢复一份正式工作。这两件事韩先楚都认为合理很快就解决了,李庆霖被调到莆田全县最好的一所小学即东方红小学(现为实验小学)担任领导小组副组长(副校长),还补发了从1958年到1973年被降低的工资,妻子也被安排到莆田第四中学当正式职工。

这是李庆霖出名后短短数月内实现的两项要求,李庆霖心里已经很满足了,对于入党要求他心里却没有想到,因此一直没有提出来。最早带来毛主席回信消息的新华社福建分社记者赖玉章,那一段经常来莆田追踪采访,他对李庆霖还没有提出入党要求心里很焦急,他对我说:小张,毛主席很希望李庆霖参加十大,眼看十大就要召开了,但李庆霖还不知道提这个要求,官员们可能不好当面问李庆霖这件事,你小青年干脆给他明确提一提,没关系的。我觉得这是件好事,

就应允了赖玉章，一个人到了仓后路居仁巷15号李庆霖家，因为已经多次接触很熟悉了，我就开门见山问他对组织上还有什么要求？他说省地县领导已经解决了他的两件事了，孩子在农村的困难，全国都在解决，相信也会好转的，他说他很满意了。我看到谈话还不能进入有关入党的主题，就索性问他，听说毛主席有对汪东兴说了一段你的事，你知道了吗？他说没有人告诉他。我就把具体内容说了，他听了非常惊讶兴奋，问我怎么办？我说入党要求必须本人有这愿望并自己提出来，别人不好代替，你要赶紧向组织上提出申请。他还问我一些如何申请的具体事项。第二天他就向莆田县委写了入党申请书。我看到许多文章都说李是在7月1日写的申请书，但据我回忆，写申请的时间应在7月中旬。莆田县委接到李的申请后，马上报告了地委和省委，接着各级领导及组织部门内部开始为李的入党紧张运作，进行内查外调，但最终没有在党的“十大”召开前解决李的入党问题，当然李就失去了参加“十大”可能受到毛主席接见的机会。拖延解决李庆霖入党问题，主要原因是在调查中发现敌伪三青团档案中有一份李在仙游师范读书时全班同学的名单，这份名单中有的名字前面打勾，有的没打勾，分辨哪一种是三青团员费了一些时间，到确定李不是三青团员而决定发展他入党，时间就拖到“十大”之后。翌年即1974年开展批林批孔运动，莆田反对当局的这一派就把这件事当做当局打击迫害李庆霖的一大罪状，认为是当局怕李庆霖去参加“十大”受到毛主席接见说出对当局不利的话而故意设置障碍。李庆霖本人也有这种看法，这是他后来直接跳出来反对当局领导的起因之一，并多次为自己最终未能见到毛主席表示遗憾。

李庆霖第一次在全省公开“大出风头”是1973年7月2日，省委在福州市召开群众大会，贯彻落实中共中央21号文件、学习毛主席回信和李庆霖信件。这之前省委领导也已接到毛主席对汪东兴关于李庆霖政治安排的谈话内容，因此省委高规格邀请李庆霖来福州出席大会并讲话。没想到平时沉默寡言的李庆霖口才不一般，他不用讲稿侃侃而谈约一个半小时，开头从学习毛主席回信的重大意义，说到他为什么给毛主席写

信，后半部分他话锋一转说：“当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给我写信的事在社会公开之后，我们莆田社会上产生了一股不能小看的政治压力，企图对我倒咬一口，把此事全盘推翻。我想有必要说它一下，让我们共同来提高对路线斗争的认识，也许有一点好处。”接着他讲了几个具体反对他的事，却上纲到两条路线斗争高度上来，这意味着李庆霖开始公开走上政治舞台了。但这一次他只讲到反对他的有关工作人员，矛头还没有指向当局领导层。

随后，在李庆霖入党问题上虽然拖延了一段时间，但在仕途上却接连步步高升，在担任东方红小学领导小组副组长（副校长）后，又被任命为莆田县教育局副组长（副局长）、莆田地区知青办副主任、福建省高招办副主任。虽然错过了参加“十大”机会，各级领导还是不敢违背毛主席的政治安排，推选他出席了四届人大，并当选了四届人大常委会常委（如今天是正部级的待遇），还被任命为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成员。至此，李庆霖的政治生命走到了顶峰，真可谓大红大紫。

四、李庆霖最终成为悲剧人物的原因何在？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李庆霖很快受到关押批斗，被判处无期徒刑，后来虽然获得减刑，但也被关押到1994年3月才提前出狱，回家后贫病交加到2004年2月凄惨去世，最终成为了一个大起大落的悲剧人物。客观公正地分析，应该说造成他悲剧绝不单是他个人原因，主要是“文革”的时代悲剧促成了他个人悲剧。

李庆霖被卷入政治旋涡关键的时间点是1974年初开始的所谓“批林批孔”运动。莆田地区当时派性斗争非常激烈，在全国都是有名的。李庆霖1973年出名后那一段，虽已开始走上政治舞台，但还没有参预到两派斗争中，经常说到的只是反对他给毛主席写信的一些人和事，更多谈到的是社会上和党内的不正之风，他最恨的是“走后门”，他当省高招办副主任期间就不顾情面顶住了一些领导干部子女走后门上大学的事，而且还带头把自己的次子李良雄又送去上山下乡，这在当时干部群众中都是认可并传为美谈的。

但在李庆霖有了一系列的官位头衔并在政治上有一定的发言影响力之后，“四人帮”就他身上看到可以利用的优势，批林批孔运动一开始就把他“包装上市”。《红旗》杂志约他写了谈反潮流的文章，“四人帮”随即把他与辽宁省交白卷的张铁生相提并论，树为“北张南李”全国两个“反潮流”的典型，制造了强大的舆论氛围。后来有人说，江青曾接见过他，这我没听他说过无法证实，但他亲口给我说过，他到上海时马天水、徐景贤接见了并大肆鼓励他“反潮流”。李庆霖也就在这种舆论的吹捧下，头脑发热飘飘然起来并与日俱增。

接触过李庆霖的人都会觉得，他一副文弱书生模样，全身弥漫着一股浓重的书生气。他刚出名后第一次出差，还不懂得如何办报销手续，特地到我们办公室问，走时告别不是和别人握手，而是两手抱拳连连作揖。他走后大家都笑着议论，真是书生一个。像这样一个一生只在小学教师岗位上的小知识分子，怎么可能具备政治家的素质、眼光、见识和城府？但“文革”那种畸形的时代，却借着毛主席回信的东风，一下子把他推到了高端政治的风口浪尖上，赋予了他极大的政治发言权，他再也不可能掌控自己的命运之舵，只能随着变幻莫测的险风浊浪起伏升沉。据我所知，1973年他抨击政治的矛头还只是局限于当地机关一些反对过他和事，而对各级当局领导安排他那么多官衔还怀着感激之情，但从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开始，莆田地区乃至福建省的派性斗争就打着拥护“反潮流”的旗号缠住了他，把矛头对准了当局领导，首先就把李的入党时间拖延不能参加“十大”当做当局领导的大阴谋进行追查，进而把当地机关中反对他的一些人和事都当成是当局领导有计划有步骤的策划，并上纲上线到这是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李庆霖本人在这种氛围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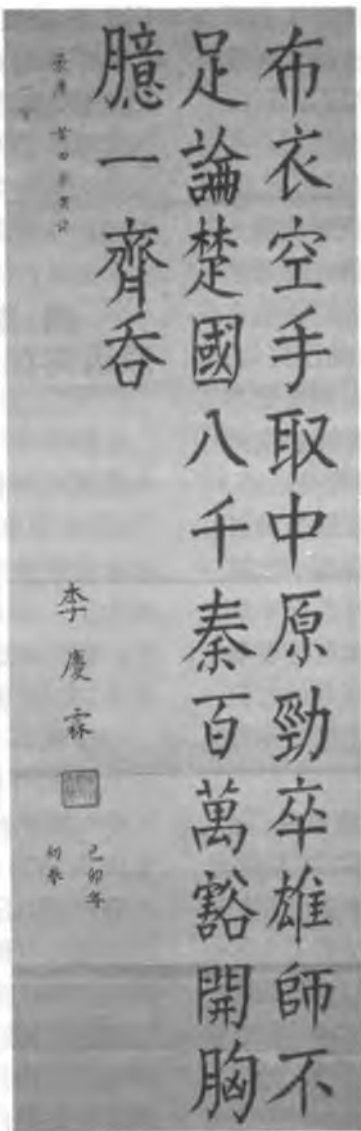
自觉不自觉地被推到第一线，和当局领导严重对立起来从而一发不可收。

1975年他参加了四届人大并当选全国人大常委后气势更红火了，派性势力对他的吹捧、利用也进一步无以复加，而他本人头脑也更加发热膨胀起来，更深地卷入派性斗争，把自己凌驾到当局领导之上，以“太上皇”自居的味道越来越浓。有人写信向中央反映了李的所作所为，姚文元就派记者来福建调查。调查的结论却是：“李庆霖同志保持反潮流战士的革命精神，对于错误倾向和不正之风，别人不敢说他敢顶”，“他同当地领导的矛盾实质上反映了在路线、方针、政策上的原则分歧”。这种结论当然使李庆霖更加有恃无恐。福建省委领导出于爱护向当时主持国务院

工作的邓小平反映他的问题。邓小平批评说：“这个人入党不久，尾巴翘得那样高，要好好教育他，警告他，公开对他讲，你这样搞是要垮台的。”省委领导也找他谈话做工作，但在当时的形势下是很难起作用的。

到了1976年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李庆霖更是从莆田当地发展到成为福建全省的一个“派头”了，到处演说作报告，表态支持造反派，把各级当局领导当做邓小平之流批判、打倒。可悲的是，在他的心里，他完全把这当成拥护和捍卫毛主席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行动，他认为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必须坚定不移地站在毛主席一边、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这样才对得起大恩人毛主席！

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之后，他自然成了“四人帮”在福建的代理人、黑帮、亲信、爪牙而受到重重的惩处。10月底被宣布停职检查，随即被隔离审查了1年多，在莆田当地并被押到福州等各地，一天两场三场批斗，前后共有百多场批斗会，也时常有过拳打脚踢，一



李庆霖书法

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何曾有过这种境遇，他曾有多少次昏倒在地。1977年11月1日他被宣布正式逮捕。又过了1年多，莆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他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送到武夷山脚下的崇安劳改场关押改造。对此判决，李庆霖始终心存不服。他承认自己在运动中说错话办错事，但说他是打砸抢分子及带头人他绝不承认。当时福建拍了一部轰动全国的著名纪录片《铁证如山》，据说福建省委书记廖志高招待华国锋等中央政治局领导看了都感到震动。其中有个镜头：莆田县委大院里有间挂满枪支的房子里，李庆霖被带到这里，镁光灯闪过就被带出来，而解说词说：“李庆霖组织武斗队，大搞打砸抢，专业武斗队有201个，参加人数有6700人。”李庆霖只要有场合说话，就说那是强安在他头上的。后来即1990年南平地区中级法院给予减刑到1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1994年3月他出狱后虽获得了自由，但等待他的却是贫病交加的生活窘状，不仅没有经济收入，而且帕金森、脑萎缩、肺气肿、气管炎等多种疾病缠扰。

一人落难、全家遭殃，其妻张秀珍也被戴上“反革命”帽子并开除公职，“监督改造”3年，后来虽然给予平反，但一直到她1997年去世也没恢复公职。李庆霖给毛主席信中反映遭受困难的长子李良模，李庆霖有权有势时并没有趁机安排他回城工作，而是继续让他留在原地萩芦公社水办大队，后来在那里入党，并在萩芦公社担任一个挂名的党委委员，李庆霖被关押后他也很快被免去职务，到1980年全公社知青都回城安排了工作，唯有他一个人仍留下来劳动，1982年好不容易招工到仙游糖厂当厂区铁路的养路工，以后当上小火车司机，现在一个镇的土地所工作。次子李良雄是在毛主席复信后，李庆霖带头又把他送去上山下乡，后来作为身边没有子女政策安排回城到县公安局工作，这时也被开除出县公安局，重新回到插队的知青点，但是知青办不要，街道也不收，他只好把户口揣在口袋里去打短工，直到1996年才安排到他母亲原来工作的莆田四中当一名职工。

在李庆霖遭难直至2004年去世的近30年中，唯一让李庆霖精神感到欣慰的是，全国两千

万知青及家长大多没有忘记他，在李庆霖坐牢和出狱后，不少老知青想方设法找到他或打电话给他，有话语安慰的，也有寄钱送物的，这是他独有的一笔精神财富。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2003年8月12日。我大学一个同学的女儿在美国留学念博士，她博士论文竟是写李庆霖，而且该大学居然对这个题材非常感兴趣，专门批准她回来当面采访李庆霖。她所在大学里有两个美国教授，妻子都是当年中国的知青，听说她要回国见李庆霖，都委托她向李问好，我听了也很受感动。因此很乐意那天陪她来见李庆霖。李还是居住在那低矮的旧屋子里，房间里的一切老旧得几乎原封不动，唯有墙上挂着毛主席像的镜框锃亮崭新。李庆霖只能躺在床上，气管炎很严重了，讲话上气不接下气，但仍然非常友善接待我们，有问必答，说话慢慢的却很真诚。问他当前生活如何着落，他说：出狱后分文没收入，逼得实在没办法，他找到莆田县领导，郑海雄书记批给他每月210元；后来接任的书记刘可清批准增加到每月300元；现在又增加到每月500元，据说是习近平（当时任福建省长）批的。他说出这些领导的名字一个一个记得很清楚，听得出他还是怀着感恩心情的。他最后几句话我记得很牢，他说：我不后悔给毛主席写信，毛主席没错，我也没错。后来发生的事是一场历史的梦，现在梦醒了，我也快归天了。半年之后李庆霖去世了。我责怪他儿子没有通知我，没能赶过去送丧，但电话中他告诉我，当时出不起钱火化他爸爸，还是城厢区区长阮军批准给予免费火化。还有他没钱买墓地，1993年他奶奶去世、1997年他妈妈去世，连同他爸爸去世3个人的骨灰盒一直放在自家狭窄的屋子里而得不到安宁，后来也是阮军区长批准他以三折优惠购买了一小块公墓地，把3个人连同他早年去世的爷爷的骨灰一起合葬，终于使他们入土为安了。我想，李庆霖的名字还是会被历史记住的，也应该记住的，连美国人都感兴趣，中国人更应该给予记载总结并吸取教训，本着这个目的，我把自己所知道的如实写下来，也许对历史研究有一点点价值吧。

写于2008年11月9日

（作者为福建日报社高级记者）

（责任编辑 杨继绳）

蔡元培和鲁迅

● 张家康

在中国,几乎没有人不知道鲁迅。可是,你未必知道,中国的另一位哲人和先贤蔡元培与鲁迅交往的详情,以及他对鲁迅一生的影响。还是郭沫若说的好:“影响到鲁迅生活颇深的人应该推数蔡元培吧。这位有名的自由主义者,对于中国的文化教育界贡献相当大,而他对于鲁迅始终是刮目相看的。鲁迅的进教育部乃至进入北京教育界都是由于蔡元培的援引。一直到鲁迅的病歿,蔡元培是尽了没世不渝的友谊。”

久慕其名

他们都是浙江绍兴人,两家虽相距颇远,然而却向有世谊。蔡元培长鲁迅十三岁,在科举取士的那个年代,这位朝廷翰林院学士,自然在童年鲁迅的心田留下神奇、仰慕的印象。辛亥革命时,蔡元培已是闻名国中的革命者,他创立爱国学社,领导拒俄运动,创办《俄事警闻》和《警钟日报》,鼓吹“抵御外侮,恢复国权”。1904年11月,蔡元培和章太炎等创立光复会,蔡元培为会长。光复会成立后,蔡元培便邀他的朋友、浙江会党首领陶成章入会。陶成章也是鲁迅的朋友,他和鲁迅无话不谈,常向鲁迅透露革命党人的一些起义讯息。通过与陶成章的多次接触,鲁迅认识了光复会领袖蔡元培。

1912年1月,孙中山在筹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时,力荐蔡元培担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蔡元培长教育部后便延揽人才,鲁迅的朋友许寿裳参与此事,并向蔡元培推荐鲁迅。蔡元培对许寿裳说:“我久慕其名,正拟驰函延请,现在就托先生代函敦劝,早日来京。”此时,鲁迅正对辛亥革命后的绍兴失望至极,深感“越中地棘不可居”,接到许寿裳的两封信后,便立即来到南京。自此,用蔡元培的话说,他们便“始常见面”,并由此而结识、订交。

蔡元培着手教育改革,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教育部,再也不是旧式封建衙门的脸面。他以身作则,每天上午九时上班,下午五时下班,照学校成规,以摇铃为号,分工任事,行政效率极高。鲁迅由此似乎看到希望,他说:“说起民元的事来……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4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由南京迁往北京,教育部也要北迁,部员当然要有所调整。此时,教育部次长景某乘蔡元培北上期间,大力安置亲信,教育部又成了封建式的衙门。

鲁迅看不惯景某的官僚习气,两人心存芥蒂。景某早有报复之心,便乘教育部北迁之际,把鲁迅列入部员的裁减名单。蔡元培在南京看到这张名单后,立即予以制止。他致电鲁迅等:“昨日国务院成立,教育部亟须组织,请即日北来,为盼。”鲁迅仍被聘为教育部佥事、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主管科学、美术馆、博物院、图书馆、音乐会、演艺会等等。

蔡元培毕生注重美育,提倡“以美育代替宗教”。他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他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中说:“顾实则美术诚谛,固在发扬真美,以娱人情。”5月,蔡元培派王家驹筹办“北京夏期讲演会”,以“从事学问,阐发理术,宏深造诣”。他知道鲁迅对美学有独到的见解,便指派鲁迅讲授《美术略论》。鲁迅十分乐意地接受了这一任务。

鲁迅不辱使命,他的讲演深入浅出,很得学员的喜爱。蔡元培被迫辞职后,新任总长便把“美育”删除,代之“以孔子之言为旨归”的道德教育。鲁迅对此感到极为可恨,他在日记中写道:“闻临时教育会议竟删去美育,此种豚犬,可怜,可怜!”

蔡元培长教育部后,便提出废除祀孔,不把孔子作偶像崇拜,小学废止读经,大学取消经科等革故鼎新的主张。一时间,社会上的守旧势力如丧考妣,群起而攻之,惊呼:“其祸我国民,岂有极哉?”

袁世凯当然不会接纳教育改革的思想,于是,蔡元培遂辞去教育总长职。据鲁迅日记所记,在此前后,他与许寿裳都曾访问蔡元培而未遇。7月22日,一个黑云压城的傍晚,鲁迅和许寿裳几个朋友,为被辞职的蔡元培饯别。

“世味秋荼苦,人间正道穷。”鲁迅由此深切感受到,在这个专制集权的社会里,欲思改革的不易和痛苦。蔡元培辞职而去,新任总长走马灯似的换了一个又一个。鲁迅后来说:“我身做十多年官僚,目睹了一打以上总长”这些粉墨登场的官僚不是来办教育的,“说得露骨一点,就是做‘官’。”教育部内充斥着一片污浊,无聊的气氛。

鲁迅已无正经事可做,只能用抄古碑、搜集金石拓本、辑录和校勘古书来消磨时光。蔡元培也有此爱好,他们之间常有切磋和交流。蔡元培将自己收藏的《赞三宝福业碑》、《高归彦造像》、《丰乐七帝二寺邑义等造像》和《苏轼等仿像老题记》拓片赠送于鲁迅。他们还就汉代石刻进行讨论,鲁迅在致蔡元培的信中说:“汉石刻之人首蛇身像,就树人所收拓本觅之,除武梁祠画像外,亦殊不多,盖此画似多刻于顶层,故在残石中颇难覩也。”

结念弥深

1917年1月,蔡元培接长北京大学,采取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对北大首从文科进行改革。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独秀带着《新青年》由上海来到北京,于是,发端于上海的新文化运动,其战斗营垒由上海迁来北京大学,这所弥漫着封建衙门的腐败、陈旧气息的全国最高学府,开始呈现生机和希望。

此时,鲁迅仍在教育部供职,在沉重、黑暗的社会机制的压抑下,他特别感到孤立和愁闷,他说自己“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他常常一个人躲在补树书屋,



1933年2月17日,鲁迅与萧伯纳、蔡元培

整日整日地抄写古碑。后来,他的朋友、同乡、北大教授钱玄同,将他引入北大《新青年》营垒,他的《狂人日记》、《孔乙己》和《药》等白话小说,才得以由《新青年》而面世,中国知识界的批判封建礼教、鞭笞封建文化教育制度的思想文学革命,也因此而真正展现出实实在在的实绩。

可以设想,如果蔡元培在北大实行的不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那么,老气横秋的北大是不可能让《新青年》有存身之所,鲁迅也就决然不会有发表白话小说的地方,他可能仍在补树书屋内“失望,颓唐得很了”。

其实,蔡元培对鲁迅和周作人兄弟向有倚重,他刚刚履任北大校长便给鲁迅去信,只是由于鲁迅已在教育部供职,而未聘其到北大任教。但是,却和他多次谈起欲聘其二弟周作人的事。1917年3月8日,鲁迅在致蔡元培的信中说:

前奉书,屡告起孟(即周作人,作者注),并携言语学、美学书籍,便即转致。顷有书来,言此二学,皆非所能,略无心得,实不足以教人。若勉强敷衍,反有辱殷殷之意,虑到后面陈,多稽时日,故急函谢,切望转达,以便别行物色诸语。今如说奉闻,希鉴察。

周作人来到北京,与大哥鲁迅住在一起。他们为应聘之事多次与蔡元培磋商。根据周氏兄弟的意见,蔡元培聘周作人为文科教授,兼国史编纂处纂辑员,教授欧洲文学史和罗马文学史。蔡元培知道鲁迅有相应的美学知识,便委托其为北大设计校徽。1917年8月7日,鲁迅日记记:“寄蔡先生信,并所拟大学徽章。”迈过百多年的历史风尘,这枚鲁迅设计的校徽,至今仍在北大师生的胸前佩戴。1920年8月2日,鲁迅也收到蔡元培的聘书。

鲁迅主要讲授中国小说史,他的课讲得很生动。冯至先生回忆说,听鲁迅的课,“在引人入胜、娓娓动听的语言中蕴蓄着精辟的见解,闪烁着智慧的光芒。”鲁迅还在讲义的基础上完成《中国小

说史略》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空前之作，胡适曾高度评价说：“这是一部开山的创作。”五四运动时期，北大之所以能开风气之先，成为新文化运动之先河，纯是蔡元培广泛延揽人才，集中了一大批思想新进、学术扎实的知识精英，鲁迅便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人物。

1927年6月，蔡元培就任大学学院院长后，满怀信心和希望，要在全国高等教育领域兴起一股改革之风。他还像15年前长教育部时那样，很快便给鲁迅发了聘书。12月26日，鲁迅被聘为大学特约著作员。据鲁迅日记所记，蔡元培曾专程拜访过鲁迅。在居于主流地位的当权者的衮衮诸公中，唯有蔡元培能够认识到鲁迅的文化学术地位，也唯有他能够接纳鲁迅，并为其提供一个位置，以展示其才识和水平。

不仅对鲁迅，蔡元培对周氏三兄弟都是尽其所能给予帮助。鲁迅的三弟周建人原在商务印书馆工作，1932年“一·二八”时，商务印书馆被日军炮火焚毁，员工均被解雇，周建人因此而生活无着，鲁迅为此很着急。3月2日，鲁迅给他的好友许寿裳写信说：“商务馆虽云人员全部解约，但现在当必尚有蝉联，而将来且必仍有续聘，可否乞兄转禀蔡先生代为设法，俾有一栖身之处，即他处他事，亦甚愿服务也。”蔡元培知道此事后，立即往商务印书馆与王云五相商。后来，书馆因裁员而发生纠纷，鲁迅又去函许寿裳说：“但今兹书馆与员工争持正烈，实亦难于措手，拟俟馆方善后事宜办竣以后，再一托蔡公耳。”

到了6月，商务印书馆内部纠纷已经平息，蔡元培才又去与王云五相商，于是，周建人再次与商务印书馆签订聘约。鲁迅对此事十分感激，和三弟周建人专程往蔡宅面谢，因蔡元培外出而未遇。鲁迅在转托许寿裳代致谢忱的信中说：“弟本拟向蔡先生面达谢忱，而又不遇。大约国事鞅掌，外出之时居多，所以一时恐不易见。兄如相见时，尚乞转致谢意为托。”

书赠鲁迅

蔡元培是个民主主义者，他的保卫人权的活动，可以追溯到辛亥革命时期。1912年8月15日，湖北革命党人张继武、方维遭黎元洪、袁世凯共谋诬陷，在北京被杀害。他对此暴行极为震怒，

立即在《民立报》发表通告谴责说：“此种举动，明明故意违犯约法，玩弄国民。若不讨论其究竟，无以为法律生命之保障，尚何共和政体之可言！”他和吴稚晖等还专此发起成立法律维持会。可是不久，中国社会党首领江亢虎又在武汉被黎元洪下令逮捕。中国社会党为声援江亢虎，在上海召开会议，蔡元培应邀到会，他在会上批评说：“江亢虎在鄂，并未有他种举动，甫抵汉口，即被拘捕，与满清时代拘捕革党，如出一辙，蹂躏人权，莫此为甚。”

正是基于维护人权的个人传统，所以，他毕生都在为此而奔走、呼喊。1932年夏秋间，蔡元培、宋庆龄、杨杏佛等在营救国际友人牛兰夫妇和陈独秀等人的时候，便已酝酿着发起人权组织，以维护人权。不久，他们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筹备委员会，并起草宣言交蔡元培修改，这份宣言评价当时的中国人权状况是：“抑制舆论与非法逮捕、杀戮之记载，几为报章所习见，甚至男女青年有时加以政治犯之嫌疑，遂不免秘密军法审判之处分。”他对中国人权状况的评价，与鲁迅所说的“时危人贱，任何人在任何地方皆可死”，可谓是同声相应，心心相通。

1932年12月17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正式成立。同盟成立后，他即去信邀请鲁迅入盟。据1933年1月6日鲁迅日记：“下午往商务印书馆，邀三弟同至中央研究院人权保障同盟干事会。”17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上海分会召开成立会，蔡元培和鲁迅等出席会议，经过投票选举，他们都当选为上海分会执行委员。

中华民族已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可是，蒋介石仍在变本加厉地排斥异己、镇压革命，甚至恫吓说：“侈谈抗日者杀无赦。”人民连说话的权力都被剥夺了，又从何而谈抗日救国呢？蔡元培为此常常陷入无尽的困惑和愤懑之中，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他将自己的昔日旧作，书赠于鲁迅：

养兵千日知何用，大敌当前暗不声。
汝辈尚容说威信，十重颜甲对苍生。

几多恩怨争牛李，有数人才走越胡。

顾犬补牢犹未晚，只今谁是藺相如。

他还痛心地对鲁迅说，国民党为了想消灭政治上的敌对者，连民族的存亡都可以不顾，这是他始料不及的。“如磐夜气压重楼”，“雾寒苍天百

卉弹”。1933年的中国,正如鲁迅所描述的黑暗、凋零和凝重,可是,蒋介石还嫌中国专制、独裁的不够,竟然要效法希特勒,创设复兴社和反省院。他的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喧嚷已是甚嚣尘上。5月13日上午,宋庆龄、杨杏佛和鲁迅等亲往德国驻上海领事馆,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名义递交抗议书,强烈抗议希特勒的法西斯政党践踏人权的暴



鲁迅、蔡元培和宋庆龄等

行。这份抗议书虽然“已引起举世特殊之注意”,然而,它不可能引起当权者的注意和反省,相反,他们更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为推行专制独裁统治的绊脚石。

1933年2月17日,英国著名作家肖伯纳由香港来到上海。中午,鲁迅应蔡元培之约,到宋庆龄家参加欢迎肖伯纳的午餐会。肖伯纳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都曾撰文叙述这次会见。蔡元培称肖伯纳“年已七七,须发皓然,而言语爽利,举动轻便,毫无老态”。鲁迅则称赞肖伯纳“雪白的须发,健康的血色,和气的面貌”。午餐后,他们和宋庆龄、林语堂、伊罗生、史沫特莱与肖伯纳合影,并且还和肖伯纳单独合影留念。

据伊罗生回忆,肖伯纳本来打算发表一个反对国民党的声明。但是,肖伯纳因在香港已发表了过多的反战和同情社会主义的言论,来到上海时,便遭到一些报刊的责难和讨伐,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肖伯纳再也不愿发表任何政治言论,用伊罗生的话说:“我们怎么也不能够使得老肖的注意力集中于我们关心的问题。”

反动派终于要下毒手了,6月18日8时15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被四名暴徒暗杀。蔡元培和鲁迅没有被吓倒,他们强忍悲痛,共同参与料理杨杏佛的后事。敌人杀害杨杏佛,其用心是十分清楚的,无非以此威胁宋庆龄和蔡元培,但是,他们都表现出了威武不屈的凛然正气,鲁迅对此十分敬佩,他说:“打死杨杏佛,原是由于宋庆龄和蔡先生的警告,但他们两位是坚决的。”

杨杏佛被害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也被迫停止了活动。然而,他们没有因此而放弃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鲁迅是熟知蔡元培的,他对冯雪峰说:

蔡元培的同情革命者,也不过是为了民族而已。但革命者,为了阶级,也为了民族。

……现在的阶级斗争,又何尝不是民族存亡的斗争。

鲁迅作为战士,自有韧性的斗争精神,他用手中的“金不换”笔作为投枪和匕首,去战斗,去奋进。而蔡元培毕竟是体制内的人,他不可能由体制内突围出来,只能以一己的良知和自觉,去做自己力所能及的努力。他的要求解禁《生活周刊》的呼吁和营救李少石、范文澜、瞿秋白等,便是最为明显不过的证明。

推崇鲁迅

1936年10月19日5时25分,鲁迅病逝于上海寓所。这天,宋庆龄特意来到中央研究院,告诉鲁迅去世的消息,并请蔡元培参加鲁迅治丧委员会。次日,蔡元培前往万国殡仪馆吊唁,并挽以一联:

著作最谨严,岂惟中国小说史;

遗言太沉痛,莫作空头文学家。

在万国公墓为鲁迅举行葬礼时,蔡元培亲为执紼,并致词说:“我们要使鲁迅先生的精神永远不死,必须担负起继续发扬他精神的责任来。”他还发表《记鲁迅先生轶事》,回忆起两人交往中几件影响深刻的事情,一是,鲁迅与周作人合译《域

外小说集》；二是，鲁迅进教育部后抄写“从图书馆借来的善本书”，后来便发表校订本《嵇康集》；三是，鲁迅“注意美术，但不喜音乐”；四是，鲁迅喜爱搜罗汉碑图案的拓本，“已获得数百种”。蔡元培最为称道的是鲁迅的人品风范。他说，鲁迅在教育部供职时，同事齐寿山“对他非常崇拜”。教育部免鲁迅职后，齐寿山也因之而辞职于教育部，蔡元培说：“这是先生人格的影响。”

蔡元培如此高度评价鲁迅，如此认真处理鲁迅的后事，却引来苏雪林的非议，她在一封致蔡元培的公开信中，批评蔡元培不该主持鲁迅的葬仪，不该成立鲁迅纪念委员会，说蔡元培对鲁迅“如此为之表彰，岂欲国人皆以鲁迅矛盾人格，及其卑劣行为作模范乎？以先生之明，宁忍为此，殆以有所蔽焉尔。”她还说：“今日有共产主义，则无三民主义。先生身为党国元老，设共产党夺取政权，先生安归？”她还警告说，蔡元培“今日为左派利用而表彰鲁迅……同情鲁迅，国人谁不惟先生马首是瞻，则青年心灵之毒化，反动势力之酝酿，有不可思议者。……此则愿先生之自重者也。”她带着深刻的偏见，怀着对“党国”的忠诚，对鲁迅大泼脏水，大放厥词，当然难以理解蔡元培和鲁迅之间纯洁的友谊。

蔡元培一生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而惟有这一次没有“兼容”苏雪林的观点，尽管苏雪林以公开信的方式向他责难，他还是采取了不屑一顾的轻蔑态度，根本没有理睬，依然投入纪念鲁迅的实际而具体的工作之中。

1937年3月，《鲁迅全集》已经编定，许寿裳便为其审查一事函致蔡元培。5月20日，蔡元培在给许寿裳的信中说：

……鲁迅先生遗著事，弟曾函商于中央宣传部邵力子部长，力子来谈，称：内政部已转来呈文，当催促部员提前检查，现尚未断言是否全部都无问题，万一有少数在不能不禁之列，止可于全集中剔除几部，俾不致累及全集云云。

邵力子不负蔡元培的托付，亲自审查，很快便通过审查，予以出版印刷。次年3月22日，许广平来信说《鲁迅全集》将由复社印刷发行，并希望先生为之作序。蔡元培很想写一篇好的序文，可是，又觉得对鲁迅还是缺乏了解，总是有着无从下笔的感觉。他是个认真、慎重的谦谦君子，决无贸然

从事的习惯，于是，又给他与鲁迅的共同朋友许寿裳去信说：

接马孝焱兄函，说关于《鲁迅全集》作序问题，先生有与弟商酌之处，敬希不及。弟曾得许广平夫人函，嘱作序，已允之，然尚未下笔，深愿先生以不可不说者及不可说者详示之，盖弟虽为佩服鲁迅先生之一人，然其著作读过甚少，即国际间著名之《阿Q正传》亦仅读过几节而已。深恐随笔叹美，反与其真相不符也。

他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浏览了鲁迅的主要作品后，才为《鲁迅全集》写出了序，他在序文中说：

鲁迅先生的创作，除《坟》、《呐喊》、《野草》数种外，均成于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六年中，其文除小说、书信一种外，均为杂文与短评，以十二年光阴成此许多作品，他的感想之丰富，观察之深刻，意境之隽永，字句之正确，他人所苦思力索而不易得当的，他就很自然的写出来，这是何等天才！何等学力！

他称赞道，鲁迅著作“方面较多，蹊径独辟，为后学开示无数法门，所以鄙人敢以新文学开山目之。”

1938年6月间《鲁迅全集》20卷本终于出版了。鲁迅纪念委员会为答谢他，让沈雁冰转赠一套《鲁迅全集》纪念本。可是，他早已按价付了一百元钱的订金，当许广平知道此事后，立即让鲁迅纪念委员会干事王纪元将钱退还，并说，赠送先生一套《全集》，为纪念委员会中所议决，望先生万勿推却。然而，他却坚持将钱交于纪念委员会，并复函说：“鄙人对于鲁迅先生身后，终不愿毫无物质之补助，请以此款改作贖敬。”

他和宋庆龄还以鲁迅纪念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的名义，发表《征订《鲁迅全集》精制纪念本启》，这则启事说：“鲁迅先生为一代文宗，毕生著述，承清季朴学之绪余，奠现代文坛之基石。”编印《鲁迅全集》的目的，“欲以唤醒国魂，砥砺士气。”许广平对蔡元培为鲁迅所做的一切极为感谢和崇敬，她撰文赞扬说：

至蔡先生文章道德，海内传颂，鲁迅先生一生深蒙提掖，此次更承为全集作序，知何宗尚，鲁迅先生有知，亦必含笑九泉，岂徒私人之感幸。

（责任编辑 杨继绳）

周扬与文化建设

——在周扬同志诞辰 100 周年纪念大会上的发言

● 周巍峙

今年是周扬诞辰 100 周年。他离开我们也已 19 年了。从上个世纪 30 年代起,在数十年的漫长岁月中,我从上海到延安,以及在张家口、石家庄等敌后解放区,直到新中国建立,都是在他的影响或直接领导下工作。作为同志、同事和战友,他是一位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的人,是一位令我思念不尽的好领导。

从延安时期到建国以后,在文艺界多次批判运动中,周扬虽然都不是或不都是发动者,但却是主要的前线指挥者和论战总结者,这既给他树立了权威,也给他带来了骂名。周扬晚年对此作了深刻的总结和认真的反思。今天我想着重谈谈他在长达半个世纪中对我国革命文化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等方面所做的贡献,他在这方面的智慧和功绩,我觉得,这才是最值得我们记住的。

周扬 1927 年入党,是文艺界老党员之一,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主义忠诚战士、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中国革命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之一和党在文艺战线的卓越领导人。他在上个世纪 30 年代“左联”时期,曾任左联党团书记、上海临时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书记。文委下面有左联、剧联、社联、教联、音乐组(我当时是“苏联之友社”音乐组的成员)等。那可真是个激情燃烧的年代,在瞿秋白、张闻天、鲁迅的领导和指引下,周扬和许许多多的同志为了革命,为了追求真理,为了发展爱国的进步的革命的文化艺术,发动群众进行斗争,死都不怕,更不用说吃苦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对中央苏区及各革命根据地发动军事“围剿”的同时,在全国各地加紧进行文化“围剿”,在上海捣毁进步电影公司和进步书局,搜捕共产党员,暗杀进步文化人。特别是在 1934 年 3 月至 1935 年 2 月,由于叛徒告密,上海许多党的

秘密机关被破坏,党中央机关迁往中央苏区,一些左翼文化团体遭到打击迫害,一些同志被捕。周扬他们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中,勇挑重担,重组领导班子,使左翼文化团体不断得到巩固、发展和壮大:剧联所属剧团和影评小组依然在进行活动;社联所属团体和新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生活书店照常运作,并有飞速发展,特别在电影、音乐等方面十分活跃,大量进步影片产生,救亡歌咏群众运动更是红红火火,以工人、学生、店员为主要成员的大量群众歌咏队、合唱队迅速成立,成为开展群众斗争的骨干。聂耳和冼星海等创作的救亡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救国军歌》等,已在全国传播开来。党的组织经过一段恢复和发展,由十数人达到 130 多人。

“一二·九”运动的爆发,鼓舞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斗争精神,在上海也掀起了抗日救亡运的高潮。左联一向被人们看做是“第二共产党”,被国民党抓住是要杀头的。面对这一新的革命局面,周扬等同志感到左联等左翼文化团体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已不太适应新的历史环境了,不利于团结更多的文化界人士了。在同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他从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上看到了党的“八一宣言”和共产国际关于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主张,在政治上、思想上受到很大的启发。根据革命形势的变化,周扬他们提出了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学主张。后来又从组织上得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指示,于是决定解散左联,并提出“国防文学”作为文学运动的中心口号,又相继提出“国防戏剧”、“国防电影”、“国防诗歌”、“国防音乐”(我当时写了《国防音乐必须大众化》的文章)等口号,在文艺界广泛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了众多文艺界人士,通过各种方式,宣传、



周扬(左一)与郭沫若(右一)、茅盾在1949年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中

教育、组织广大人民群众投身轰轰烈烈抗日救亡运动,为迎接全面抗战的到来,起了积极的作用。在民族矛盾急遽上升,党的斗争策略发生重大转变的历史转折关头,解散左联,提出和实践“国防文学”的主张,是左翼文坛适应新的形势的需要,自觉克服多年来存在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的一个重大进展和突破,业已打开的崭新的局面,充分证明了它的正确性。这就是问题的本质和主流。至于在左联解散过程具体工作中的某些不周之处,人们在阐述“国防文学”口号中的某些欠当之处,都是第二位的问题。

抗战开始,周扬到了延安。他根据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文化教育各项工作中进一步强调文艺界团结一致,全面为抗战服务的重大意义。他任鲁迅文学艺术学院院长,主持鲁艺的工作,致力于改革教学制度和措施,加强专业学习,树立学术民主风气,培养了人才,锻炼了队伍,为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做了有益的准备。在鲁艺,他主讲文艺理论、讲新文学运动史,用社会历史的批评方法进行研究,写下了《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发表了数篇关于鲁迅、郭沫若的重要文章。他主持编辑了《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为确立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基本原则在我国革命文艺运动中的指导地位,起了重要作用。

周扬深知,文艺工作的中心问题是创作问题,真正代表文学运动成就的还是作品,贯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关键是要拿出作品来,拿出大量的为群众所

喜闻乐见的新的风格、新的气派的作品来。他既抓群众性的秧歌剧,又抓大型文艺作品。由周扬等人组成的戏剧工作委员会,领导了平剧(即京剧)改革,创作出《逼上梁山》等剧目,受到毛泽东的称赞。同时,他也支持地方戏曲的改革,在反映现代生活的创作和改编历史剧方面都取得了成就,创作出秦腔《血泪仇》等优秀作品。周扬对话剧创作非常重视,他一看到西北战地服务团回到延安后演出的话剧《把眼光放远点》,就高兴地说:一出戏救活了延安话剧。他为该剧剧本作序,大力加以鼓励。1945年延安鲁艺师生们向

中共七大献礼,创作和演出的现代民族新歌剧《白毛女》,是周扬从这个充满浪漫色彩的故事中发现了不平凡的意义,决定把它搬上舞台的。从题材的选择,主题的开掘,到艺术表现形式的确定和完善,都同周扬直接有关。在《白毛女》的影响下,各个解放区歌剧创作有了很大发展。解放战争期间,他在晋察冀以及华北解放区工作。他在党内成立文委,团结本地区著名文艺人士参加工作,着重抓创作及研究当时群众文艺运动的发展。他写了《论赵树理的创作》,这是一篇最早对赵树理的创作做出全面系统评价的文章,文中他称赞赵树理开辟了一条新现实主义的真正大众化的道路,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实践上的一个胜利。还有一件事,就是在延安整风运动如火如荼的当儿,周扬建议并经上级批准,把艾青等少数作家从中央党校三部和鲁艺调出,住到了“创作之家”,因而这些作家在“抢救运动”中幸免于难,集中精力创作,有的写了优秀之作,后来被评为边区文教模范。为了推广解放区的优秀文艺作品,周扬首先选取小说、通讯报告作品中的一部分,编辑了两集《解放区短篇创作选》出版,随后又组织编辑“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包括戏剧、小说、通讯报告、诗歌,共计53种178部,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解放区文艺创作的成果,于1949年出齐。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举。周扬作为文化部主持工作的副部长、党组书记,又是中宣部主管文化工作的副部长,电影、戏曲、艺术团体和群众艺术活动,文艺书籍的出版,艺术院校、文物图书馆博

物馆建设等,都要管,既要发展新的文化艺术事业,又要有步骤有重点地改造旧有的文化机构,既要领导发展国家经营的文化艺术事业,又要积极引导并有重点地扶持艺术家合力经营的民间职业剧团及私人经营的文化行业;既要大力发展表现人民新生活的现代题材的文艺作品,又要加强对优秀文艺传统的学习、继承与革新,其任务十分繁重。周扬作为新中国文化艺术事业的主要领导人和创建人之一,为我国文化艺术事业的建设和发展铺基开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上世纪50年代,周扬主要抓了以下几件事:

一是戏曲。还在1948年周扬担任华北中央局宣传部长时,他就根据毛泽东关于整理传统剧目应区分政治上有益、有害、无害的原则,经过认真调查研究,领导我们起草了1948年11月23日华北解放区《人民日报》专论《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旧剧改革工作》,对建国后的戏曲改革乃至整个文艺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指针。新中国成立后,他在文化部一上任,就建立了戏曲改进局,周扬还担任文化部戏曲改进委员会主任委员,亲自主持研究戏曲改进局提出的修改与改编的剧本,并就戏曲改进工作计划、政策向文化部提出建议。1950年底,周扬主持召开全国戏曲工作会议,会上有人讲了戏曲的“百花齐放”,周扬很重视,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不久就形成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根据周扬在会上的总结报告和会上许多戏曲艺术家及戏曲工作干部向文化部的建议,在周扬的领导下起草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的指示》,经周恩来审定修改后于1955年5月5日签发,这便是有名的“五·五指示”。1952年举行的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是周扬在戏曲改革工作方面抓的又一件大事。他在会上的总结报告,强调发扬民族的优良传统,既反对保守观念,更反对当时在戏曲工作上存在的粗暴作风和创作上反历史主义的倾向,以其鲜明的针对性、内容的全面性、丰富性和深刻性,成为党在戏曲改革工作方面的纲领性文献。在戏曲剧目上,周扬一直奉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即传统戏和现代戏并举。1959年春,他又提出要创作新编历史剧,为最后形成现代戏、传统戏、新编历史戏三者并举的方针做出了贡献。

二是电影。开国之初就建立了东北、北京、上海三个国营电影制片厂,确立了在电影事业和电影创作中的主导地位,并支持了上海某些私营电影制片厂及其制片工作。周扬狠抓电影创作,花了很多时间看剧本,同作者讨论创作问题。1950年,国营厂有29部影片问世,私营厂生产了约50部,共同打造了新中国电影事业的一片新天地。批判电影《武训传》后,电影事业陷入低谷,周扬竭力倡导各厂之间、各摄制组之间进行自由竞赛,提倡题材要广泛多样,逐步把电影引上恢复发展之路。周扬反对电影创作中的片面浮夸、追求数量、忽视质量,提出“内容好、风格好、声光好”的要求,为创造富有民族艺术形式和艺术风格的国庆十周年献礼影片提供了精神指向。在周扬、夏衍等同志的领导下,1959年优秀电影的丰收,在新中国电影发展史上被公认为一座艺术高峰。周恩来总理曾称赞说:“在文艺工作方面,戏剧、电影可以说是开得最茂盛的两朵花,这是两朵兄妹之花。”

三是提倡新艺术团体正规化,建立剧场艺术,提出国营剧场、电影院等文化事业企业化管理和艺术教育全面规划建设等问题。文化部成立不久,周扬就根据刘少奇的指示精神抓了全国文工团的调整。当时全国地方和部队的各级文工团约有200多个,先后调整为话剧院(团)、歌剧院(团)、歌舞团,有的歌舞团后来发展为歌舞剧院。在艺术教育方面,文化部直接领导下的培养艺术干部的高等学校和机构也陆续建立起来,有中央戏剧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央美术学院和中央文学研究所等。各大区也相应建立起了一批艺术院校。为提高解放区文艺干部的水平,在各高等院校建立了干部培训班。还创办了《文艺报》、《人民文学》,建立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建立了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以及全国各地的文化馆、站。新中国文化事业的布局是在那时形成并逐步完善起来的。

此时,百忙中的周扬还不时关注着出现在戏剧舞台上的优秀之作。他主持了话剧《红旗歌》座谈会,著文《论〈红旗歌〉》,力排众议,对其在创作上的得失进行了入情入理的分析。他还写了《从〈龙须沟〉学习什么?》,提倡学习老舍的真正的政治热情和真正的现实主义的写作态度。他还在石家庄工人创作演出的话剧《不是蝉》座谈会上发



1979年,周扬在中组部万寿路招待所

言,充分肯定工人话剧创作的重要意义。

在上世纪60年代,周扬主要抓了以下两件事:

一是主持起草《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即《文艺十条》,后改为《文艺八条》。这是上世纪60年代初党的文艺政策的一次重大调整。周扬说,《文艺十条》中讲的十个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问题,即保证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问题。他针对当时一直没有解决好的文艺同政治的关系问题,反复强调对文艺如何为政治服务,不要作狭隘的、简单的理解,只是强调直接配合某一中心工作,图解某一个具体政策,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范围应该是很广泛的。他反复强调要着重艺术规律和艺术特点,反对创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和一般化,他主张文艺要“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认为这应当成为文艺队伍的“共同路线”。他说,为人民服务,就是“为他们的利益和需要服务,反映他们的利益,满足他们的需求”。“文艺怎样才能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呢?这要通过文艺自己的规律和特点。”他主持起草的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人民日报》社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以及在这之前的《文艺报》的“题材问题”专论,都传达了同样的信息。这个时期,与《文艺八条》相配套,经周扬审改,还制定了《关于加强电影艺术片创作和生产领导的意见》,即《电影工作三十二条》,及《剧院(团)工作条例》。

所有这些文件,对于总结建国以来文艺工作的经验,克服“左”的错误,促进文艺的发展和繁荣,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二是主持编选高校文科教材。这是中央交给周扬的另一重要任务。他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1964年4月主持召开了高等学校文科和艺术院校教材编选计划会议,修订了教学方案,商定了文科224门课程、297种教材编选计划。周扬就文科建设和教材编选提出了系统的指导思想,如:教学、生产劳动和科学研究相结合,而以教学为主,强调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统一,论与史、观点与材料的统一,古与今的统一,中与外的

统一,“多”与“一”的统一,即学术艺术的多样性与社会主义方向的一致性的统一,集体写作与个人写作、新专家与老专家结合等等。他为文科教材编选注入了极大的心血。在教材编选计划会议之后的两三年中,他差不多每月都要召开几次座谈会,同各门教材编写组的同志商讨教材编选问题。他认真听取专家学者的意见,坦诚抒发个人的见解,从编写的指导思想、基本观点、篇章结构、具体内容,到表述方法,都提出自己的看法和主张,供编写组同志参考。他的那些讲话,才情勃发,学识渊博。周扬主持文科教材编选,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一个成功的范例。周扬主持高校文科教材编选,不仅解决了当时高校文科教学之急需,也推动了理论队伍的建设。他充分发挥老专家学者的作用,总结他们多年来积累的知识,体现当时我国学术研究的最高水平,作为文化积累的一个阶段性成果,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这期间周扬多次强调文化、思想、学术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需要积累,没有积累,永远不能提高。他多次强调,对文化学术研究部门来说,工作成绩的有无,成绩的大小,不是看你批判了几个人、几本书,而是看你培养出多少优秀人才,出了多少优秀成果。他说:“将来检查你这个单位有什么成绩,就要检查你培养出多少人,有多少著作,有几个演员,演了多少戏。”一个出版社办得好

不好,要看你这个出版社积累了多少好书,培养了多少出色的编辑;出版社没有出版好书,书印得再多不算是你的成绩。学校没有好教员、好教材,也不算你的成绩。周扬提出的这个检验文化建设成绩的标准,不仅在当时有着很强的针对性,起了很好的作用,就是在今天也没有过时。

这里,我还要讲讲周扬作为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领导小组组长所做的贡献。我作为《东方红》创作、演出的策划者和总指挥之一清楚地记得,创作人员的抽调,参加演出单位的确定,都是周扬同我们一起商定的。《关于国庆期间演出大型歌舞〈东方红〉请示报告》,创作提纲歌词和朗诵词,也都是经他审定和修改后上报周恩来总理的;他审看了部分排练和彩排,提出意见,消除了领导小组某些成员对这种艺术形式的怀疑,坚定了大家的信心。周扬以他卓越的组织才华,丰富的学识,对政治和艺术的纯熟的驾驭能力,出色地协助周恩来完成了这一任务,同广大文艺工作者一起为后人留下了一部珍品。

经过文化大革命,历史进入了新时期,周扬进入了新境界。周扬站在思想解放运动的前列,拥护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勇于探索,勇于创造,构成了他在新时期的主导思想和行动总则。他积极支持并参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并把这场讨论提高到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高度来认识。《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是他对中国现代思想发展史进行理性思考的代表

作。他在《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等一系列的文章和讲话中,对以往的历史经验进行了总结。他对自己在过去历次政治运动中的错误公开进行自我批评,对建国以来因与他工作有关遭受不公正对待蒙受冤屈的同志,诚恳地不只一次地表示道歉。他的宽阔坦荡的胸怀,光明磊落的气度,认真对待自己错误的科学态度,赢得了人们的普遍尊敬。他作为中宣部副部长,大力倡导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热忱爱护人才,提倡宽容精神,为调动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力,繁荣学术和艺术而殚精竭虑。他对新人新作,一向以极大的热情予以支持、鼓励和表彰。他深刻反思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路线,反思文化大革命以前“左”的错误,从理论的高度进行研究。直到他生命的最后岁月,他仍在探索,为发展和繁荣学术艺术而操劳。他强调,理论要回答和解决现实中提出的新问题;文艺也是服务行业,科学和文艺要结合,要有“真正艺术家的勇气”。他终生都在为文化艺术的发展和繁荣而不倦地耕耘。

总之,周扬在我的心目中是一位难得的、难忘的文化的建设者。一提起他,我就有许多讲不完的话。“文学艺术,质量第一。重在建设,贵在积累。切忌浮躁,更忌浮夸。种豆得豆,种瓜得瓜。”在纪念周扬诞辰100周年的时候,我想用我在2001年初迎接新世纪时写的这几句话结束我的发言。

2008年11月12日
(责任编辑 杨继刚)

喜讯: 3000元出版个人文集!

出版说明:

自古以来,中国读书人都有出版个人或家族文集的习惯,但现在出版社内容审查严格且价格昂贵,谁能帮助作者低价快速出书呢?北京时代弄潮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专门提供个人少量出书服务,三年来已为四百余位作者编辑出版了精美的个人文集与书刊画册,深受国内外著作者的喜爱和好评。

出书范围:

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回忆录自传等纪实作品、书法绘画等艺术作品、思想学术论著、旧书翻印等。

服务流程:

作者提出出书意向→公司计算成本价格→上门签约支付定金→协助整理完善稿件→电脑录入编排校对→作者初审→专业编辑审改→作者二审→设计封面插页制作样书→作者终审付款→印刷出版送书。

联系电话: 010-68920114

传真: 010-689201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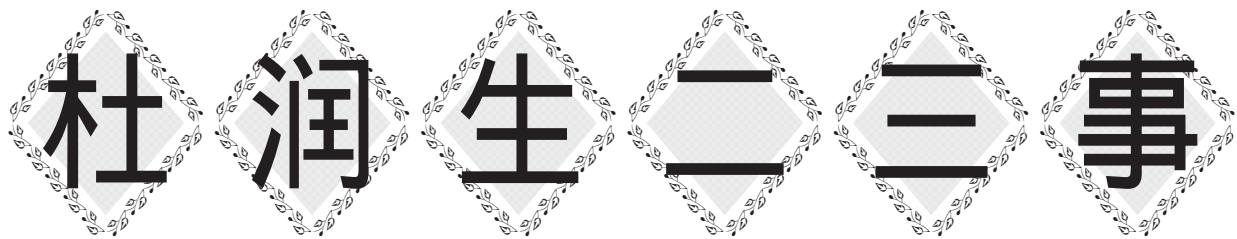
邮箱: grcsw@163.com

涂编辑: 13693651386 李编辑: 13522392838 周编辑: 13391721481 冯编辑: 13718619470

个人出书
精神长存



详情请登陆《个人出书网》(www.grcsw.com)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厂洼路5号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院内 邮编:100089



● 张木生

2008年7月18日,杜老95岁华诞。惊回首,相知、相识、相随杜老已28年。杜老仍思维敏捷,但已行动迟缓,口齿吐字不甚清楚。马阿姨已不认人,只认杜老,这相濡以沫的老伴。一丝惆怅,才下眉头又上心头……

我第一次与杜老有直接交流是1980年夏天,我和王小强参加杜老在万寿路宾馆主持的一个座谈会,在座的多是各省农口的领导,主题是基层干部问题。当时包产到户初露端倪,乍暖还寒。基层干部矛盾突出,发言者对基层干部颇多微词。杜老突然点将,“让在农村插过队的年青人说说。”小强和我只表述了一个观点:基层干部,是我们党在农村的惟一组织资源,体制正确时,干好事的是他们,体制错误时,干坏事的也可能是他们。除了他们,我们在农村不可能找到另外的替代力量。杜老投来赞许的眼光,鼓励我们继续讲。我补充:“就像大闹天宫和西天取经是同一个孙悟空一样。”杜老嘿嘿地笑起来:“噢?你们年青人也这样认识?”显然是表彰。杜老拉着我们两个年青人与他同桌进餐。霍泛伯伯边吃边敲边鼓:“老杜啊,你不总想找一些有理论有实践的年青人共同搞调研吗?”杜老笑而不答,他要观察我们,考量我们。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观察这位智慧老人,也是我第一次听到他说:“农民穷,中国穷,农民古代化,中国不可能现代化,谁要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忘记农民,谁就是数典忘祖!”一块巨大的磁石,只一次就吸引了我。

随着我们这群年青人下乡调查的次数日多,与这位智慧老人的交往日增。当时包产到户方兴未艾,支持者与反对者的争论也白热化,两军对垒,非此即彼,黑白分明。文革虽已结束多年,但多数人仍是作惯性思维,路线斗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没有调和的余地。

八亿人,不斗行吗!杜老反之,十亿人,不斗

就行。

杜老主张“道并行而不悖”,见仁见智,互擅胜筹,汇合各方主张,相互容纳,各家见解虽有不同,但经过论辩,即为集思广义,必能激荡出完美的政策方向。可谓“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对集体经营、包产到组、包干到户,杜老提出了著名的“可以……可以……也可以”的公式。争论的双方也就此尽释前嫌,“相逢一笑泯恩仇”。从此包产到户一发不可收,如燎原之势,而观点不同的人们,恐怕是第一次“道不同可相与谋”,没有上纲上线,不受路线斗争之困。我亲耳听万里同志说过,为什么同样的道理,从我们口里说出,和从杜润生同志嘴里说出就不一样,话让他一讲,不同意见的双方都能接受。这之后,实践中,粮食产量说服了方向。

杜老善用辩证法,而且如臂使指,将复杂的事物抽丝剥茧,提炼为哲人的理性。我随杜老到西安研究包产到户后,个体工商户如影随形成长起来,出现私营企业雇工经营。姓社姓资的争论立刻出现。杜老不温不火,他提出改革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要多用归纳法,少用演绎法,到实践中去找答案,标准是被雇的农工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结果是短短几年,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多种经营遍地开花,农业生产力高歌猛进。1980年—1986年,那是农村变革的黄金时代!

杜老就是这样,在波澜不惊,有条不紊之中,推进历史的巨轮发生了石破天惊的变化,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静悄悄地走下神坛,却未发生任何震动,这是何等的大手笔!

有一次,随杜老到中海汇报粮食问题。记得高小蒙还拿出数字模型证明,中央手中只要保持1280亿斤粮食,用保护价收购,剩下的所有粮食可完全放开,取消粮票,市场化经营。这就是“稳一块,活一块”的渐进改革模式。这时,一位中



杜润生

央领导说,你们年青人还这样保守,中央留一千万斤足够了,剩下的全放开。话音刚落,一位年青人很冲动:“你们中央想什么呢?我们提的数据是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与反复测算出来的,不是拍脑袋!”这位中央领导马上向冲动的年青人走过来,拍着他的肩膀,和颜悦色地说:“你们慢慢说,我仔仔细细听,好吧。”

走出中南海,我以为杜老会批评我们张狂。没想到,他老人家嘿嘿嘿的乐,并说:“我就是要让你们这些小家伙为我们这些老家伙投石问路。”

进入2007年,杜老还是那么睿智。他在《炎黄春秋》上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针对民主社会主义的争论,一篇是由姚监复代笔,他老人家口述有关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历史还原。看了这两篇文章,我忍俊不禁,可谓人老成精,姜还是老的辣。有人说杜支持谢韬的观点,我看未必。引原文:题目是《理论思维活跃是民主振兴的喜庆气象》,好听又中肯。“一个党,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己的理论思维,一定会衰败下去。”切中时弊。中国什么样的产能都过剩,最大的危机,最稀缺的是信仰危机和理论再造。“有争论是好事,不同的观点,就是不同方向上的探索。即使错了也不要紧,思想上的试错,可以代替行动上的试错。”大智慧而不失分寸。文路一转:“谢韬文中有一个地方说‘只有民主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

个提法,口气硬了,不一定妥当。现在中国并没有出现民族危机。”看似轻轻提起,却一语中的。“什么是中国特色?首先是不要苏联特色,不要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这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的。那么,要不要瑞典特色?瑞典是八百多万人口的小国,我们是十三亿人口的大国,大国怎么搞?恐怕也不可能全盘接受瑞典模式。”结论已不言自明,杜老的大智慧,逢右必左,逢左必右,左派右派见杜老都皆大欢喜,但他又从不失原则,极高明而道中庸。(《炎黄春秋》2007年第6期)

杜老另一篇毫耄之作,我手头的《炎黄春秋》未找到该期,但记忆深刻。杜老还原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历史的本来面貌,指出,无论是理论的彻底性,还是实践的完整性,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望其项背,无出其右者;今天仍是我们无法超越的指导思想和政治、经济、社会改革的初始点。事后在网上看到此文,将小标题摘抄如下:一、新民主主义革命为实现社会和谐提供了根本前提;二、建国以来失误的根源是脱离了中国国情,错误地抛弃了新民主主义论,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三、解放思想,永不僵化,不被过去的错误乌托邦式的声明所约束,坚定地走新民主主义道路。

如今,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取得政权,其领袖普拉昌达总理宣布,要在尼泊尔全面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由共产党领导在尼泊尔发展资本主义作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措施。这不能不说是这一理论的发明者的反讽。

两篇短文,举重若轻,精心构筑,恢宏布局,深谋远虑,必胜战略,百折不挠,念念不忘,虽垂垂老矣,耳聩眼花,其人格魅力就在如何把中国的事办好。

这十年,我和爱人王祺元经济条件好转,我们俩有更多的能力呵护两位最敬重的师长,一位是王耕今,去年96岁驾鹤西去;一位就是杜老,在他远离权力中心之后,我们与他和马阿姨越走越近。但无论你与他走多远,你永远无法改变他看问题的原则和角度,即使众口一词,杜老总有杜老自己的说法,他一贯保持的是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我特想影响杜老的思路,但从没有成功过。而对人,他总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包括整过他的人。有时,我对杜老讲某人的问题,只

要口出恶评,答案总是这人有长处若干,那人肩膀很硬。杜老批评人,你若没点悟性,还以为是表扬你呢。

“中国仍要过好两关,市场关与民主关。”杜老老而弥坚而矢志不渝。殚思极虑而知白守黑。拨云见天而明察秋毫之末:“用市场机制激励人,用民主政治团结人。”两者缺一,改革便是焚琴煮鹤。现在的改革开放就是跛足的改革开放。

最后,讲一件小事。十几年前,我随杜老到大连,调研之后,当地政府安排杜老参观一座新开张的购物中心。陪同人员向杜老推荐了许多高档商品,杜老一一婉拒,最后只给孙女选了一件小毛衣和一只铅笔盒。当我去结账时,磨破嘴唇人家就是不收钱。杜老看在眼里,当时没给任何人难堪。那时杜老的鼻炎很重,不断地需要纸巾,鼻子都擦红了,我将宾馆的湿方巾用塑料袋准备了一堆,随时提供给杜老使用。回到宾馆陪同人员渐次散去,杜老将我留下:“两件事你办得不够好,购物款马上送去,毛巾是宾馆的,带离宾馆就不妥。”儒雅清瘦,仙风似闲云野鹤,浑身上下没有一点烟火气味,说话绵软,未语先笑的杜老还

会批评人?他把我批乐了。

如小强所说,一眨眼过去30年,张木生退休(今年4月就该退,命令迟迟未下)!“白丁”变苍头,转眼来到他们对我们充满期待的年纪。杜老谆谆教导我们,每年要为人民做一二件能上账的事,检讨自己,我很愧疚。

洞微烛隐,虽马齿渐老,仍直言无忌。现在的什锦八宝粥之类的时贤,“因为是达官贵人,权豪势要,士流耆宿,富商名家,同样为观瞻所系,需要装点些勤政爱民,为富近仁,学高德厚,儒雅风流,所以在公众场合常常也要说这些事先设计好的话,做些事先安排好的事,举手投足有如做戏。这种事古已有之,所以戏台对聊有‘大千世界无非傀儡之场,第一功名亦等俳优之戏’,点明了戏场小天地,天地大戏场这番道理。”(陈四益《作秀的难处》,《读书》2008年第9期)

难怪,毛泽东要“粪土当年万户侯”。

杜老总说他自己只是一个“符号”,我常想这个“符号”是什么?参来悟去,乃真共产党之谓也,真假不可不察之谓也。

(责任编辑 吴 思)

(上接81页)经常来中国做生意。他的爱人泰乌塔与前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卡博(劳动党时期的领导人之一,党内第三把手)的女儿一起开了一家工艺品商店,经营民族服装及进口工艺品。业余时间,她还翻译外国文学作品,迄今已出版了4本译著。他们准备开一家政治书店,或者办一家报社,继续出售霍查著作。

二儿子索格尔一家4口一直住在老丈人家。现在,岳父、岳母均已作古。他与另一名工程师阿尔杜里合开了一家电脑公司,从事电脑出售和修理。索格尔的妻子丽里亚娜似乎不大安生,甚至成为霍查家族里的“反叛者”。2005—2008年,记者出身的她,不时地在媒体上专门抖搂霍查的“家庭丑闻”,说什么霍查是由于阿利雅和保健医生们串通一气,被慢性毒药毒死的,甚至离奇地编造谣言,说1973年中国政府派医生给霍查看病,其结果是“破坏了霍查的身体”,并胡说什么“当时阿国医生都是这么认为,只是没有公开宣布,因为霍查本人不想让中国政府卷入西方破坏霍查身体的计划”,说卡博(党内第三把手)、谢胡

和哈兹比乌以及霍查之死都与阿利雅有关,他们之死为阿利雅当权开辟了道路;说霍查夫人太不光明磊落,有政治野心,想当主管意识形态的党中央书记;说阿利雅对霍查两面三刀,一面表忠心,一面又背叛;说阿利雅是“国家的叛徒”,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是他挑拨离间,把霍查一家搞得四分五裂;甚至说阿利雅不是阿尔巴尼亚人,而是波斯尼亚人。在妻子的坚持下,索格尔还与母亲争霍查遗产,要对霍查遗产进行公证,他竟然还问母亲“外国元首赠予霍查的象牙拐杖哪里去了”,并要求母亲与阿利雅“划清界限”、“拉开距离”,等等。他们已与霍查夫人和哥哥一家反目为仇。公众舆论则把玛丽亚娜看做是“政治疯子”和抖搂霍查家丑的“笑料”。

女婿克莱曼蒂获释后,与妻子普兰维拉从事起私营建筑设计,后来开办了有十几名员工的建筑设计所,经济收益颇丰。他们早就买了新居,一家四口,日子过得挺红火。

(作者为新华社原驻阿尔巴尼亚首席记者)

(责任编辑 杨继绳)

蒋百里：是真名士自风流

● 王贵胜

70年前,56岁的蒋百里在广西宜山去世。他一生有许多传奇,23岁以日本士官学校第一名毕业,天皇赐刀,震动中日朝野,从此学校将中日学生分开授课,预防中国学生再夺第一;30岁他被委任保定军官学校校长,因抗议陆军总长段祺瑞的百般刁难而拔枪自杀,伤愈后与护理他的日本女子佐藤结婚;“西安事变”时他成为张学良的阶下囚,却以谋士风范为张学良出谋划策,促成“西安事变”顺利解决;他有个女婿叫钱学森,美国人称钱“一个人可抵五个师”;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新月社”的成员,写过一部《欧洲文艺复兴史》,由梁启超先生作序,今天仍是美术学院的教材;1923年他就预言中日之战是“持久战”,1938年完成了著作《日本人》,最后一句话是“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同它讲和”。黄炎培先生在挽联中写道:“天生兵学家,亦是天生文学家,嗟君历尽尘海风波,其才略至战时始显;一个中国人,来写一篇日本人,留此最后结晶文字,有光芒使敌胆为寒。”



蒋百里(1882—1938)

决心弃文习武,东渡日本,进入东京士官学校学习。他与同是浙江人的同学蒋伯器,才华出众,成绩突出,被章太炎誉之为“浙之两蒋,倾国倾城”。在此期间,他与士官学校的同学蔡锷成为莫逆之交。蔡锷讲:“要革命,笔杆不如枪杆。”这句话,促使蒋百里终生献身国防。他们两人与另一位同学张孝淮,被誉为士官学校的“中国三杰”。1905年,蒋百里以步兵科第一名毕业。按照日本的规矩,士官榜首由天皇赐刀,日本人引为殊荣,却不料为中国人所得,日本学生视为奇耻大辱。从第四期开始,士官学校的中日学生分开授课,预防中国

学生再夺冠军。

1906年,蒋百里回国。浙江抚台张曾扬久闻他的大名,想委派他做第二标统,他却举荐了同学蒋伯器。蒋伯器凭借这个职位,后来做了中华民国第二任浙江都督。蒋百里在老师的举荐下,进入东北总督赵尔巽的幕府,任督练公所总参议(相当于今天的参谋长),可谓少年得意、飞黄腾达。他向赵尔巽表示:“我在日本学的是初级军事,中国国防应取法乎上,研究世界军事。世界陆军以德国为最强,我希望能有到德国实习的机会。”赵尔巽非常赞同他的想法。蒋百里来到德国,在第七军任实习连长,统帅就是举世闻名的兴登堡元帅。当时,德国军官看不起这位文弱斯文的中国军官,但一个德国教官说:“你们不要嘲笑他,看他的步伐,就知道他骑术的高明。”的确,蒋百里在东京士官学校就是有名的骑手,从来不用缰绳、马鞭和马鞍。有一天,兴登堡元帅召见蒋

一、日本士官学校的高材生

1882年,蒋百里出生在人文荟萃的浙江海宁。1900年,他进入杭州求是书院(浙江大学的前身)学习,两次考试都名列冠军。杭州还有一所东城书院,他课余参加应考,五次考试还是全列第一。从此,他名声大震。1901年,他从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和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惨痛教训中省悟,

百里,拍着他的肩膀说:“从前拿破仑说过,若干年后东方必出一位伟大的将才,这或许就应在你的身上吧!”此话传出,蒋百里在国内更加名声大震。他的德语老师阿司特夫人30年后对蒋百里的女儿讲:“你的父亲年轻时在柏林参加跳舞竞赛,以华尔兹舞夺得第一名,德国名媛都很注意这个年轻漂亮的中国军官。秋深了,树林旁的人行道上,徐徐的松风下,有人席地而坐,朗诵歌德的诗,依稀如神仙中人,这就是你当年的父亲。”

二、东北督练公所的总参议

1910年,蒋百里回国。当时的禁卫军训练大臣良弼邀请蒋百里担任禁卫军的标统。蒋百里讲:“我在日本当过排长,在德国升任连长,今后宜为管带。我做事情的目的还是在求学,要一级一级地历练上去。”蒋百里虽然任管带,但良弼大事小事都向他咨询,实际履行参谋长的职责。1911年,蒋百里的老上司赵尔巽奏调他复任东北督练公所的总参议,相当于今天由中校一下子跃升为中将,“直升飞机”坐得太快,“上谕”只好以“二品顶戴”任用。当蒋百里辞去管带的时候,因为平时深得人心,所辖官兵包围着他放行。最后还是良弼替他解了围,用梯子从后楼把他接了下来,当天离开北京。

蒋百里到东北的第一课,就是建立东北第一线国防,这是他平生最快意的工作,也是他最拿手的工作。蒋百里认为,练新军必须除旧军,招抚改编的绿林队伍应在淘汰之列。当时招抚队伍中任巡防营统领的张作霖,视蒋百里为眼中钉。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之后,清廷将东北三省大部分新军调往关内,赵尔巽只能对旧军采取绥靖政策,蒋百里遂无用武之地。张作霖对蒋百里久有必除之而后快的野心,有一天赵尔巽密告蒋百里:“现在应该是你走的时候了,迟了我无能为力。”蒋百里毅然登车南行,张作霖亲自带卫士追上车。蒋百里只好躲进厕所,把门反锁,躲过了张作霖的追杀。

三、保定军官学校的校长

1912年,蒋百里被袁世凯委任为保定军官

学校校长。他在就职演说中向学生表示:“如不称职,当自杀以谢天下!”他多次强调:“办第一流的军校,就该不惜任何代价,将来才有莫大的收获。”但他很快被官场上的复杂人事关系搞得焦头烂额,显得无能为力。因为任用他的主意出自袁世凯,他的顶头上司、陆军总长段祺瑞没有把他视为心腹,事事加以刁难。当时学校的学杂费由公家供给,但蒋百里请求拨款的电报,却被陆军总部搁置起来。他亲自到北京交涉,却得不到任何结果。他带着一肚子怨气回到保定,致电辞职,袁世凯不接受,再向部里催款,结果还是不理睬。1913年6月18日清晨,他面对全校两千多名师生沉痛地讲:“我到本校后曾经教训过你们,我要你们做的事,你们必须办到,你们要我做的事,我同样也要办到。你们办不到,我要责罚你们,我办不到,我要责罚我自己。现在你们一切都好,没有对不起我的事,我自己不能尽责任,是我对不起你们!”说完,他拔出手枪对着胸口开了一枪。

蒋百里的自杀壮举,很快震动了朝野。袁世凯委托日本公使迅速派一名最得力的医生到保定施行手术,并派一名最好的助手同往。蒋百里在东京士官学校毕业考试夺得第一,日本人非常看重他,公使当即派军医平户和助手佐藤来到保定,挽救了蒋百里的生命。美丽的北海道女子佐藤为蒋百里把脉、量体温、喂饮食,尽了最大的努力。蒋百里的伤情稳定后,她用温和的语调对他讲:“忍是大勇者所为,自杀非勇者的行为,而是逃避人生责任。你如果不能忍,将来如何能够成大功、胜大任?有热血、有能力的男儿如果轻言牺牲,国事由何人承担,如何对得起国家和培植你的老前辈?”蒋百里对她讲:“我依你的话不再轻生了,但以后遇到生死难关,没有像你这样的人在我的身边,谁来提醒我、鼓励我的勇气呢?”蒋百里伤愈后,感到自己的心被一支爱的神箭射中了,佐藤小姐从他的目光中发现异样的东西在闪动。在此后一年间,蒋百里给佐藤小姐写了很多信,有一封信向她正式求婚,却遭到委婉的拒绝。蒋百里回信讲:“我因你而生,你现在又想置我于死地!”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一年后,佐藤小姐成为他的妻子。因为他平生最喜爱梅花,为她改名“左梅”。他们先后生育五个女儿,其中第三个女

儿蒋英嫁给著名科学家钱学森。

四、陆军总部军事处的一等参议

蒋百里伤愈后,袁世凯委任他为陆军总部军事处一等参议。段祺瑞时任陆军总长兼任军事处处长,蒋百里如果来办公,还会受到刁难。袁世凯转告蒋百里:“不必到公府来办公,月薪三百元按期支付。”蒋百里对袁世凯的知遇之恩当然有所感戴,但对他的倒行逆施行为却义愤填膺。当时,袁世凯用调虎离山计,把蔡锷从云南调到北京。蒋百里与这位同窗好友经常碰头,密谈军国大事。蔡锷秘密离开北京来到天津后,袁世凯派蒋百里赴天津劝他回来。蒋百里将计就计,来到天津后与蔡锷谈了一整夜讨袁计划。回京后,他向袁世凯报告:“松坡(蔡锷的字)未知去向,在津未曾找到。”蔡锷在云南举起反袁的大旗,全国各地一呼百应。不久,袁世凯取消了帝制,很快被气死了。蔡锷因身患重病,东渡日本治疗,不料以35岁的盛年死于异国。蒋百里亲赴日本,料理蔡锷的后事。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蒋百里任总统府顾问。1917年后,他在政治上的出路越来越窄,在学问上的成就却越来越大。梁启超所办的《庸言报》和主编的《大中华》杂志,凡是有关军事的论文都由蒋百里执笔,他的军事学者大名更加显赫。1918年12月,蒋百里与梁启超等组成赴欧洲考察团,1919年1月2日到达伦敦。蒋百里的研究精神和好奇心理,与梁启超非常吻合。梁启超对欧洲文艺复兴史深感兴趣,自己出题目请法国名流演讲,蒋百里记录下来,便是后来出版的《欧洲文艺复兴史》。他请梁启超为本书作序,老先生动起笔来像长江大河不能自制,序文比原书的篇幅还长,只好改成《清代学术概论》一书,请蒋百里为之作序。考察期间,蒋百里从巴黎出发,考察了法国、比利时、德国、瑞士的国防建设状况,写成《裁军计划》、《精兵主义》两篇文章,发表在国内杂志上。蒋百里在欧洲游历考察10个月,返国时又添了一个女儿,这就是蒋英。

五四运动后,蒋百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位斗士。当时梁启超成立了推进新文化的三个机构:(一)读书俱乐部;(二)共学社,主要出版政治、

经济、军事、文艺丛书;(三)讲学社,每年请一位驰名世界的学者来华开一次讲演会。前两个机构都由蒋百里主持,后一个机构的总干事也是蒋百里。同时,蒋百里主编《改造》杂志,他的文章散见全国各大报刊。他还参加了浙江同乡徐志摩发起的“新月社”,与这位多情诗人成为道义之交。这一阶段,是他一生中最宁静的时期。

五、唐生智将军的幕僚

1926年,北伐战争打破了蒋百里宁静的生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讲:“百里先生如果参加革命,则革命的进展必然更快。他是老成持重的稳健派,如果插足革命阵线,必然使国民更加认识革命的重要性,而不存踌躇不前的心理。”那时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由第四军军长李济深兼任,他不能兼顾,改由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暂代。国民党要人都想借重蒋百里担任总参谋长,因为北伐军出湖南,湖南军官的90%都是他的学生。而此时,东南“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也想请蒋百里做总参谋长。他不觉好笑起来:“绕来绕去都是参谋长的呼声,好像我生下来就是参谋长的材料。”他主张全国尽快统一,自然不肯做割据军阀孙传芳的总参谋长。北伐军第八军军长唐生智是蒋百里在保定军官学校的学生,他的队伍英勇善战,在湘鄂大地所向无敌,被升任前敌总指挥,很快攻占汉口。当时,唐生智的声势如日中天,他手下的几个军长都已晋升为总指挥,这批人都是他的保定军官学校第一期的同学,他们当年的校长更是被高看一眼。北伐军攻占南京,蒋百里被蒋介石派专车接入总部洽谈时,针对国内外形势提出建议:“对日本宜采取缓兵之计,不让它袒护中国的残余军阀,等到中国统一完成后,再和它清算也不迟。”蒋百里亲赴日本与田中首相会谈,获得相当的佳果。

北伐战争胜利后,唐生智在武汉的势力太突出,桂系组织“西征军”讨伐,他兵败后通电下野。唐生智的大起大落,对蒋百里的命运产生了重大影响。1929年4月,唐生智被重新起用,担任第五路总指挥,总部设在北京顺承王府旧址,便迎接蒋百里及夫人北上。1929年12月4日,唐生智忽然领衔于许多将领,通电劝蒋介石下野,他

的军队很快被击败。蒋介石派人在蒋百里的住宅中搜出与唐生智通电的无线电机,在残留的电稿中发现蒋百里亲笔所写的“东不如西”的句子。蒋百里曾认为:“内战打了十几年,打来打去打不出个所以然来。凡是中原逐鹿的武人,往往爬得高跌得重,只有东北的张作霖、山西的阎锡山能够偏安一隅。唐生智若要做得不倒翁,就得到远远的地方去,莫存问鼎中原之志。新疆是政治真空地带,留待一个有眼光、有作为的



1919年蒋百里参加欧洲考察团观光巴黎和会时摄(前排左二为蒋百里,左三为梁启超)

人去填补。”于是,蒋百里的眼光移向这片地广人稀的政治处女地,想指导他所器重的这位学生去做立功西域的民族英雄,这就是电文中“东不如西”的内涵及由来。但蒋百里对这一切都不作解释,1930年元旦后被捕入狱。两天后,他被提解到南京三元巷军法处待审。如果军法处开庭会审,他的罪名就成立,判决的结果必然是死刑。他的东京士官学校的同学陈仪时任军政部次长,只好采取拖的办法,使军法处会审无法举行。而蒋百里在狱中照常读书、练书法、打太极拳,一副泰然自若、视死如归的样子。著名诗人徐志摩亲自到狱中探望,带着被包要与他一起坐牢。此时,蒋百里在保定军官学校的学生陈铭枢已是国民党中央常委,兼代行政院长,并被推举为京沪卫戍司令长官,他与国民党元老吴稚晖一起为蒋百里说情,蒋百里终于出狱。为表示谢意,蒋百里写了长幅心经,赠给学佛的陈铭枢将军。

六、研究军事问题的专家

蒋百里出狱后,取“澹泊明志、宁静致远”之意,自号“澹宁”。他虽是在野之身,却胸装着一颗“以天下为己任”的心。1932年1月28日,陈铭枢将军从前所领导的十九路军,打响了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第一枪。十九路军参谋长张襄、淞沪警

备司令部参谋长林建铭都是保定军官学校的学生,不时前来向老校长讨教。据著名记者曹聚仁回忆,“一·二八”事变的第三天,蒋百里拿着一张上海出版的《每日新闻》说:“七日早晨,日军要有一个师团到达上海。”接着,他指着一条东京同盟社的电讯说:“日本陆相昨日晋谒天皇,就是报告出兵的意思。依日本的运输能力和长崎到上海的距离,估计七日早晨可以运到一个师团。”果然,2月7日,日本第九师团运抵上海参战。曹聚仁感叹:蒋百里不愧是第一流的军事家。这一时期,蒋百里最关注的是国防。母亲去世奔丧,他路过徐州,若有所思地对学生龚浩北讲:“将来对日作战,津浦、平汉两线必然被敌军占领,现代国防应以洛阳、襄阳、衡阳为根据地。”他先后写成《国防论》、《以政治控制军事》等专著,为最高当局出谋划策。

1935年夏,南京军事当局召见陆军大学教官史九光,询问这样一个人才:“第一精通外国语,第二有军事天才,第三驰名海内外,我想派他出国考察现代军事,你想哪个好?”史九光讲:“条件兼备的只有一个蒋百里。”蒋百里以军委会高等顾问的身份,去欧洲考察各国的总动员法。他对意大利发展空军的过程调查得很细致,认为中国为大陆国,速成国防以发展空军为最适宜,空军有独立的必要,成为中国陆军出身却倡导空

七、陆军大学的校长

军独立理论的第一人。他还渡过大西洋来到美国,见到在美国留学的未来女婿钱学森,认为他舍弃航空工程而改学航空理论的转向是对的,美、德等国航空的新趋势是工程、理论一元化,工程是跟着理论走的。1935年12月1日,蒋百里考察结束回到上海。他在返程的船上对妻子左梅讲:“和平、和平,人类所乞求的是和平。可是相隔不到二十年,人类又播下了战争的种子。我看不久的将来,二次大战会在东方爆发。”

六、“西安事变”的阶下囚

1935年12月8日,蒋百里接到蒋介石的电报,请他到西安晤谈考察欧洲的情况。12月11日,他飞抵西安,当天下午就去华清池与蒋介石会面。12月12日,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发生,他清晨被零乱的枪声惊醒,天亮时被一名军官带到客厅,信口说了一句:“昨为座上客,今作阶下囚。”12月12日下午4时,张学良来到客厅拱手说道:“对不起,各位受惊了。”当天晚上,张学良嗫嚅着对蒋百里讲:“您是个无党无派之身,我有疑难问题想向您求教。”蒋百里讲:“今天是力的问题。在西安,你的力很够,尤其是在招待所,两条枪足够应付我们。可是西安以外怎样呢?”张学良讲:“西安以外我是鞭长莫及,假定中央军飞机对西安轰炸……”蒋百里不等他说完就毫不犹豫地讲:“委员长在西安,他们不会来轰炸。”12月16日,张学良对蒋百里讲:“我每次见委员长,他必大动肝火,不让我陈述意见。我想请您劝一劝委员长。”经过蒋百里劝说,蒋介石同意让蒋鼎文带着他的亲笔信回南京。12月21日,宋子文飞抵西安,12月22日宋美龄也来了,一切问题由紧张到和缓。12月26日,杨虎城设宴为蒋百里等饯行,蒋百里又讲了一句:“昨为阶下囚,今又座上客。”

在西安的两个星期,蒋百里每天写一张明信片给在德国的两个女儿,让她们保存以作纪念。他写得非常轻松:“飞机轧轧声,南京有人飞到西安来了。”“又一轧轧声,委员长今天飞回南京去。”“明天再来一轧轧声,你们的爸爸将离开西安这古城了。”

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后,蒋百里任国防参议会议员,把全部心思和精力投入到研究如何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他讲:“中国有地大、人众两个优越条件。不打则已,打起来就不能不运用‘拖’的哲学,‘拖’到东西战事合流,把敌人‘拖’倒了而后已。”有一天,少壮军人孙元良在蒋百里家里吃饭,倏地把酒杯摔在地上说:“我们决心拚命打,战至最后一人!”蒋百里哽咽着说:“你们年轻人要活着看咱们中国翻身的日子,我这老命却拼在这一次!”

蒋百里对战时国民心理建设尽了最大的努力,在文坛上的拼命,就像在战场上拼命一样。他写了《抗战的基本观念》一文,认为敌人想屈服中国人的意志是不可能的:“战争目的在于屈服敌人的意志。屈服一个将军的意志使他放弃抵抗,这是可能的;屈服一个政府的意志使它改变政策,也是可能的;但要屈服一个民族求生存的意志,这是古今中外都不可能的。”1938年他在专著《日本人》一书中,提出“持久战”的思想,写下最后一句话:“成也罢,败也罢,就是不同它讲和!”几乎在同时,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写下了不朽的著作《论持久战》。

在抗日战争最关键的时刻,蒋介石让蒋百里担任陆军大学校长,这的确是他最适宜的工作。当时校址设在湖南桃源,后来又迁到广西桂林。他在桂林发表演讲:“日本当局用十年工夫养成的蓬勃的民气,经过一年零两个月的战争,便倏然消失了,它的溃灭可以断言!”1938年8月11日,蒋百里因心脏麻痹症抢救无效,在广西宜山去世,国民政府追授他为陆军上将。1938年11月8日,著名记者陶菊隐在上海《新闻报》发表文章讲:“蒋百里不仅为中国唯一的军事学者,而且对政治和文学无不富于天才。他所教育的学生,有些在北伐过程中建过功,有些在这次抗战中立过伟绩,他对国家的伟大贡献,对中华民族近代史有重大的影响是必然无疑的。他撰文坚持‘抗战必胜’的信念,不啻长夜中的一盏明灯,他的精神是永远不灭的。”

(作者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 (责任编辑 吴思)

公 民 与 公 仆

● 吴若增

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社会形态——也包括了第一阶段或曰初级阶段或曰过渡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形态，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将是这样的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见《共产党宣言》）结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他文章中的论述，我们得以知道，这个“联合体”即是“公民社会”，它的组成是“公民”。

这里有一个问题必须解决，那就是由公民们组成的公民社会或曰联合体，将有一些公共关系和公共事务需要有人出来协调乃至处理。那么这些人应该是些什么人？他们与公民们的关系应该怎样？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出的称谓是——“公仆”。这个“公仆”，十分准确地表现了在公民社会或曰联合体中，公职人员与公民的关系。

简单地说，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公民”与“公仆”关系的基本观点。

需要进一步研究和理解的是：“公民”这个概念的含义到底如何？它与“公众”、“人民”、“老百姓”这样的概念有何不同？以及“公仆”这个概念的含义到底如何？它与“官员”、“领导”、“领袖”这样的概念有何不同？

首先我们来看“公民”。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公民”的阐述，我们可以看到要做一个新社会的“公民”，需要两个条件：一，他是一个能够“自由发展”的人；二，他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构成“一切人的自由发展”。这里，我们应该明确，结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他文章中的论述，所谓“自由发展”的人，他俩指的是：那是一个摆脱了传统和异化，以及旧的体制的束缚，因而能够最大限度发挥自己才智的人。显然，这样的人必是一个对于社会享有责任、权利和义务的人，必是一个在政治、法律、价值、人格等等与其他社会成员具有同等地位的人，必是一个能够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意志的人，同时，也必是一个尊重他人具有同等地位并

尊重他人自由表达的人。当然，这样的人是一个人的个体而不是某群体中的一个。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公民”这个概念，是与“公众”、“人民”、“老百姓”这样的概念完全不同的。

至于“公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指出：一，所有公职人员全部由公民直接普选产生，之后受到监督，并且可以随时撤换。二，所有公职人员全部实行普通工人工资制，即他们的工资标准与一般工人工资标准完全相同。（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96页和第58页。）那就是说，只有具备了这样的两个条件——政治上无特权，经济上也无特权，公职人员才能被认作公仆，也才能成为公仆。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公仆”这个概念，是与“官员”、“领导”、“领袖”这样的概念完全不同的。

另有一点，尤其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千万不要忘记，公民和公仆是一对密不可分的概念。他俩的关系堪称时时同在，处处同在。也就是说，没有公民就没有公仆，没有公仆就没有公民。因此，我们切不可只谈公仆，而忘记了也谈公民——遗憾的是，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喜欢谈论公仆却很少谈起公民——因为要知道，在一个公民社会里，倘若没有公民，那就绝不会产生真正的公仆！

比方说吧，包拯和海瑞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最清廉且最最正派的好官了——其实这样的好官现在也很不少，或者说现在更多，比方说他们的优秀代表焦裕禄、孔繁森等，但很遗憾，他们是爱民如子的好官，清官，父母官，或为了人民的利益能够赴汤蹈火在所不辞，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优秀领导干部，但却不是公仆。那么这是为了什么呢？道理十分简单，就是因了与其对应的，只能是臣民或草民，或人民或老百姓，而不是公民。没有公民，何来公仆？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并不具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出的上述两项条件。

范长江晚年对新闻工作的思考

●
于
友



范长江

理论家谢韬说得好：“历史人物的研究是最好的政治课，是最好的公民课，最好的理论课，是改革开放继续前进的最好教科书。”“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名记者范长江也是一个历史人物，研究他的经历，特别是他从一位爱国民主人士到执政党领导干部，却不幸反被迫害的经历，可能是一个比较新鲜和现实的课题。

本文作者是范长江的后辈，读过他的许多遗作，其中包括他的通讯和他关于新闻工作的理论，从而知道了他一生的经历，包括他的成功史；还知道了他被迫害致死，原因就在于他持有不同于当时“主流思想”的主张。

我从他一生经历觉得他一直是一个杰出的知识分子，怀有实现民主政治的抱负，较早具有“两头真”的阅历，而晚年他提倡说真话和反对贾桂奴才思想，实质上就是反对专制和反对奴化。在这里我试着写下我思考范长江经历的一点体会。

早年热心宣扬民主理念

范长江在1935年5月开始担任《大公报》记者工作，为西北通讯采访和写作。他曾先后在南京中央政治学校和北京大学学习，具有较高的民主政治理论知识和报效社会的雄心壮志。当年抗日救亡运动高涨，他发表许多通讯宣扬他的政治见解，受到读者的欢迎。

1937年4月20日他在通讯《忆西蒙》中写道：“人民没有政权的国家，前途不会是光明的。言论自由，在复杂的国家情形下是让各方面的人民表示其意见的最好方法，许多新闻纸本身，自然难免各有其背景，然而它的背景，即代表一种社会意见。”

长江1939年入党以后，结合党当时的政策揭露国民党专制统治，更努力地发表争取民主自由的主张。举例说，1941年9—11月他在连载文章《祖国十年》中的《中国人民的立场》一文中说：“人民是国家的主体，这不是新理论，也不是新事实，全世界各民族千百年来可以说无例外地向这一个民主目标奋斗。从理论到实践，各民族都曾流过巨大的血，争得了现代民主政治的基础。孙中山先生所致力之四十年革命，也是以民主主义为骨干。只有希特勒和他的信徒们才想阻止历史前进，重新恢复古代专制黑暗的时代。”

长江上述言论都反映他信仰民主的先进理念。中共在建国后施行无产阶级专政，要求舆论一律，长江本人也不免受个人迷信思想的影响，当过驯服的党政干部。但是，在上世纪50年代多次极左的政治运

动之后,长江恢复了他作为爱国民主人士和公共知识分子的本色。

1959年恢复独立思考

1959年7月21日,也就是庐山会议上张闻天发言的同一天,范长江在上海华东医院住院,写了他纪念邹韬奋逝世15周年的文章《为真理而斗争》,留下了他反思的心里话:

我们的时代也有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在各项革命和建设,永远有正确和错误,先进和落后的斗争。永远需要我们有献身真理的精神,勇敢地站在正确和先进方面,推动我们的事业前进。所以,在我们的社会中也提倡敢想,敢说的共产主义风格,要反对贾桂的奴才思想,要提倡说真话。

两年以后的1961年,他终于就他最熟悉的新闻宣传工作提出了创新的政见,他写下了题为《记者工作随想》的长文,开头一节的题目为《在新问题面前》,宣告“我们必须认清面临的问题,认真地总结过去的经验,从中找出一条路子来,改进我们的工作。”

紧密联系群众和不盲从领导的主张

长江在《记者工作随想》中明确地写道:“我认为,一个记者的最基本的锻炼就是群众观点的锻炼……记者应该活动在群众中,他是人民群众中间的一个活动家,了解群众的动态,思想感情,熟悉群众的生活和问题,知道什么是群众懂的,什么是不懂的……只要我们能在群众中扎下根,同群众有着广泛的联系,了解他们的生活和斗争,了解他们的思想和感情,那么就可以根据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去理解中央的方针政策,这样做大致上是不会错的。就是错一次,也不要动摇,因为这条路是正确的。”

他还鼓舞记者们说:“做新闻记者,一定要翻很多跟斗,翻跟斗不要怕,只要方向对头了,翻一次跟斗也就能提高一步。与群众的联系也会更密切起来。领导也有糊涂的时候。领导糊涂的时候,群众是清楚的。如果和群众有密切联系,你就心中有底,不至于像赌钱一样,跟别人押宝,别人输

了,你也跟着输了。”

范长江的这些话无疑是他对同业的肺腑之言。他说的是:记者啊,千万站在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先进和正确的思想一边。

范长江后来在“文革”中遭遇到严重的迫害,经长期关押,在1970年含冤自杀。我现在体会,他的自杀和“文革”中其他许多公众知识分子自杀一样,是一种抗议,一种决裂,是同“文革”那种错误领导下的政治决裂。他的死难将会同古代的屈原一样,受到后人们的尊敬和怀念。可喜的是:改革开放开始,他就得到了平反昭雪,并已被树为记者学习的模范。

范长江的反思记录值得学习和参考

长江在“文革”开始以前就有了那样勇敢的反思,显然同他早年继承五四传统和信仰民主主义的理论有关。他的主张,显然同张闻天和顾准等这些大智者们留下来的遗言一样,是较早的改革呼声。改革需要提倡说真话和反对奴才思想。长江的晚年经历,不仅对当今从事新闻宣传工作的后来人具有启蒙和教育作用,对其他关心国家大事的人们都会是宝贵的启示和鼓励。

我过去读范长江的通讯,知道当年他有随时思考和记录的习惯,不知道他晚年是否坚持,如果晚年还有随记,肯定会有他更多的反思记录。此外,他晚年也可能给挚友们写过说真话的信。我希望他如今健在的亲友,及时把这些有关的笔记和信件都整理出来,供我们大家学习和参考。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集,就是由恩格斯整理马克思的众多随手记录完成的,那里就有马克思晚年的许多新创的论见。

常言道“众志成城”,我国蒙受极左灾难的众多觉醒者的往事反思,必将对当今改革的一种重要的推动。(责任编辑 杨继绳)

公 告

凡未收到稿酬的作者,请将联系地址、邮编和身份证号码告知我社。

联系人:肖林 电话:010-68525374

有感于孙中山不让喊“万岁”

● 戴 煌

多年前读到一篇文章，很有感触。

据这篇文章的作者说，他读到中华书局1991年8月出版的《孙中山年谱长编》和其他相关史料记载：1912年4月1日，孙中山先生为促成南北统一，毅然辞去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让位于北洋政府的袁世凯，并于当月20日乘船去福建游察。当船抵马尾时，他看到欢迎他的人群中和水面的大小船只上，都闪烁着“欢迎孙大总统”和“孙大总统万岁”的大小纸旗和布条。他很不高兴地说：我已辞去了临时大总统，为什么还要这样高抬我？他并对上船迎候的福建都督孙道仁说：“这太不成话了。就是共和国的总统，退了位，就是一个平民，怎么还要称‘孙大总统’？再说什么‘万岁’，那是封建皇帝硬要他手下的官民称颂他的。我们为了反抗这个‘万岁’王朝，多少革命同志抛头颅、洒热血，才取得了消灭掉清王朝的伟大胜利。如果我接受这个封建王朝的称呼，我对得起那许许多多的先烈吗？”他要求孙道仁立即撤掉这些纸旗和布条，否则决不上岸。

孙道仁立即传达，大小船只和人群也立即照办，孙中山这才欣然上岸。

看了这段文字，我的最大感触，就是历史也有它的惰性：封建的帝王思欲绝不会一了百了。正是孙中山先生创立的国民党，在孙中山先生瞑目之后，大权一落入独裁专制的蒋介石之手，蒋魔王就大搞一党专政，大搞“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唯我独尊。他被赶去台湾小岛之后，大陆上的“万岁”之声又不绝于耳。特别到了“文化大革命”，地无分东南西北，人无分男女老少，自发或被迫地每日每时声嘶力竭地大喊特喊“万岁万万岁”和“万寿无疆”，这说明封建帝王思想犹如无孔不入的毒菌，致使灭菌之途还很漫长。

这使我屡屡想到陶行知先生1930年致友人

信中的那句话：“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当年我们千百万的同志和先烈，真是“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他们艰苦奋斗终身，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乃至生命。后来我才感悟到：在这些同志和先烈“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同时，另有很多人是“捧着帝王将相的野心、个人名利的私心、升官发财侵吞人民血汗的黑心而来，带着大名大利和黄金万两而去”，以致直到今天，层层级级的脏官污吏仍然层出不穷。大凡这种人一旦窃取了大权大势，必定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实行法西斯式的封建极权专制主义。

马克思一生为人民民主而奋斗。1843年，即早在与恩格斯共同发表《共产党宣言》的前5年，年仅25岁的马克思因《莱茵报》被查封正与友人合办《德法年鉴》，在旅行到科仑时他给《德法年鉴》好友卢格致函说：“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兽的关系只能靠兽性来维持。”

这段话，详见1956年1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414页。虽然马恩晚年与时俱进地修改了早年的一些著名论点，但是这句话直到今天仍然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请同志们想一想：在这样的极权制度下，能有民主、自由吗？谁是兽性，谁有人性，难道还不应该掂量掂量么？记得抗战时，夏衍写过一个剧本，名叫《法西斯细菌》，详细描写了法西斯毒菌的危害。目前如果有人写一写《帝王法西斯细菌》，我想肯定大有益于如今的世道人心。

20年前，我只能写一篇1947年苏北盐城攻坚战采访回忆片断，题为《胜利之路，烈士们的血肉铺就》。其用意就是不能把千百万烈士血肉铺就胜利之路的大功大德，都独揽到一个人的头

上。这短文最后说：“几十年来，不论欢愉的时刻，还是苦难的岁月，我都常常缅怀过去一批批倒在血泊中的先烈，时而默默流泪。今天，我们这个新社会虽已衣食无虞，但由于党风正气衰颓，致使往昔的革命精神、同志友情、党和人民血肉相连的关爱反而十分淡漠的现象，却泛泛可见。这不能不令人在对先烈的缅怀中，伴随着难以拂却的伤痛和悲愤！但愿我们所有当年心怀壮志投身革命洪流的人们，以及甘愿踏着用鲜血铺就的道路

坚决走下去的子子孙孙，团结奋起，把 20 世纪中国最伟大的革命事业，不是含污夹垢、拖泥带水，而是光明正大、健康无邪地继续下去，直到先烈们的壮丽心愿全部实现！”

总之，孙中山不让喊“万岁”，使我的联想很多很多，但由于篇幅所限，不能一一道来，只能就此搁笔。诸公有何见教，敬希慨助。

(2007 年 9 月 21 日于戴氏蜗牛居)

(责任编辑 杨继绳)

书 名	作者或主编	定价	邮 费
国史札记	林蕴辉	40.00	7.00
夹边沟记事	杨显惠	34.00	7.00
沉思录	马可·奥勒留著 何怀宏译	20.00	5.00
1949 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	傅国涌	30.00	6.00
长河孤旅——黄万里九十年人生沧桑	赵 诚	28.00	6.00
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	戴 煌	21.00	5.00
民主是个好东西——俞可平访谈录	闫健编	35.00	6.00
李锐反“左”文选	李锐著	22.80	6.00
1978 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	于光远	36.00	7.00
尚未结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访谈录	鲍·斯拉文著 孙凌齐 李京洲 李桂兰译	26.00	6.00
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	王光美 刘源等	20.00	6.00
大寨寓言——“农业学大寨”的历史警示	陈大斌	38.00	7.00
抹不掉的记忆——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	张广友	32.00	7.00
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	张纯如	28.00	6.00
张国焘传	姚金果 苏 杭	39.80	7.00
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	邢同义	24.80	6.00
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	张 胜	45.00	7.00
知情者眼中的周扬	徐庆全	24.00	6.00
淮海战役秘密战	夏继诚	33.00	7.00
辽沈战役秘密战	松 植	35.00	7.00
平津战役秘密战	松 植	36.00	7.00
庐山会议实录	李 锐	18.00	5.00
沧桑十年——1966—1976 共和国内乱的年代	马识途	38.00	7.00
命运与使命——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世纪回眸	冯建辉	29.80	6.00
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张素华	28.00	7.00
红墙大事——共和国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上下)	张树德	69.80	8.00
马寅初全传	彭 华	35.00	7.00
1958—1962 年的中国知识界	罗平汉	32.00	7.00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 69 号
邮 编 100045 收款人 炎黄春秋杂志社

(注 邮购三本书以上，可按总书价的 10% 付邮费)

代购代邮

《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作者因提出“神化与特权”问题，开始了长达 21 年的“右派”生涯——一段疯狂、荒唐与阴暗的岁月在这里定格，一段惨痛、悲苦与抗争的生命历程在这里展开……

《夹边沟记事》这是一段尘封四十年的历史，讲述了大饥荒中发生的故事。当年的幸存者散落在各个角落，没有人问过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当年的死难者早已化为白骨，连他们的后代也不知道埋在何处。

《1949 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1949 年是中国历史发生大转折的一年，本书选取当时不同年龄、不同倾向并做出了不同选择而各有其重要影响的十四位著名知识分子；通过他们的日记、书信、回忆等最能袒露心迹、折射历史的文字与口头资料，使许多生动的细节、曲折的过程和未曾披露的真相一一呈现在读者面前。

《长河孤旅·黄万里九十年人生沧桑》见证一代伟大的水利学家黄万里先生高贵、执着的沧桑人生。

《李锐反左文选》1957—1978 年的 20 年，中共走了一条漫长的“左”的错误道路：反胡风，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四清”社教，直到十年“文革”灾难。历史上“左”造成的恶果甚多，其中整人(往死里整)是最大的恶果之一。

了解中国政治，必读李锐文章。

《尚未结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访谈录》

阅读此书，你不仅可以了解到苏联总统对后改革时期叶利钦十年的评价，对他领导国家过程中主要的消极成果的评价，对叶利钦及其班子不加批评地接受西方极端的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批评。你还将了解到为什么现在戈尔巴乔夫支持普京的政策。通过阅读此书，你会对苏联第一位和最后一位总统及其观点得出自己的结论。

“红色文学史”五十年祭

● 黄修己

1995年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同学入学40周年聚会,前一任北大党委书记王学珍出席讲话。谈到1950年代的北大科研成就时,他说:理科是胰岛素的合成,文科呢,就是你们55级的文学史了!这说明直到1990年代,“大跃进”中55级编写的、被称为“红色文学史”的书,有的人还认为是1950年代北大文科能拿得出来的重要成果。

所谓“红色文学史”,是55级部分同学在1958年“大跃进”高潮中,为了响应思想文化战线上“拔白旗、插红旗”的号召,利用暑假编出的70多万字的批判“资产阶级学术观点”的《中国文学史》。这在当时被认为是“无产阶级新生力量”开始剥夺了“资产阶级专家”的学术话语权,所以很是轰动,加以书的封面是红色的,因此被称为“红色文学史”。书出版不到一年,又由全年级同学来修改和扩写,出版了100多万字的新版,这一版的封面是黄色的,后来便戏称其为“黄皮文学史”。55级在校期间,还出版多项当时有一定影响的编著,因而被誉为“集体科研”的先进集体。后来这个年级的同学,有不少成为专业上有成就的知名学者,于是他们在学期间这一段特殊经历,被某些人视为高校教育和人才培养的成功实例。长期以来这个集体也一直笼罩着荣誉的光芒。

事情究竟是怎样的呢?在过了整整半个世纪之后,回顾那一段历史,我觉得还有进一步认识和反思的价值,问题集中在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之上。

撞上的和撞不上的

“反右”后,社会上、文化界的阶级斗争之弦已经绷得很紧,需要大学文科培养能够在思想文化战线的阶级斗争中起作用的人才。这个问题必然引起关注。那时善于揣摩、紧跟政治形势的姚文元还不太受到大学学生的注意,而李希凡因为在批判《红楼梦研究》中冒了尖,被一些年轻学子所羡慕。北大学生中流传着一种说法,已成了著名“右派”的林希翎,所以给自己起了这样的名字,

就是表明她是李希凡和蓝翎的综合。此说真假不知,但可以说明李希凡在大学生中的影响不小。而那时认为李之能冒出来,因为他“撞上了”,即所研究的题目、内容“撞上了”当时政治的需要。这当然要看机会,1958年,这样机会来了。紧接着“反右”,高校开展“双反”运动,批判“资产阶级专家”,要在学术领域“拔白旗,插红旗”。当时北大许多系、许多学科已经掀起批判“资产阶级伪科学”的热潮。

1950年代初期,中文系的教学显然不能完全适应这种新形势的要求。系主任杨晦从我们入学那一天起,就要求大家踏踏实实做学问,强调学生要多读书,反对过早发文章。而且后来杨晦还明确表示:我们中文系不培养李希凡、姚文元那样的人!在课程安排上,可以看出在义理、考据、词章之间,他看重的是考据。有的同学认为这是“钻故纸堆”,与杨晦有过冲突,我在《精神上越来越亲近了》一文中已有记述。那时55级在北大已经被熏了3年,老一辈教师授课,树立了踏实治学的榜样。而且我们对老师也是很尊重的,有的人报考北大就是为奔某某教授而来的。传统学风使一些同学开始养成做学问只认事实,只认道理的作风,不考虑学问以外的什么“需要”,嘲笑那些观点随风转的学者。他们在北大学的这一套,与当时的政治对文科学生的要求是有差距的。

但是,时势造“英雄”,55级也会有人想出来“撞”一下,有人提议用学生集体编书的方法创造学术的“大跃进”,以显示“无产阶级”有能力剥夺“资产阶级”的学术专利。集体编书的建议便由三班的个别同学提出,得到了年级和系的党组织的支持。为了要“区别于一切资产阶级学者的文学史”,便提出了自以为“革命”的文学史观,即“民间文学是中国文学的正统”和中国文学史上始终贯串着“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还要在书中点名批判“资产阶级专家”,包括自己的老师。然而,三年里所受的熏陶和训练,又使这些学生并不十分善于承担这样的使命,或者说他们并非理想的“无产阶级”新生力量。

例如他们的“革命”观点,实在太不新鲜了。早在建国之初,浙江著名学者蒋祖怡,已经在1950年4月出版了《中国人民文学史》(北新书局),就是为了给下层人民争地位,该书专门记述古代的民歌、民谣、话本、杂剧等,把民间文学扶上了中国文学的正位。甚至五四时期的胡适,还有一些北大师生,也在这种民主思想的激荡下,在白话文运动的推动下,想把民间文学提高到中国文学的“中心部分”的地位上来。至于用“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斗争”来贯穿中国文学史,首创者是茅盾。在各种创作方法中独尊现实主义,把现实主义视为自古以来最重要甚至是唯一可以肯定的方法,把一切必须否定的作品都视为是反现实主义的,这种认识自19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后,已渐成新文学领域的主导观念,所以就连茅盾这样的大作家也在《夜读偶记》中,用“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斗争”来概括中国文学的发展史。极力反对这一观点的何其芳,在1959年北大中文系“五四科学讨论会”上发言时,批评的矛头就指着茅盾。他说:“茅盾同志那么有学问,怎么也会提出这样的论点来!”总之,所谓“革命”新观点,都不是55级学生的创造发明。

“红色文学史”出版后,它的这些旗帜鲜明的“革命”观点,很快就受到了批评。这批评如果来自“资产阶级专家”,那一定会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反扑”,偏偏这批评主要来自党内专家,而且是当时的理论权威,如邵荃麟、何其芳。他们一个主管中国作家协会,一个是中国科学院学部的文学所所长,都是中国文艺界、学术界的领导者。他们把55级同学一个也不能少地请到王府井八面槽的中国作协会场,听他们做长篇报告,细细地分析、批评“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斗争”公式的错误。这时55级已是名噪一时的教育界“大跃进”的先进典型,邵、何等这样毫不客气地批评,究竟是他们个人的顶风行为还是有什么来头,不得而知。这里姑且就当时的历史背景做一些分析。

茅盾在“反右”之后提出他的文学史公式,当然也会有他的针对性。但是到了1958年1月开始发表《夜读偶记》时,“大跃进”的高潮已经掀起,农村出现“新民歌”运动,特别是毛泽东,亲自提出了“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一时间浪漫主义的身价大为飙升。而按照茅盾的公式,是把文学史上的积极浪漫主义归入现实主义,把消极浪漫主义归入反现实主义,这实际上贬抑了浪漫主义,显然已经不合时宜了。因为毛泽东的新观点里这两种创作方法是平等的、并列的,在强调革命理想的时候,浪漫主义甚至更重要些。邵

荃麟、何其芳那么起劲地反对“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斗争”的公式,可能有学术思想上的原因,但会不会也有为宣扬毛泽东的“二革结合”新观点扫路的意思呢?1959年,邵荃麟还专门在北大做了一场关于“二革结合”的报告,所要论证的就是文学史上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从来都是不同程度地与浪漫主义结合着的。这些行为透露出的信息,也许可以解开邵、何反对矛盾的观点,并且拿当时影响很大的55级的“红色文学史”开刀的原因。

年轻的55级同学,包括那些想“撞上”的,显然对这种文学行情的变动认识迟钝,只感到来自上面的压力很大,“红色文学史”非改不可了。这就是它出版不到一年就全面修改,扩大为四卷“黄皮书”的原因。但这么一改,就把自己与“一切资产阶级文学史的根本区别”轻轻地抛弃了。套用一句老话:这部文学史的“革命性”就被“阉割”了!而且在1959年,又因时局的变动,开始强调团结旧知识分子,《人民日报》发表小文章,批评55级没有感谢老师的教育培养,又要他们来担当未能尊师之责。许多同学对党报为什么这样批评不理解,还瞎猜是李希凡写的,后来问过李先生,李先生否认。到了“黄皮书”,所有批判“资产阶级学者”的内容全都删去。

“红色文学史”套上“革命”观点、红色外罩,但内容不见得都“红”。只举最著名的李、杜的诗为例,它肯定了李白诗歌的“反战思想和人道主义精神”,肯定“李白诗歌的人道主义思想也表现在能够写出人民的痛苦生活,直接表达他们的思想感情”,认为“杜甫的诗歌具有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他的人道主义“通过对劳动人民优秀品质的赞美而深刻地流露出来”。到了“黄皮书”,对古代文学遗产的肯定就更多了。岂知此时又发生中苏交恶,中国开始批修,人道主义被视为修正主义文艺观的核心。这时已是毕业前夕,来不及大改,但还是做了局部的修改,凡提到人道主义的都改过来,把这些修改的部分抽出来印了一本约二三十万字的“白皮书”,用于内部参考。

从“红皮书”提出自以为是“和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根本对立”的观点,到“黄皮书”的抛弃这观点,从肯定文学上的人道主义,到“白皮书”删掉人道主义,变化不可谓不大。这样的变化使原先“红色文学史”的“革命”色彩大为消退,企图显示与资产阶级学术“根本区别”的意图大半落空。然而55级同学可能还没有明白过来,疲于奔命,反复修改,只是随着形势的变化和政治的需要团团转,与真正的学术革命并无关系。学术要紧跟政治形势,学术观点也要服从政治需要,于此道他们(至少是大



1960年55级毕业在北大合影

多数人)还处于蒙昧状态,所以不懂得“跟风”,不知道在抛弃了“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斗争”的公式后,如果换个“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自古相结合”的新公式,说不定会改出一部更趋时的“红色文学新史”来。后来继续出版的或编或著的《中国小说史》、《近代诗选》、《成语小词典》等,只是“大跃进”的余波,其内容与当时的政治风向并无多大关系。他们毕竟是些小书生啊!

1958年,55级同学被卷入“大跃进”的浪潮,被推上了时代的浪尖,也许有人自以为这回“撞上了”,其实这些小青年的学风还没有全被扭曲,他们的理论观点就总也“撞不上”。用学术观点紧跟政治需要的标准来衡量,他们远未修炼到家。这就是他们的矛盾,也是他们的尴尬。所以到了“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一起,他们中很多人一夜之间从“无产阶级新生力量”变成了“修正主义黑苗子”,让他们的弟弟妹妹,比他们“革命”十倍、百倍的红卫兵们,抡起铁扫帚,同着他们曾经批判过的老师扫到一堆去了!

这时,离他们走红的年代,相隔不过几年!

个体和集体

如果要还原一个真实的55级,那还应该说:编写“红色文学史”并非55级全体同学的意愿。55级也并非团结一心的“战斗集体”,而是存在思想分歧和思想斗争的,这里我要利用一些旧材料。55级毕业时有一篇《在红专大道上成长的战斗集体》的专稿,其中保存了一些

当时思想斗争的实际情况。报道记述了1957年后学校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情景,也记述了编写“红色文学史”的提议并没有得到一致的赞同。报道称55级有的同学崇拜、羡慕资产阶级教授,把他们当做偶像,把他们的话“当做经典一样地奉行不违”。也有的同学对集体科研持怀疑的态度,不相信大三的学生能编出大部头来。他们“坚持要回家去,拒绝和同学们一起战斗,他们认为文学史根本不可能写成,不如回家休息休息,写写自己的文章”。甚至在“红色文学史”出版后,55级已经名声大振,在还

要不要继续搞集体科研的问题上,也还有人反对:“个别同学动摇了。他们说:‘这样搞下去不行。每个人读的书少了。现在几个人在一起还可以,将来毕业出去一个人怎么办?’”为此,全年级开展了辩论,那些反对的同学当然被认为是“个人主义”、“白专道路”。报道说他们后来都转变了、进步了,却是未必如此的,精神上受压抑所形成的心结,也许终身都化解不了。那年暑假我不在学校,等到开学回到学生宿舍,这里已是“平安旧战场”,但还能嗅到一点火药味,如某同学宿舍的门上残留着他离校前被贴的大字报,令其“悬崖勒马”。当时我确有一种感觉,编书的气氛还很紧张哩!为什么不能来点“兼包并容”,让想度假的回家去,想自己写作的写他的作品,让真心实意要集体编书的一起来编书,那就不至于那么紧张。但那是一个“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时代,做事强求一律,追求清一色,不允许有个人意志,自由主义已经扫地出门。北大也是按照这样的要求来培养人的,好学生就应该绝对服从集体,无条件地牺牲个人,做党的驯服工具,自觉消泯个性。否则就是“个人主义”、“个人英雄主义”。报道记述了55级进行集体主义教育的情景。为了说服某同学,“党支部领导大家算细账,使他看到30多个人苦战35天等于一个人工作7年”。还有同学说:“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咱们几个人一凑,不就是一个集体专家了吗!”

但是,科学研究能这样“凑”出成果来吗?55级在集体科研中确实发扬了协作精神,这是他们很突出的优点,“一个人发现了一条材料,便立刻告诉别人,一些同

志把几年来做的卡片都拿出来给别人参考”。在特殊的时空条件下,还很年轻、单纯的学生们似乎攻破了“学问私有”的思想堡垒,但就是这样无私地“凑”,事实上并没有,也不可能提升“红色文学史”的学术质量。在科研攻关中需要团队精神,需要集体主义,但不应完全否定个体的作用和意义。其实55级的书能够编出来,不就是许多个人(主动地或者勉强地)贡献了个人的力量吗?

归根到底,为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的巩固和发展,思想上、文化上必然非常强调树立集中、统一、服从等观念。那时55级同学都是“准国家干部”,通过集体编书来批判个人主义,培育服从集体的观念,这是55级受到表彰的另一原因;即使书中的“革命”观点都改掉了,他们仍然是先进集体。

幸运的和不幸的

“红色文学史”的编成,给55级带来了许多荣誉,他们被树为全国教育革命的榜样,是全国群英会的代表、社会主义建设先进青年集体。我并不主张全盘否定55级和“红色文学史”,例如把中国古代文学史贯通到现代,补齐了鸦片战争到五四这一段,这还是第一部。但是利弊相比较,弊远远大于利。它的点名批判伤害了自己的老师,在编写过程中批判“白专道路”又伤害了部分自己的同学。而这种集体科研打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损害了学生的基础训练,以教育、学术为紧跟某种政治的工具,助长主观唯心主义的学风,破坏了学术研究的科学性,破坏了学术规范的养成,对学生学业的健康成长的伤害更大。更不用说要求做“驯服工具”对青年思想成长的严重损害,最终是大家都是受害者!“红色文学史”昔日似乎为北大带来了光彩,其实是教育“大跃进”的瞎折腾的典型产物!

55级的确是建国以来北大中文系出人才较多的一个年级,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当然有母校培育之功。但在校最后两年的折腾,也使他们受害,他们本来是可以学习得更好的。而且为荣誉付出代价,并没有给每位同学以公平的回报。55级的名声使他们毕业时成了“抢手货”,北大人事处曾经要中文系把这个年级所有的骨干都留下。但别的单位也抢着要,北京日报社还一定要党员。我本来是分配去读研究生的,就因为原定留校的某位党员改派到北京日报去了,把我来补了他的空缺。那一年分配去的单位多是教育、文化部门,多数人都留在北京,像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党校等单位,都分去了不

少人。因为多数人都想做学问,所以留在北大任教被认为是最理想的。那年留校的就有14人,加上有两人提前毕业留校教马列,后来成了哲学系的美学教授,再加上读研究生的毕业后又有两人留校,我们年级总共留校18人。

但并非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幸运,在5年中遭遇不幸的同学也不少。只以我所在的二班为例,在学期间有两人被错划为“右派”(是全年级划“右派”最少的班);有两人因“反右”中的“错误”受到团纪处分;有一人因为说了1959年安徽农村的真实情况,被当作“反动学生”勒令退学,劳改后回乡当了一辈子农民;有一人因为莫名其妙的原因,被当作反革命小集团的头目,被他家乡的公安机关逮捕入狱,中断了学业;有一人因生活作风小有缺陷,被当作“流氓”勒令退学了;还有两人因毕业鉴定中“政治态度”划为“中右”,被用人单位误为是“中等右派”,报到后立即送到劳改队去。据我所知给每个人划政治态度是“反右”以后的事,每隔一段时间就划一次,分为左派、中派(又分中左、中中、中右)、右派(也有一般右派、极右派之分)。我是团干部,有时班上党员也给我看看这种划分,所以我知道我在1957年的“鸣放”时期,也是个“中右”。那两位被误送去劳改的同学在发现是弄错了之后,从劳改队放出来分到北京近郊的中学去教书,“文革”中又都受到冲击,因生活、工作不愉快,于“文革”后都回故乡去了。究竟谁把他们定为“中右”,至今也搞不清楚。

我们班是全年级人数最多的,共29人,不同程度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就有9人,差不多占到三分之一了,这比例实在够大的。就是受团纪处分最轻的某同学,后来的分配也受影响。他本是留校读研究生的,却赶上了“三年困难”调整、压缩研究生名额。跟他一起分去读现代文学的3人,只有他是受过处分的,便被压缩了,改派到据他自述从未听说过的某地的一所还没有校舍的大学去了。我这只是说的我的班,其他三个班还有比这些更严重、更悲惨的故事!

现在这些同学已经全部得到平反,有的也已成为著名学者,在后半生得到一定补偿,但也有的终身受难。荣誉后面并非都是欢歌笑语,未名湖也并非尽是柔波荡漾,杨柳轻拂。想想那么多“同桌的你”的惨淡人生,当年那些荣誉、那些豪言壮语都显得何等虚妄,甚至可笑啊!

(作者为中山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 杨继绳)

霍查家族沉浮录

王洪起

2008年10月16日,上百名阿尔巴尼亚人来到首都地拉那西郊的沙拉公墓,纪念阿尔巴尼亚已故领导人恩维尔·霍查诞辰100周年。霍查的遗孀奈奇米叶在纪念仪式上称霍查是“为阿尔巴尼亚建立了不朽功勋的英雄”。而民主党创始人、现任总理贝里沙则在霍查诞辰前夕呼吁人们与纪念活动拉开距离,并称霍查是阿民族历史上最大的暴君和独裁者。

霍查:生前受崇拜,死后被掘坟

霍查1908年10月16日生于阿尔巴尼亚南部素有“石头城”之称的吉诺卡斯特。他的家族是穆斯林。

霍查1930年中学毕业后曾留学法国,在蒙彼利埃大学攻读自然科学。学业未成,他便到阿尔巴尼亚驻布鲁塞尔领事馆担任秘书。1936年回国后任中学法语教员,并同当时的共产主义小组建立了联系。

1939年4月,意大利法西斯占领阿尔巴尼亚,霍查成为当时反法西斯组织的首创者之一。他动员群众投入反法西斯斗争,曾被意大利占领当局缺席审判死刑。1941年11月8日,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后来更名劳动党)在地拉那秘密成立。1943年,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当选为中央总书记,随之在第一次反法西斯民族解放大会上被选为民族解放委员会主席和解放军总司令;在第二次反法西斯民族解放会议上又被任命为临时民主政府总理。

1946年,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后改名为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现名为阿尔巴尼亚共和国)成立,他担任政府总理,并曾兼任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霍查从1943年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起一直是党的第一书记

(总书记)、民主阵线全国委员会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武装力量总司令,并拥有全军唯一的大将军衔。

1945年元旦,37岁的霍查与24岁的奈奇米叶结为伉俪。

1973年,霍查患心肌梗死,心律不齐,以致发展到心脏机能严重不全。为此,阿党除组织国内名医和法国名医诊治外,还邀请中国医疗小组前往救治。1985年4月11日,他的心脏完全停止了跳动。

霍查去世后,阿党和政府为他举行了极高规格的国葬仪式,他的灵柩安放在地拉那“祖国烈士陵园”内的最醒目位置,常年由战士为他守灵。地拉那(霍查长期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吉诺卡斯特(霍查故乡)和科尔察(霍查青年时期读书和任教的地方)三个城市竖立起霍查纪念塑像;地拉那大学命名为“霍查大学”;阿尔巴尼亚少先队组织改称“霍查少先队”;阿尔巴尼亚第一大港——都拉斯港以霍查命名;科尔察区著名的普拉奇合作社命名为“霍查合作社”。

霍查一生4次访问苏联,多次会见斯大林,并撰写了《与斯大林在一起》一书。1956年,他曾来华参加中共八大,会见了毛泽东,这也是他唯一的一次访华。至于西方,他极少涉足。霍查执政期间,对外“反对帝、修、反”,特别是“美帝、苏修”,对内大搞“反党集团”,清除异己。

霍查把斯大林的学说奉若神明,贯彻于阿尔巴尼亚的“阶级斗争”实践之中,利用铁腕手段控制着“山鹰之国”的党民们,总共进行了12次残酷的大清洗;为首者,基本上是肉体消灭。兹举其要:

1944年底,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劳动党)政权建立后不久,霍查就开始个人膨胀,独断专横,违背了党内民主,让中央政治局的人感到担心。他



霍查和他的夫人奈米尔叶·霍查(1985年4月)

们开始善意地给霍查提意见。霍查没有听从。党中央的第二号人物,政治局委员、组织书记科奇佐治提议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清算霍查的错误。霍查事先听到消息,把佐治等16人全部逮捕,指责佐治是南斯拉夫的代言人,将其开除,并于1949年以企图暴力夺权等罪名处死。

1973年上半年,霍查在秘密召开的阿党六届四中全会上批判以阿党中委、地拉那区党委宣传书记法迪尔帕奇拉米,中委、阿广播电视台总局局长托迪卢鲍尼亚,中委、劳动青年联盟中央第一书记、地拉那大学校长阿基姆梅罗为首的文化领域内的反党集团。帕奇拉米和卢鲍尼亚被双双开除出党,后被秘密判处长期徒刑,长年累月被关押在监狱和劳改营里,并在北方的斯帕奇铜矿(集中营)服苦役,直到1991年剧变期间才被释放。梅罗从中委降到候补中委,解除一切职务,下放到北部拉奇区从事体力劳动。

1974年7月25日,霍查通过劳动党五中全会把老资格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巴卢库推到了被告席。会上,霍查给巴卢库罗织的主要罪行是:

——炮制阿战略“黑纲领”,即主张在外国大

规模入侵时,不要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与敌人打阵地战,而应撤到山区打游击,以消耗敌人,保存力量,伺机反攻。也就是“农村包围城市”。而霍查的观点是,在敌人入侵时,应全力与敌人开展阵地战,力争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以正规战消灭敌人。霍查批判巴卢库的纲领是“退却纲领”。

——在军队中阻止霍查著作的发行,同时却散发有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内容的译著。

——妄图在外部敌人的帮助下推翻劳动党和政府,是军队的破坏者、阴谋家、叛徒、敌人。

——同苏联修正主义分子重修旧好,充当苏联代理人,企图搞政变和谋害霍查。

——是南斯拉夫情报局的合作者。

此外,霍查还说“巴卢库的修正主义路线‘通向遥远的地方’”,意指中国。霍查在他的《中国纪事》一书中指出:巴卢库“暗地里也偷偷地作为中国的代理人进行活动”;毛主席、周总理对他印象很好,并通过他建议阿尔巴尼亚与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建立“巴尔干联盟”;阿如果发生战争,应该打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霍查在这部专著中说:“1968年他(巴卢库)第一次向我报告关于中国的(巴尔干联盟)计划时,我立即表示反对。巴卢库表面上赞同我的意见,但却背着党中央、国防委员会和我,详细地制定了关于巴尔干联盟的计划。当中国人最后了解到我们连谈都不同意同他们谈这个问题时,巴卢库在中国人知道的情况下成了反党反国家阴谋集团的头目和首领。”

五中全会做出决定:解除巴卢库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出党。当年12月,霍查秘密召开党的六中全会,发表《清算杜米(政治局候补委员、总参谋长、中将)、恰科(中委、军队总政治部主任、中将)和佩尔拉库(中委、国防部副部长)的背叛和反党活动》的报告,称他们与巴卢库一起组成军事反党集团。经过约半年的审讯和拷打,逼供信,巴卢库、杜米和恰科前军内“三巨头”均作为军队反党集团的头目被送上了军事专门法庭,经过秘密审判后于1975年11月5日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枪决。另外还有数十名高级将领作为他们的追随者被开除出党或其他刑事处罚。

1975年5月,霍查主持召开党的七中全会,把矛头对准了主管国家经济的最高领导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阿尔巴尼

亚·中国友好协会主席阿布杜勒凯莱齐和政治局委员、工矿部长科乔蒂奥多西,并把他们定性为“经济反党集团”。凯莱齐、蒂奥多西等人在全会结束时被解除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出党。接着,霍查在多次政治局会议上揭批“经济反党集团”,给他们戴上与巴卢库等人同样的帽子:叛徒、破坏分子、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代理人。凯、蒂二人在被收监审判后不久便被秘密处死。

从1973年到1975年进行的3次清洗中,霍查排除了政界、军界、文化界和经济界的8名最高领导人,劳动党政治局1/3的委员丢掉了职位。在全国当时仅有260万人口的国家里大约3万名“官僚主义者”被摘掉了乌纱帽,可见清洗规模之大。

1981—1982年清除谢胡反党集团:1981年12月18日,阿尔巴尼亚政府总理谢胡“自杀”;21日,霍查在阿党八届二中全会宣布说谢胡是自绝于党的敌人。1982年初,改组政府,中央各部委“精简”400人,霍查命令全军听从他的直接指挥,要求军队把谢胡作为巴卢库反党集团的总后台进行彻底清算;下半年,霍查首先在党内作关于谢胡间谍活动的报告,然后在地拉那选民大会上首次公开谢胡事件,宣布谢胡是南、苏、美“多国间谍”。霍查给谢胡罗织的“八大罪状”是:1. 允许其子斯坎德尔同有历史问题的家庭的女儿订婚;2. 在1944年阿反法西斯战争期间企图取消军队总司令部;3. 阿解放后40年期间与许多敌对集团有联系;4. 与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同乘“伊丽莎白女王”号轮船旅行;5. 作为间谍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潜入国际纵队,之后又潜入阿尔巴尼亚;6. 准备于1982年毒死霍查;7. 当总理后企图动用坦克消灭地拉那的吉普赛人;8. 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苏联克格勃、英国情报局和南斯拉夫安全局的“多国超级间谍”。谢胡鉴于“罪大恶极”,“走投无路”,只好“自杀”。

谢胡死后,他的家人、部下及身边人员都受到了株连。曾任阿党中央委员、“列宁”高级党校校长的谢胡夫人被监禁后屈打成招,承认她同丈夫都是“外国间谍”、企图毒死霍查,被判处25年徒刑,1988年死于狱中(也有被毒死一说)。谢胡的一个任空军党

委书记的弟弟杜洛谢胡跳楼自杀,另一个旅居俄罗斯的弟弟幸免于难。他的三个儿子均身陷囹圄,其中长子弗拉季米尔谢胡在牢房经不起折磨而触电自杀,次子斯坎德尔谢胡和幼子巴什基姆谢胡分别被判处15年和10年徒刑。谢胡“反党集团”的其他成员都在1983年进行了秘密审判,分别判处死刑和长期徒刑,其中谢胡的侄儿费乔尔谢胡(内务部长)和密友哈兹比乌(国防部长)被判死刑;外长奈斯蒂纳赛(曾任驻华大使),卫生部长兰比奇奇什蒂及其弟弟、都拉斯区党委第一书记密哈拉奇奇奇什蒂,以及卫生部长、卫士长、卫士兰比佩奇尼和夫人(发罗拉区党委书记)、阿里切诺、加尼科德拉等数十人被判重刑。

霍查晚年偏执、多疑(甚至对所有政治局委员无一例外地进行对话监听,同时设有替身)、僵化、专制,把国家建成了与世隔绝的“碉堡之国”,被外界称为“神秘的国度”。在他统治的后期,自诩“世界上唯一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阿尔巴尼亚,被人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来形容:一盏红绿灯:车少。二牛抬杠:牛车是主要交通工具。三群当道:牛群、羊群和鸡群。四处碉堡:以碉堡武装保卫祖国。武警林立:警察和便衣警察多。六亲不认:霍查多疑,法律连坐。七窍不通:闭关自守,自绝于世界文明。八面威风:霍查做派。久久不变:体制僵化。十分落后:欧洲最贫穷的国家。

上世纪90年代,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阿尔巴尼亚也发生了剧变,霍查受到了批判和鞭笞。



霍查(右)和他的长子、长孙

1991年2月6日,阿尔巴尼亚第一个反对党——民主党刚一成立,党主席萨里贝里沙便发表文章批判霍查的个人迷信,成为否定霍查及劳动党的第一个信号弹。他在文章中称霍查是“斯大林式的独裁者,在阿尔巴尼亚建立专政,大搞残酷的阶级斗争,打击政治反对派,造成国家的贫困和孤立”。6日当天,霍查大学的学生们便举行了罢课、绝食,要求“霍查大学”恢复原校名等。2月20日,矗立在市中心广场上的霍查铜像被示威者推倒,其他城市的霍查塑像也遭到同样下场。接着,各家政治书店被捣毁,70余卷的霍查著作付之一炬。

1992年5月5日“烈士节”前夕,总统贝里沙做出把霍查等“非烈士”的遗骸迁出“祖国烈士陵园”的决定。5月2日夜间,霍查的墓穴被挖开,棺木被撬,遗骸挪到了地上。次日,霍查之子伊利尔等获准进入辨认尸体收棺,把棺材运到沙拉公墓,草草入葬。墓穴前的破水泥板上用粉笔写着:恩维尔霍查。

“第一夫人”昨日辉煌,今日凄凉

在阿劳动党执政的45年间,霍查夫人奈奇



霍查夫人出狱后在家中接受本文作者采访(1997年)

米叶一直是党中央委员和人民议会议员,先后担任党中央宣传和文教部长、马列主义研究所所长等职。另外,她还是阿尔巴尼亚妇女组织的创始人。

她作为“霍查学说”的忠实卫士,积极参与了由霍查发起的党内历次清洗,并亲自负责近百卷霍查著作的编审工作。霍查晚年患病期间,她实际上成为霍查的代言人。1986年,霍查去世不到一年时间,她出任曾由霍查生前长期兼任、晚年交给其接班人阿利雅的阿民主阵线全国委员会主席职务。在同年11月举行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前夕,她提交了一份题为《关于在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报告。报告以霍查的思想为指导,认为阿尔巴尼亚已经达到中等发达社会主义国家的水平,进入了“为共产主义创造前提的阶段”。

1990年底,地拉那霍查大学发生学潮。霍查夫人被迫辞去民主阵线全国委员会主席职务。随之,示威者冲进高干住宅区,包围了霍查夫人住所,并扬言放火烧掉房屋、揪出霍查夫人。全家被迫搬出了高干区,迁入一座又脏又破的公寓楼。1991年6月,标志着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演变的第十次党代会决定首次公开批判霍查。霍查夫人

对这次党代会及劳动党改名为社会党持否定态度,尤其对公开批判霍查表示愤慨,并宣布退党(实为被开除),从此退出了政治舞台。1991年9月,霍查夫人因“大量侵吞国家财产”的罪名遭软禁,随之被捕,关进了地拉那313号监狱。年底,被判处9年有期徒刑,1997年1月获释。出狱后,与霍查的单身妹妹一起住在地拉那市郊的一座筒子楼里。平日里,她深居简出,继续她在服刑期间开始的回忆录写作。1998年,长达400页的回忆录第一集《我与恩维尔在一起》问世,2001年10月16日霍查冥寿之际,她的390页的回忆录续集出版。该集回忆了霍查在1973年至1985年的主要活动,其中着重谈及阿尔巴尼亚与南斯拉夫、苏联和中国的关系。近年来,她又撰写了大量回忆录,但不准备公开出版。

霍查夫人在她的回忆录中把中阿关

系破裂的原因归为如下方面的分歧：1.霍查在莫斯科会见毛泽东后感觉到，毛泽东认为斯大林不平等待人，对中国的态度犹如先生对待学生，而毛对赫鲁晓夫起先则有好感，并对赫鲁晓夫的国际政治路线的态度始终动摇不定，同时要求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一起建立反对美帝“统一战线”。而霍查认为，斯大林对阿尔巴尼亚这样一个小国都平等相待，何况对中国那样一个大国，阿尔巴尼亚绝不同赫鲁晓夫搞调和，不能与其搞“统一战线”；毛泽东恶斯（大林）好赫（鲁晓夫），是企图以毛泽东思想取代马列主义。2.霍查认为，当苏联和华约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时，中国保持沉默；周总理还要求阿尔巴尼亚与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结成防御联盟，要求阿尔巴尼亚与南斯拉夫的铁托合作，改变战略。中国此举，一是加强自己在欧洲的立足，二是害怕苏联的入侵。对于中国来说，谁反苏联，谁就是可能的盟友。后来，阿尔巴尼亚的“巴卢库军事反党集团”就同中国提议的“阿-罗-南联盟”有关。3.霍查反对中国邀请尼克松访华。中国认为阿尔巴尼亚反对中国邀请尼克松访华是干涉中国内政，周总理甚至要求阿尔巴尼亚驻中国大使回国面告霍查关于中方邀请尼克松访华的理由。尼克松访华使阿中关系间的裂痕更为深化。1976年，霍查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公开批判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两党关系冻结，经济关系只保持贸易交换。1978年7月7日，中国方面宣布中断对阿尔巴尼亚的贷款和一切援助，撤回在阿尔巴尼亚的专家。霍查认为，这是中方把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到国家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方面的表现。

子女们：昔日被荫庇，今日各谋职

霍查夫妇有二子一女、四个孙子和三个孙女。大儿子伊利尔1949年生，地拉那大学工程系毕业后曾分配到都拉斯机械厂任工程师，然后被调任地拉那某军工研究所所长。他的妻子是阿利雅的侄女泰乌塔，曾任国家历史博物馆副馆长。次子索格尔出生于1952年。他在地拉那大学毕业后曾在巴黎留学，拥有博士学位，曾任国家邮电总局副局长。其妻叫玛丽亚娜，任阿尔巴尼亚国家通讯社副社长。女儿普兰维拉，地拉那大学

建筑系毕业后从事工程设计，并与颇有名气的国家设计院院长克莱曼蒂共结连理，共同设计了庄重的地拉那大会堂、别具一格的霍查博物馆（现改为国际文化中心）和克鲁亚斯坎德培博物馆，荣获国家设计最高奖“共和国奖”。

阿尔巴尼亚发生剧变后的最初10年里，霍查一家遭遇到他们有生以来最艰难的生活时段。已经参加工作的霍查家庭成员从1992年起陆续被迫离开了政府部门，失去了工作，全家靠少许退休金、补贴及国内外亲朋好友的接济度日。当时，兄弟二人除了领取社会救济金之外，没有任何收入。大儿子伊利尔的救济金仅为11美元，而小儿子索格尔只有8美元。

伊利尔处境尤其尴尬。找不到工作。为了避免连累无辜，他与朋友断绝了一切来往。经常受到人身攻击，承受着心理上的压力。他们的子女无法上大学。伊利尔的儿子中学毕业后被迫到希腊打工。

1995年4月11日，霍查逝世10周年忌日，伊利尔由于在接受一家报社记者的采访时流露出对当局的不满，被指控“煽动仇恨，危害公共秩序”，遭软禁，并被判刑一年，投入条件最差的卡瓦亚监狱。10月16日夜，也就是霍查生日那一天夜里，囚室内熟睡中的伊利尔遭到棍棒的袭击，险些送命。出狱后，他虽到处寻找工作，终因其家庭关系和“囚徒经历”而无一家公司敢雇用。

霍查的女婿克莱曼蒂也遭到与伊利尔同样的命运。1996年10月16日，也是霍查生日这一天，他在意大利谋生3年后刚刚回国，正为一家建筑公司做设计时突然被捕，理由是当局怀疑他与一个代号为“复仇”的犯罪团伙有联系。克莱曼蒂对飞来的横祸感到茫然。为了表示不服和抗议，在被关进都拉斯监狱后不久就宣布绝食。由于身体状况日益恶化，他被转至地拉那监狱的医院就医，等待审理。直至1997年，才因“查无实据”被无罪释放。

在阿尔巴尼亚剧变10余年后，恩维尔霍查的亲属们终于结束了流离失所的生活，现在每个小家庭都找到了各自的生活方式，只是远离了国家重要部门的工作岗位。伊利尔于1998年出版了他的回忆录《我的父亲霍查》，从2000年起在一家中国民营企业任“技术顾问”（下转62页）

国际共运史上的印尼惨案

● 彭 苏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有很多至今未曾解谜的案件,其中最为神秘的,莫过于1965年的印尼“九·三〇”事变。这场国际共运史上最大的反共大屠杀惨案,导致了拥有300多万党员、仅次于中共和苏共的世界上第三大共产党的覆灭,25万人头落地。由于当年中共与印尼共产党有过不寻常的关系,因此,中共一直被西方反共势力牵扯其中,在国内也从未能见过有关此事变的报道。在此事变发生40多年后,在事变后那场反共大屠杀惨案的炮制者、印尼前总统苏哈托已经死亡,笔者特撰此文。

事变前的印尼政局

印度尼西亚位于亚洲东南部,地跨赤道,由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一万多个大小岛屿组成,陆地面积约190万平方公里,素有千岛之国之称。2004年的人口约为2.17亿,为世界第4人口大国。

印尼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17世纪初沦为荷兰殖民地。几百年间,印尼人民反抗荷兰殖民主义者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1920年,在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印尼共产党宣布成立。刚成立的印尼共产党与民族资产阶级一起,立即投入了反抗荷兰殖民者的斗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取代荷兰殖民者占领了印尼,印尼共产党又投入了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日本投降后的1945年8月17日,印尼宣布成立共和国。但遭到英军的入侵,在印尼人民的抗击下和世界舆论的谴责下,英军于1946年10月撤出印尼,但将占领区交给了荷兰殖民者。1948年12月,荷兰殖民者发动第二次殖民战争,攻占了印尼共和国临时首都日惹,苏加诺等印尼政府领导人被俘。印尼人民奋起抵抗。共产党人和爱国军民广泛开展游击战争。15万荷兰殖民军只能固守大城市。美国乘

荷兰处于困境的时机,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向荷兰施加压力,迫使荷兰在1949年12月27日将西伊里安以外的印尼领土的主权移交给印尼。从此,长达340多年的荷兰殖民统治终结。印尼重获独立后,苏加诺被印尼人民称为“国父”、“独立之父”、“印尼民族英雄”,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威望。

1948年,印尼右派政府在美、荷支持下,制造了“茉莉芬事件”,追捕和屠杀共产党和进步人士。印尼共产党主要领导人慕梭牺牲,约有36000名共产党人和爱国进步人士被捕,其中约1万人惨遭杀害,全国党员只剩下了8000人。1951年,印尼共产党新领导人艾地出面收拾残局。由于艾地在反抗荷兰殖民者、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与苏加诺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印尼共产党又采取了一条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的政策,在短短的时间内,印尼共产党得到了飞速发展,到1960年,印尼共产党成为印尼全国最大的政党。1963年,印尼共产党拥有党员200多万人,1965年又上升到300多万人。成为当时仅次于中共和苏共的世界第三大共产党,也是社会主义阵营外最大的共产党。

对于当时印尼政治局势,所有的印尼国内外舆论都认为,印尼共产党凭借自身的强大和与苏加诺总统的良好关系,和平夺取印尼国家政权只是时间问题。印尼共产党对党的发展和成就也是沾沾自喜。他们最得意之处还在于,他们对马列主义最大的贡献,就是他们创立了一条不同于中国和苏联的道路,即和平夺取政权的道路。印尼共产党主席艾地曾在公开场合宣称,“在世界各国共产党中,印尼共产党最有权威谈‘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一个党,因为印尼共产党参加了中央和地方的各级政府,而且具有实行各项政策的实际潜力。”

然而,与苏加诺总统关系紧张而又亲美的一些军方高级将领,对印尼共产党即将掌握印尼政

权忧心忡忡，他们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秘密支持下，暗地里企图将苏加诺赶下台，积极寻找打击印尼共产党的时机。

此时，印尼军方内部一些拥护苏加诺，又与印尼共产党关系良好的少壮派军官也在关注局势。就在“九·三〇”事变前夕，印尼军方内的这些少壮派军官打听到了一个消息，那就是与苏加诺总统关系紧张而又亲美的那些军方高级将领，有可能会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支持下发动军事政变，并有可能推翻苏加诺总统，改变印尼的政局，使印尼转向西方。为此，这些少壮派军官经过周密策划，决定先发制人，抢在前面，用极端手段铲除这些高级军官。

事变的爆发

1965年9月30日深夜，“九·三〇”事变的领导人翁东中校向参与事变的部队下达了命令。几小时后，4个连的部队分乘十余辆大卡车，从距首都雅加达7公里的集结地——鳄鱼洞，向首都雅加达悄然出发。

在印尼军队内，翁东是个出名的少壮派领袖人物。

早在著名的“茉莉芬”暴动中，据说翁东就与印尼共产党并肩战斗过。后来，他在印尼反抗荷兰殖民者、争取民族独立的武装斗争中屡立战功。1949年荷兰殖民当局被迫承认印尼独立后，翁东一直在印尼军队中任低级职务。1962年5月，印尼发起了收复仍被荷兰殖民者占据的西伊里安的战役，翁东亲率一支空降部队深入西伊里安的原始森林中，在著名的基诺山战斗中，翁东率军与荷兰军队激战，名声大噪。次年2月14日，苏加诺总统在独立宫前的草坪上，亲自为翁东授勋，将他晋升为中校。1965年，翁东又出任精锐的总统卫队营长这一要职。在他的周围，渐渐地聚集起了一批与他志同道合的中青年少壮军官，如陆军战略后备指挥部驻西班牙里曼丹司令苏马尔佐准将，陆军第5军区步兵旅长拉蒂夫上校，哈利姆空军基地保卫团长苏约诺中校等人，正是这些人，构成了发动“九·三〇”事变的核心。

4个连的事变部队抵达首都雅加达后，已是10月1日凌晨，部队按既定计划分成7支抓捕部

队，分别扑向印尼陆军7名高级领导人的住所。每支抓捕部队到达各自负责抓捕的高级将领住所时，都分成3支小部队。一支负责把守四周的街道，一支负责包围住所，另一支直接进屋抓人。所有的理由只有一个：总统要他们立即到总统府去。

印尼国防部长纳苏蒂安是事变部队的首要目标，一支数量最大的抓捕部队来到了住处，纳苏蒂安听到动静后，已经猜出了是怎么回事。当士兵们在敲门时，他在夫人帮助下，翻上墙头，跳进了一墙之隔的伊拉克驻印尼大使馆内。一名士兵发现有人翻上墙头，于是便开了一枪，但没有打中纳苏蒂安。在混乱中，纳苏蒂安的女儿被打伤后致死。他的副官站了出来，趁乱穿上纳苏蒂安的制服，被事变部队误认为是纳苏蒂安而抓走。

在抓捕陆军部长雅尼的行动中，他没有怀疑总统要他立即到总统府去的命令有何不妥，他要求进屋去洗一下澡和换换衣服，当他的要求被拒绝时，他冲着士兵们发了火。随后双方发生冲突，雅尼被士兵们开枪打死。

除了纳苏蒂安和雅尼外，在抓捕其他5名高级将领的行动中，有两名将领因拒捕而被打死，另外3名将领被活捉，他们被带到了鳄鱼洞关押。10月1日凌晨6时左右，3名被活捉的将领，还有冒充纳苏蒂安的副官共4人，被枪杀于鳄鱼洞的一口废井中。

与此同时，事变部队也在雅加达市中心展开了行动。约1000人的事变部队分别控制了总统府和广播电台，后者是控制国内外信息传播的关键所在。当天，在印尼最重要的中爪哇地区，三宝垄、日惹和梭罗等城市也发生了类似首都雅加达的事变，当地事变部队发表声明，支持雅加达发生的事变。

至此，7名印尼陆军高级将领中的6名被打死，加上总统府和广播电台被控制，事变看来取得初步成功。

然而，翁东等事变领导人还没有与印尼的灵魂人物苏加诺总统取得联系。在印尼，任何人都知道，任何政治事变，如果没有苏加诺总统的支持，要想取得成功是不可能的。同时，他们更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犯下了一个到死不能饶恕的致命错误：即他们忽略了印尼陆军中的强硬人物——地位仅次于陆军部长的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苏



被捕的印尼共产党员

哈托。正是这个人,使得“九·三〇”事变陷入失败,包括翁东等事变领导人在内的几十万人头落地,拥有 300 多万党员的印尼共产党全党覆灭。

事变的高峰与失败

就在“九·三〇”事变发生的当天晚上,苏加诺在首都雅加达的一个体育馆在印尼全国技术人员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会后,他于晚上 11 点左右回到了总统府。但过了一会儿,他离开了总统府,前往他的第四个妻子、日本舞女出身的黛薇处过夜。第二天一大早,苏加诺像往常一样,早早便起了床,6 点钟时,他在赶往总统府的路上,听到了国防部长纳苏蒂安和另外几位陆军将领家中出事的消息,并且听说了纳苏蒂安情况不明。由于无法知道局势详情,也出于安全考虑的原因,他立即放弃了前往总统府和几位妻子住处的想法,而是前往他认为较安全的哈利姆空军基地。

在控制了总统府和广播电台,以及全部抓捕解决了 6 名陆军高级将领后,10 月 1 日清晨 7 时 10 分,翁东等事变领导人在印尼广播电台,向全国宣读了事变后的第一份公告。

在这份公告中,事变领导人说,他们为了避免受美国中央情报局扶植的印尼军内将领的压制,已对这些将领进行了逮捕。他们还说到,苏加诺总统和一些知名人士,已经受到他们的保护。但是,公告中没有对苏加诺进行平时那种歌功颂德式的

颂扬,也很少提到苏加诺的名字,这使得民众听起来,有一种此次事变是反对总统的感觉。

公告还公布了由 45 人组成的“印尼革命委员会”,翁东出任革命委员会主席,苏马尔佐准将和拉蒂夫上校分任副主席。45 名革命委员会委员中,包括了印尼各主要势力的代表,几乎有一半是政府官员,一位副总理和外交部长留任,5 名共产党的代表也在内,但印尼共产党的主要领袖都没有在名单中。与此相反,其他主要党派的主要领袖的名字却赫然在目。印尼六大军种都有代表。最让人跌破眼镜的,是名单中

居然没有苏加诺总统的名字。公告宣布,“革命委员会是印尼共和国国内一切权力的中心”,并且将在全国各地成立省、县、乡、村各级革命委员会。

接着,翁东等事变领导人派人到哈利姆空军基地会见苏加诺总统,以求得他的支持。苏加诺对事变的态度,到今各方说法不一。事变的胜利者陆军军方在政治上亲向西方,自然希望找出苏加诺支持事变的材料,以便踢开苏哈托,把印尼国家的政治方向转向西方。更大的阴谋是,借此机会,解决即将掌握政权的印尼共产党。不知苏加诺是由于无法知道印尼国防部长纳苏蒂的真实准确下落,担心军队会有什么样的行动,或是对事变不知情,但客观事实是,他迟迟没有对事变进行表态。这使得事变领导人大大失所望。

后来一些史学家为此进行了评说,苏加诺没有对事变进行公开支持表态,是印尼“九·三〇”事变失败的分水岭。

就在这时,身为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的苏哈托果断采取了军事行动,他自行接管了陆军的指挥权,发布了没有他,任何人不能调动军队的命令。随即,他取得了警察、海军的支持,并立即调忠于他的部队向首都雅加达挺进。下午 6 时,忠于苏哈托的部队开始进攻电台和电讯大楼,由于力量的悬殊,忠于翁东的事变部队无法抵抗,纷纷向哈利姆空军基地撤退。当晚,忠于苏哈托的部队向哈利姆空军基地进攻,到了第二天上午,忠于苏哈托的部队控制了哈利姆空军基地,事变部队溃散。

随后,从10月2日起,忠于苏哈托的部队向中爪哇地区的三宝壟、日惹和梭罗等城市发起进攻,并在10月5日前攻占了这几座城市。

至此,“九·三〇”事变完全失败。

震惊世界的反共大屠杀

事变失败后,掌握了大权的苏哈托在全国范围内抓捕翁东等事变领导人。

翁东等事变领导人分别潜藏,翁东本人在事变后,一直躲藏在首都雅加达市郊的农村,后来,他前往中爪哇地区,由于风声紧张,又决定前往他的家乡。在他做出决定两天后,他换上当地平民的服装,乘坐一辆普通的公共汽车悄悄地启程了。然而,就在这辆车上,他被两名士兵认了出来。1968年9月,苏哈托承认,翁东在1967年12月被处决。

另一名事变领导人拉蒂夫上校在雅加达市郊躲藏了约10天后,又悄悄返回雅加达,不幸被俘。被俘时他进行了抵抗,据说他的双腿中弹,后来被截肢。直到1978年5月,他才被判处无期徒刑。

另一名事变领导人苏马尔佐准将则一直到一年半后,才被苏哈托的陆军抓获。他于1970年5月被处决。哈利姆空军基地保卫团长苏约诺中校则早在事变后的十余天就被军方抓获,与翁东一起在1967年12月被处决。与此同时,大批参加事变的官兵也相继被抓或被杀。

苏哈托决心利用这一良机彻底解决印尼共产党。为此,他公开宣称印尼共产党策划并参与了此次事变,在全国范围内抓捕艾地等印尼共产党领导人,同时掀起了一场血腥的反共大屠杀。

印尼共产党紧急发表了与此次事变无关的声明,但苏哈托根本不予理睬。原来对印尼共产党一直有好感的苏加诺总统,由于怕事变与此有牵连,加上也已处于自身难保的境地,此时已无力保护印尼共产党了。

事变的失败和苏哈托的血腥反共大屠杀,使印尼共产党处于手足无措的境地,由于印尼共产党一直标榜的是和平夺取政权,在军事上处于一片空白。因此,在这场血腥的反共大屠杀中,只能引颈就戮。

最先被捕的是印尼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

大雅加达市委负责人约诺,他于10月5日被捕,次年2月被处死刑;印尼共产党第一副主席鲁克曼和第二副主席约多在军方的追捕中被杀;印尼共产党第4号人物苏斯蒂曼随之遇难。到1967年3月,印尼共产党中央政治局5名常委中有4名遇难,10名政治局委员中有6名遇难。其他中央委员和各级党组织负责人,以及大批党员骨干纷纷被捕牺牲,全国各地的党组织陷于瘫痪。军方出于对共产党的愤恨,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采取了活埋、刺杀、枪决等手段,全国陷入一片恐怖之中。

印尼共产党主席艾地于10月2日离开了首都雅加达,之后,他化装辗转来到了印尼共产党势力颇大的中爪哇地区,10月5日后,他再也没有公开露过面。他的安全由这里的共产党员负责保卫,他们对共产党忠心耿耿,安全措施十分得力,艾地的安全保障看起来是没有问题的。然而,谁也没料到的是,印尼陆军谍报处早就混入了印尼共产党核心内部,一名代号为“H”的特务竟然混进了艾地的贴身警卫队伍中,艾地甚至躲藏在他的家中。1965年11月22日这天,一支印尼军队来到艾地藏身的小村庄,挨家挨户地搜查。当他们来到艾地藏身的这户人家时,艾地已经藏入了密室中,然而,士兵们在密室旁边的柜子旁边发现了一双拖鞋,他们移开了柜子,艾地就这样被捕了。几小时后,艾地被枪决。几十年过去了,他的尸体的埋藏地点,至今仍被印尼军方严格保密。

1965年12月,当得知艾地殉难后,老泪纵横的毛主席写下了这样一首词:

卜算子

——悼国际共产主义战士艾地同志

疏枝立寒窗,笑在百花前。

奈何笑容难为久,春来反凋残。

残固不堪残,何须自寻烦?

花落自有花开日,蓄芳待来年。

“九·三〇”事变后,美选派马歇尔·格林为驻印尼大使。格林到任后,积极参与了反共大屠杀行动。1990年,格林和美国其他退休外交官及中央情报局官员承认,他们曾向印尼军人提供了5000名印尼共的干部名单。这些人很快被抓捕和处决。另外,近年来的资料也表明,澳大利亚也参与了印尼的大屠杀。

在这场反共大屠杀中究竟有多少人遇害,各方众说纷纭。事变后印尼军方公布的数字是 8.7 万人,国际上有人认为是 50 万人,而美国中央情报局公布的数字是接近 25 万人。考虑到美国中央情报局与印尼军方的特殊密切关系,25 万人这个数字是可靠的最低数字。

尾声

印尼“九·三〇”事变之后产生了三大后果:一是印尼共产党的覆灭;二是印尼从一个对中国和苏联友好的国家变成了一个亲美和亲西方的国家;第三个后果,则是被印尼人民称为“国父”的苏加诺总统政治生命的终结。

近半个世纪过去了,“九·三〇”事变给东西方的史学家留下了许多不解之谜。

不解之谜之一是:印尼共产党究竟在这场事变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在事变刚刚失败时,虽然印尼共产党紧急发表了与此次事变无关的声明。但印尼军方认为,事变是印尼共产党一手策划和领导的,他们因此对印尼共产党进行了大屠杀。据事变后美国中央情报局披露的众多材料和当事人(包括对事变领导人和印尼共产党中央负责人)的审讯记录,证明发起“九·三〇”事变的核心人物有 5 人,即翁东、拉蒂夫、苏约诺和印尼共产党中央特别局局长夏姆和副局长波诺,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夏姆和波诺。事变当天,正是他们 5 人在现场进行指挥。印尼共产党中央特别局是党内的秘密组织,美国中央情报局有关事变的报告称,夏姆和波诺在印尼共产党内的地位极为神秘,甚至连一些政治局委员都不知情。印尼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约诺在审讯中说,“党的秘密组织,只限于党的主席艾地一人掌握。”夏姆本人在审讯中声称自己是“‘九月三十日运动’背后的智囊”。据说印尼共产党在次年,曾在党内通报了夏姆“叛党”一事。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报告结论认为,“印尼共产党在策划政变中起着中心的作用,这是确切无疑的。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所有重大决定都是由印尼共产党做的。”奇怪的是,夏姆和波诺两人事变后被处死刑,但据说直到 80 年代初都没有执行。

不解之谜之二是:印尼“国父”苏加诺总统在

这场事变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印尼军方在事变后,一直认为总统与事变有牵连,并出示了许多相关材料。但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报告结论中认为,军方的这些材料,不能确定总统与事变有牵连,至多只是同情事变而已。但印尼军方却一直不放过总统,事变之后,苏哈托竭力寻找苏加诺总统参与了事变的证据,但都缺乏明证。1966 年 3 月 11 日,手握实权的苏哈托派人前往总统行宫,逼迫苏加诺签署了由苏哈托代理总统的“命令书”。次年 8 月又制定了禁止共产主义活动的“25 号决定书”。1967 年 3 月,苏加诺总统被逼下台。1970 年 6 月 21 日,苏加诺病逝于首都雅加达,一代枭雄从精神到肉体都永远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不解之谜之三是:中国在这次事变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由于事变前印尼、苏加诺总统及印尼共产党和中国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印尼军方在事变后,一直试图寻找中国与事变有联系的证据,但都拿不出确切证据。军方在审讯夏姆时,向他问到事变是否与中共情报部门有牵连时,与军方十分配合的夏姆却断然否定,“绝对没有任何关系”。美国中央情报局有关事变的报告称,“应该认为,没有证据证明中国直接插手了这次印尼政变。”但美方又认为,如果获得了事变前夕印尼共产党主席艾地访问中国时的谈话内容,就可以最后得出结论了。但苏哈托在当政的几十年中,一直咬定中国与事变有牵连。多次发起大规模迫害华人华侨的活动,并有在一次迫害活动中集体强奸上千名华人华侨妇女的惨无人道的行为。

1998 年 5 月,独裁了 33 年的苏哈托被控贪污腐化而被赶下台。2008 年元月 17 日,苏哈托病死,终年 86 岁。

40 多年的时间过去了,当年印尼“九·三〇”事变几乎所有的重要参与人与知情人都已离开了这个世界。但只要印尼、美国、中国当年有关这次事变的档案不能真正公开,40 多年前的印尼“九·三〇”事变真相永远也是一个迷。至于在“九·三〇”事变死亡的 25 万生灵,只要印尼政局不能走向真正的民主,则更是永远不能申冤了。

(作者系贵州省贵阳市中医学院教师)

(责任编辑 杨继绳)

读 者 来 信 摘 登

《炎黄春秋》又一年

在所有文史类期刊中《炎黄春秋》是我最喜爱的,每期必看,每看必有所得,有所悟,有所感。这种感觉决不自今日始。虽然年龄一年年增长,但感觉到有《炎黄春秋》相伴,心态反而更年轻。这种感觉的由来,实实在在是因为期刊的五大特色。

其一,勇于探索史实的胆识和气魄。不少我辈经历或书上读过的大事件,都能以事实为准绳,有的给以匡正,有的给以很有启发性的分析,不时给人以恍然大悟之感。其二,敢于追求真理的勇气和智慧。我是读过不少书,也在高校教过多年书的知识分子,很多东西似乎已成定论。但读过该刊,不少新视角、新观念、新认识、新发现,依然让我警醒,大有耳目一新之感。其三,破旧立新的前瞻眼光。任何一个人、一个民族,要进步、要发展,都离不开坚持真理,摒弃谬误,总结以往、展望光明。阅读本刊,我自己也似乎一天天在变新,头脑更充实,这是我的真实感受。其四,有一批德高望重、勇于探究的老前辈,作为该刊的作者群,又有一批卓有见识的新学者做接续,使得该刊每期都有新发现、新观点显现于读者面前。其五,办刊风格有棱有角,大胆活泼。针砭时弊,毫不遮掩,“不惟书、不惟上、只惟实”,呼唤改革,旗帜鲜明,犹如雷霆千钧,又如春风拂面。

出于对《炎黄春秋》的喜爱,提出一点也许不正确的意见:在《一家言》栏目中,我更希望看到不同观点的争论,比如对社会主义的不同认识。真理只能在比较和争论中才能扎下深深的根。要相信读者的鉴别能力。

时间过得真快,《炎黄春秋》又一年。我相信新一年的刊物会更好,让我更有所得、有所悟、有所感。

河北读者 甘彦洽

警惕没有喊声的“万岁”故事

近读贵刊2008年第10期雷颐先生的《“万岁”故事》一文就回想起自己喊“万岁”的故事。我是文革中开始喊“万岁”的。“像孩子一样透明、单纯、纯净”地喊,表示对领袖的尊敬和爱戴。在那个时代,当属“常情”、“常理”。也下意识地想过,人是不可能活到“万岁”的,这是“常识”。那时的一日三餐,都要先喊了“万岁”后才能吃。日子一长,习以为常,喊“万岁”好像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我喊了那么多“万岁”,今天才知道“万岁”一词里竟包含着这么多奥妙玄机,我很感谢雷先生!

最近看到一篇文章《先有李世民后才有魏征》,立即联想到是先有皇帝老子喜欢听“万岁”,后才有臣民们喊“万岁”。现在虽然没有皇帝了,没有喊“万岁”了,但似乎“声”犹在耳”。比如,“一把手”的权位在一个单位里是至高无上的,他的指示总是正确的,讲话总是重要的,言行总是不受约束的,耳朵里总是充满颂扬和掌声的。如果不能彻底肃清天、地、君、亲、师的等级思想,“人治”制度不能彻底改变为“法治”制度,没有喊声的“万岁”故事,还会延续下去的。

在这里,我要感谢《炎黄春秋》这些年来发表了很多振聋发聩的好文章,帮助读者启发了良知。感悟了人性美,辨别了真假是非,增长了见识才情,促进了独立思考。

武汉读者 周天表

贵刊2008年《炎黄春秋》第10期《通渭问题——“大跃进”五十周年祭》一文中提到的“1958年5月5日至23日,他以‘先进县代表’的身份,列席了中共中央八届二中全会”,此处有误,应是“八大二次会议”。

北京读者 张柏新

第12期《萧克与历史问题的拨乱反正》一文写的很好,但也有两处错误。首先,文中说:1977年后,萧克回到军中,担任国防部副部长,并兼任军事科学院(应为军事学院)院长。需要指出的是:萧克是1972年回到军中的,5月份任解放军军政大学校长,1978年3月任军事学院院长兼第一政委。同样,蒋杰当时所在单位名称的问题也就清楚了。

读者 李建 王千菽

我在贵刊2008年第3期发表的《日本战犯重到南京》一文中所列《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人口损失总计表》,引自2005年7月7日上海《新民晚报》A17七七专辑“抗战胜利六十年特刊”(第七期)。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民伤亡人数最低限:3480万。转录有差错,特更正如下:“死亡”项中,湖南应为920085人,云南应为130396人,冀晋热辽察绥应为1385539人;“受伤”项中河南应为239939人;山东漏列,死亡为1830215人,受伤为1632985。

另,拙文引用李煜词句“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国”字误印成了“园”字,亦请代为订正。

作者 叔弓

读了2008年10期《1976年,华国锋和叶剑英是怎样联手的》一文,我认为文中有关公安部领导等任职的叙述有误。如文中第二部分说“1972年谢富治死后(华国锋)接任公安部长”,而据史料记载,1970年谢富治患病后,当年6月至1973年10月,由李震担任公安部革委会主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实际上主持公安部全面工作。华国锋是在1975年1月召开的四届人大会议上被任命为副总理兼任公安部长的,并非文中所述“(由公安部长)升任国务院副总理”。

贵刊第11期中一些文章所提及的人和事与史实不符:

1.《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外政策的调整》一文中提到“政治局常委李先念”(见16页),这个提法是不对的,在1982年9月党的12大召开以前,中共中央还设有高于政治局常委级别的副主席,1981年3月的时候,李先念是党的副

主席,副主席还有叶剑英、邓小平、陈云等3人,当时不是副主席的常委还有胡耀邦和赵紫阳,因此,笼统地把李先念称为“政治局常委”是不合适的。

2.《王府井亮起来背后的故事》一文中提到1984年的时候全国人大委员长是万里(见35页),事实上,当时担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是彭真,万里是1988年4月才开始担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

3.《中国的地震预警史》一文中提到辽宁省政府(见40页),事实上,“文革”期间(包括1975年)全国各地的政府一般称为“革命委员会”,辽宁省也不例外。
大连读者 孙奎

书屋 2009年第1期目录

学界新论	二十世纪初俄国的改革、战争与革命	金雁
	伊朗巴列维国王改革失败的教训	雷颐
东瀛志略	明治宪法体制下的政党、元老与军部	袁灿兴
灯下随笔	职业、事业断想	樊百华
	闲话报应	雷池月
	出口成“脏”	
	——关于脏话的若干文化随想	陈漱渝
域外传真	性殖民——旅韩手记	王晓华
	海涅的幽灵在徘徊	单世联
说长论短	关于自由主义的若干问题	吴克峰
	过去教授的骨气和底气	肖燕雄
	为何上帝不存在(外一篇)	吕锡琛
书屋品茗	历史是复杂的——重读林白水之死	顾土
	也谈李时珍的“脑为元神之府”	
	——与彭兴先生商榷	刘剑
	韩石山歪解鲁迅一例	桑永海
	错把“旧梦”当“新梦”	
	——有关徐铸成一本港版书的辨误	贺越明
思史佚篇	朱元璋为什么嫉恨江南?	黄波
	“雍乾盛世”江南文人的生存方式	
	——以扬州八怪、袁枚、吴敬梓为例	武维春
	可怜误记戴东原	田吉
书林折枝	醉入花丛或醉卧沙场	
	——孙临与葛嫩、王月	王鹤
	麓山三亭随感	刘继勋

邮发代号:42-150 月刊 每月6日出版 定价:6.00元
地址:长沙市韶山北路443号《书屋》杂志 邮编:410007
电话:0731-5791300 5486812 传真:0731-5790197
邮箱:nlh5314@263.net

祝贺“中华文化与和谐世界建设”国际学术会议

圆满成功



开幕式主席台(左起)张文彬、陈开枝、欧初、张岂之、张汉青、吴清辉、胡军



张岂之作大会主旨报告



大会发言



闭幕式主席台



大会合影

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暨南大学联合主办的“二十一世纪中华文化世界论坛”第五次会议——“中华文化与和谐世界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8年11月22日至24日在广州举行。来自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以及美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突尼斯的一百余位学者参加了研讨会。学者们围绕会议主题，就弘扬中华和谐文化，推动和谐社会建设进行了深入研讨。这是一次高水平的学术盛会。

炎黄春秋 YANHUANGCHUNQIU 2009年第**1**期

周巍峙：周扬与文化建设

“内人党”冤案亲历记

调查“五·一六”

夜半抄家记

李庆霖上书毛主席的一些情况

贵州麻山事件始末

ISSN 1003-1170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定价：6.90元